



魯迅

自述





留學日本時期的魯迅



魯 迅 近 影

(1 9 3 3 年)

MG
K825.6
50

魯 迅：自 述

從一八八一到一九三六年 左羣集錄



19 • 東壁書屋 • 36



3 2174 0391 8

魯迅自述目錄

獻詞	[目錄前]
殘句	[目錄前]
第一章	母地.....	[1]
第二章	幼年和書塾.....	[10]
第三章	無需學費的學校.....	[29]
第四章	從南京到日本.....	[38]
第五章	回國.....	[51]
第六章	創作生活的回顧.....	[73]
第七章	關於“阿Q正傳”.....	[84]
第八章	五卅時期及其後.....	[94]
第九章	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	[108]
第十章	從廈門到廣州.....	[118]
第十一章	“語絲”四年.....	[129]
第十二章	解剖別人尤其是解剖自己.....	[139]
第十三章	創作和我.....	[156]
第十四章	翻譯和我.....	[165]
第十五章	革命文學的前線.....	[175]
第十六章	朋友們的死.....	[188]
第十七章	九一八以後.....	[193]

第十八章 在語文改革的浪潮中.....	[205]
第十九章 非常時期的談話.....	[210]
第二十章 病和死.....	[217]
生命的路(代跋).....	[223]
魯迅譯著書目(魯迅自編).....	[225]
魯迅傳(佐藤春夫作).....	[235]

圖 畫 目 錄

前驅(蘇聯A·愛爾莫拉葉夫作).....	[封面上]
魯迅木刻像(郝力擊作).....	[封面下]
留學時期的魯迅.....	[目錄前]
一九三三年的魯迅.....	[目錄前]
書室·書架·書桌(一九三六年十月在滬寓).....	[對IV面]
與夫人景宋女士和公子海嬰合影(一九三四年九月).....	[對I面]
廈門大學講學時期(一九二六年).....	[對127面]
在全國木刻展覽會場上(一九三六年十月).....	[對128面]
在死床上的魯迅(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	[對222面]
瞻仰遺容和參加殯儀的羣衆(一九三六年十月廿一日).....	[對223面]

獻詞

謹將本書主人公魯迅先生自己的故事輯成廿章
作為我們的前驅作家，戰士和導師的永久紀念

輯錄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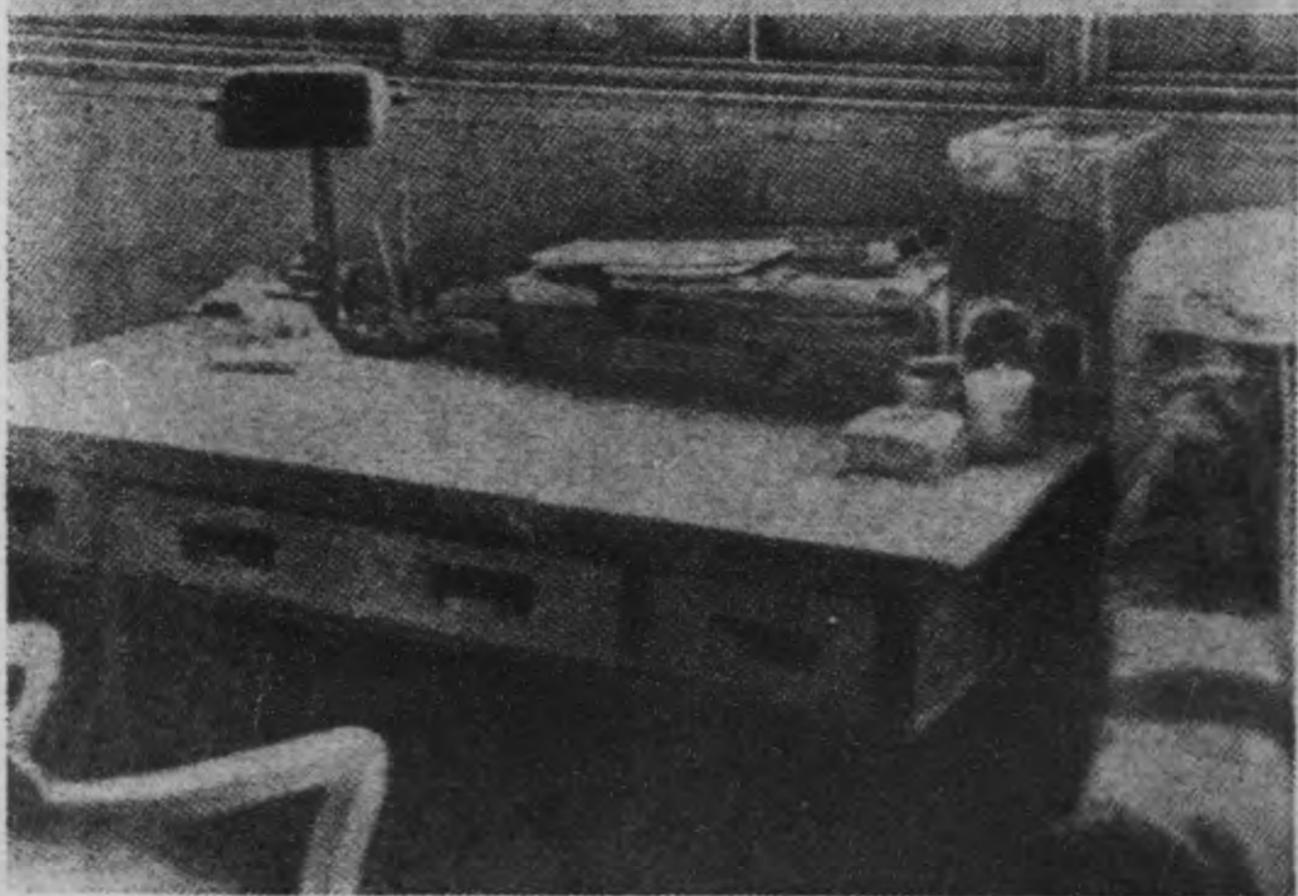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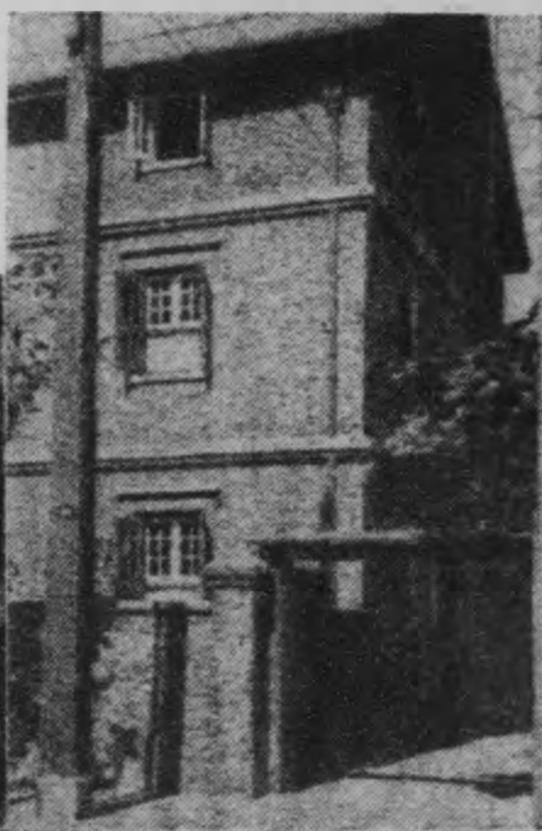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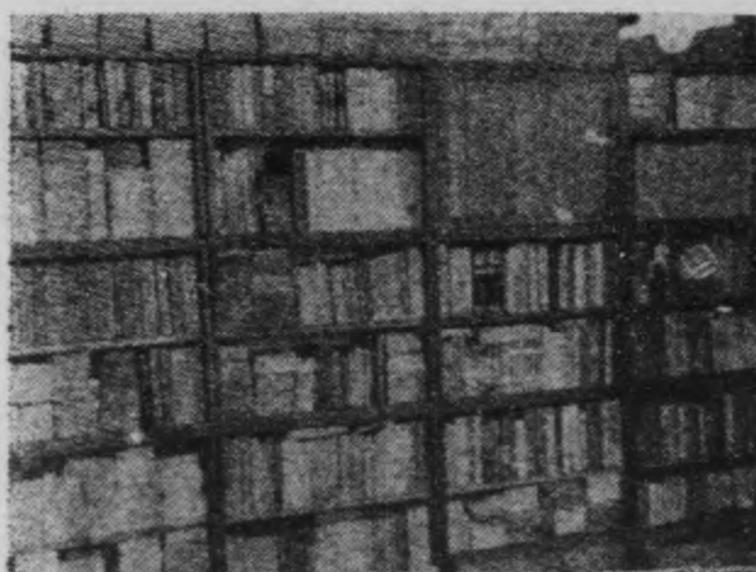
殘 句

惟願偏愛我的作品的讀者
不過也將這當作一種紀念，
知道這小小的丘壟中，
無非埋着曾經活着的軀殼。

待再經若干年後，
又當化爲煙埃，
并紀念也將從人間消去，
而我的事也就完了。

——從魯迅舊稿分段恭錄

書室・書架・書桌





與夫人許廣平女士及公子海嬰合影

魯 迅 自 述

二十章並代跋一篇

第一章 母地

我於一八八一年生在浙江省，紹興府城里的一家姓周的家裏。

我的故鄉，在漢末雖曾經虞仲翔先生揄揚過，但是那究竟太早了，後來到底免不了產生所謂“紹興師爺，”不過也並非男女老小全是“紹興師爺，”別的“下等人”也不少。這些“下等人，”要他們發“什麼我們現在走的是一條狹窄險阻的小路，左面是一個廣漠無際的泥潭，右面也是一片廣漠無際的浮沙，前面是遙遙茫茫蔭在薄霧的裏面的目的地”那樣熱昏似的妙語，是辦不到的，可是在無意中，看得住這“蔭在薄霧的裏面的目的地”的道路很明白：求婚，結婚，養孩子，死亡。

那是一個我的幼時的夏夜，我躺在一株大桂樹下的小板桌上乘涼，祖母搖着芭蕉扇坐在桌旁，給我猜謎，講故事。忽然，桂樹上沙沙地有趾爪的爬搔聲，一對閃閃的



中隨聲而下，使我喫驚，也將祖母講着的話打

斷，另講貓的故事了——

“你知道麼？貓是老虎的先生。”她說。“小孩子怎麼會知道呢，貓是老虎的師父。老虎本來是什麼也不會的，就投到貓的門下來。貓就教給牠撲的方法，捉的方法，嗅的方法，像自己的捉老鼠一樣。這些教完了；老虎想，本領都學到了，誰也比不過牠了，只有老師的貓還比自己強，要是殺掉貓，自己便是最強的角色了。牠打定主意，就上前去撲貓。貓是早知道牠的來意的，一跳，便上了樹，老虎却只能眼睜睜地在樹下蹲着。牠還沒有將一切本領傳授完，還沒有教給牠上樹。”

這是微幸的，想我，幸而老虎很性急，否則從桂樹上就會爬下一匹老虎來。然而究竟很怕人，我要進屋子裏睡覺去了。夜色更加黯然；桂葉瑟瑟地作響，微風也吹動了，想來草席定已微涼，躺着也不至於煩得翻來覆去了。

我的祖母會經常對我說，白蛇娘娘就被壓在這雷峯塔底下。有個叫作許仙的人救了兩條蛇，一青一白，後來白蛇便化作女人來報恩，嫁給許仙了；青蛇化作丫鬟，也跟着。一個和尚，法海禪師，得道的禪師，看見許仙臉上有妖氣，——凡討妖怪做老婆的人，臉上就有妖氣的，但只有非凡的人纔看得出，——便將他藏在金山寺的法座後，白蛇娘娘來尋夫，於是就“水滿金山。”我的祖

母講起來還有趣得多，大約是出於一部彈詞叫作義妖傳裏的，但我沒有看過這部書，所以也不知道「許仙」「法海」究竟是否這樣寫。總而言之，白蛇娘娘終於中了法海的計策，被裝在一個小小的鉢盂裏了。鉢盂埋在地裏，上面還造起一座鎮壓的塔來，這就是雷峯塔。此後似乎事情還很多，如「白狀元祭塔」之類，但我現在都忘記了。

父親是讀書的；母親姓魯，鄉下人，她以自修得到能夠看書的學力。

聽人說，在我幼小時候，家里還有四五十畝水田，並不很愁生計。但到我十三歲時，我家忽而遭了一場很大的變故，幾乎什麼也沒有了；我寄住在一個親戚家，有時還被稱為乞食者。我於是決心回家，而我的父親又生了重病，約有三年多，死去了。

我有四年多，曾經常常，——幾乎是每天，出入於質鋪和藥店裏，年紀可是忘却了，總之是藥店的櫃頭正和我一樣高，質鋪的是比我高一倍。我從一倍高的櫃頭外送上衣服或首飾去，在侮蔑裏接了錢，再到一樣高的櫃臺上給我久病的父親去買藥。回家之後，又須忙別的事了，因為開方的醫生是最有名的，以此所用的藥引也奇特：冬天的蘆根，經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對的，結子的平地木，……多不是容易辦到的東西。然而我的父親終於日重一日

的亡故了。

有誰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的麼，我以為在這塗路中，大概可以看見世人的真面目。

大約十多年前罷，[紹興]城中曾經盛傳過一個名醫的故事：——

他出診原來一元四角，特拔十元，深夜加倍，出城又加倍。有一夜，一家城外人家的閨女生急病，來請他了，因為他其時已經闊得不耐煩，便非一百元不去。他們只得都依他。待去時，却只是草草的一看，說道“不要緊的”，開一張方，拿了一百元就走。那病家似乎很有錢，第二天又來請了。他一到門，只見主人笑面承迎，道，“昨晚服了先生的藥，好得多了，所以再請你來覆診一回。”仍舊引到房裏，老媽子便將病人的手拉出帳外來。他一按，冷冰冰的，也沒有脈，於是點點頭道，“唔，這病我明白了。從從容容走到桌前，取了藥方紙，提筆寫道：——

“憑票付英洋壹百元正。”下面是署名，畫押。

“先生，這病看來很不輕了，用藥怕還得重一點罷。”主人在背後說。

“可以，”他說。於是另開了一張方：——

“憑票付英洋貳百元正。”下面仍是署名，畫押。

這樣，主人就收了藥方，很客氣地送他出來了。

我曾經和這名醫周旋過兩整年，因為他隔日一回，來診的我父親的病。那時雖然已經很有名，但還不至於鬧得這樣不耐煩；可是診金却已經是一元四角。現在的都市上，診金一次十元並不算奇，可是那時是一元四角已是巨款，很不容易張羅的了；又何況是隔日一次。他大概的確有些特別，據輿論說，用藥就與衆不同。我不知道藥品，所覺得的，就是“藥引”的難得，新方一換，就得忙一大場，先買藥，再尋藥引。“生姜”兩片，竹葉十斤去尖，他是不用的了。起碼是蘆根。去到河邊去掘；一到經霜三年的甘蔗，便至少也得搜尋兩三天。可是說也奇怪，大約後來總沒有購求不到的。

據輿論說，神妙就在這地方。先前有一個病人，百藥無效；待到遇見了什麼葉天士先生，只在舊方上加了一味藥引：梧桐葉。只一服，便霍然而愈了。“醫者，意也。”其時是秋天，而梧桐先知秋氣。其先百藥不投，今以秋氣動之，以氣感氣，所以……我雖然並不了然，但也十分佩服，知道凡有靈藥，一定是很不容易得到的，求仙的人，甚至於還要拚了性命，跑進深山裏去採呢。

這樣有兩年，漸漸地熟識，幾乎是朋友了。父親的水腫是逐日利害，將要不能起牀；我對於經霜三年的甘蔗之流也逐漸失了信仰，採辦藥引似乎再沒有先前一般踴躍了。正在這時候，他有一天來診，問過病狀，便極其誠懇地

說：——

“我所有的學問，都用盡了。這裡還有一位陳蓮河先生，本領比我高。我薦他來看一看，我可以寫一封信。可是，病是不要緊的，不過經他的手，可以格外好得快……。”

這一天似乎大家都有些不歡，仍然由我恭敬地送他上轎。進來時，看見父親的臉色很異樣，和大家談論，大意是說自己的病大概沒有希望的了；他因為看了兩年，毫無效驗，臉又太熟了，未免有些難以為情，所以等到危急時候，便薦一個生手自代，和自己完全脫了干係。但另外有什麼法子呢？本城的名醫，除他之外，實在也只有一個陳蓮河了。明天就請陳蓮河。

陳蓮河的診金也是一元四角。但前回的名醫的臉是圓而胖的，他却長而胖了：這一點頗不同。還有用藥也不同。前回的名醫是一個人還可以辦的，這一回却是一個人有些辦不妥帖了，因為他一張藥方上，總兼有一種特別的丸散和一種奇特的藥引。

蘆根和經霜三年的甘蔗，他就從來沒有用過。最平常的是“蟋蟀一對”旁注小字道：“要原配，即本在一窠中者。”似乎昆蟲也要貞節，續絃或再醮，連做藥資格也喪失了。但這差使在我並不為難，走進百草園，十對也容易得，將牠們用線一縛，活活地擲入沸湯中完事。然而還有“平地木十株”呢，這可誰也不知道是什麼東西了，問藥店，問

鄉下人，問賣草藥的，問老年人，問讀書人，問木匠，都只是搖搖頭；臨末纔記起了那遠房的叔祖，愛種一點花木的老人，跑去一問，他果然知道，是生在山中樹下的一種小樹，能結紅子如小珊瑚珠的，普通都稱爲“老弗大”。

“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藥引尋到了，然而還有一種特別的丸藥：敗鼓皮丸。這“敗鼓皮丸”就是用打破的舊鼓皮做成；水腫一名鼓脹，一用打破的鼓皮自然就可以尅伏他。清朝的剛毅因爲憎恨“洋鬼子”，預備打他們，練了些兵稱作‘虎神營’，取虎能食羊，神能伏鬼的意思；也就是這道理。可惜這一種神藥，全城中只有一家出售的，離我家就有五里，但這却不像平地木那樣，必須暗中摸索了，陳蓮河先生開方之後，就懇切詳細地給我們說明。

“我有一種丹，”有一回陳蓮河先生說，“點在舌上，我想一定可以見效。因爲舌乃心之靈苗……，價錢也並不貴，只要兩塊錢一盒……。”

我父親沈思了一會，搖搖頭。

“我這樣用藥還會不大見效，”有一回陳蓮河先生又說，“我想，可以請人看一看，可有什麼冤愆……。醫能醫病，不能醫命，對不對？自然，這也許是前世的事……。”

我的父親沈思了一會，搖搖頭。

凡國手，都能夠起死回生的，我們走過醫生的門前，常可以看見這樣的扁額。現在是讓步一點了，連醫生自己

也說道：“西醫長於外科，中醫長於內科。”但是[紹興]城那時不但沒有西醫，並且誰也還沒有想到天下有所謂西醫，因此無論什麼，都只能由軒轅岐伯的嫡派門徒包辦。軒轅時候是巫醫不分的，所以直到現在，他的門徒就還見鬼，而且覺得“舌乃心之靈苗”。這就是中國人的“命”，連名醫也無從醫治的。

不肯用靈丹點在舌頭上，又想不出“冤愆”來，自然，單喫了一百多天的“敗鼓皮丸”有什麼用呢？依然打不破水腫，父親終於躺在牀上喘氣了。還請一回陳蓮河先生，這回是特拔，大洋十元。他仍舊泰然的開了一張方，但已停止敗鼓皮丸不用，藥引也不很神妙了，所以只消半天，藥就煎好，灌下去，却從口角上回了出來。

從此我便不再和陳蓮河先生周旋，只在街上有時看見他坐在三名轎夫的快轎裏飛一般擡過；聽說他現在還康健。一面行醫，一面還做中醫什麼學報，正在和只長於外科的西醫奮鬥哩。

中西的思想確乎有一點不同。聽說中國的孝子們，一到將要“罪孽深重禍延父母”的時候，就買幾斤人參煎湯灌下去，希望父母多喘幾天氣，即使半天也好。我的一位教醫學的先生却教給我醫生的職務道：可醫的應該給他醫治，不可醫的應該給他死得沒有痛苦。——但這先生自然是西醫。

父親的喘氣頗長久，連我也聽得很喫力，然而誰也不能幫助他。我有時竟至於電光一閃似的想道：“還是快一點喘完了罷。……”立刻覺得這思想就不該，就是犯了罪；但同時又覺得這思想實在是正當的，我很愛我的父親。便是現在，也還是這樣想。

早晨，住在一門的衍太太進來了。她是一個精通禮節的婦人，說我們不應該空等着。於是給他換衣服；又將紙錠和一種什麼高王經燒成灰，用紙包了給他捏在拳頭裏，……。

“叫呀，你父親要斷氣了。快叫呀！”衍太太說。

“父親！父親！”我就叫起來。

“大聲！他聽不見。還不快叫！？”

“父親!!!父親!!!”

他已經平靜下去的臉，忽然緊張了，將眼微微一睜，彷彿有一些苦痛。

“叫呀！快叫呀！”她催促說。

“父親!!!”

“什麼呢！……不要嚷。……不……。”他低低地說，又較急地喘着氣，好一會，這纔復了原狀，平靜下去了。

“父親!!!”我還叫他，一直到他咽了氣。

我現在還聽到那時的自己的這聲音，每聽到時，就覺得這却是我對於父親的最大的錯處。

第二章 幼年和書塾

我生在周氏是長男，“物以希爲貴”，父親怕我有出息，因此養不大，不到一歲，便領到長慶寺裏去，拜了一個和尚爲師了。拜師是否要贄見禮，或者布施什麼的呢，我完全不知道。只知道我却由此得到一個法名叫作“長庚”，後來偶爾用作筆名，並且在酒樓上這篇小說裏，贈給了恐嚇自己的姪女的無賴；還有一件百家衣，就是“衲衣”，論理是應該用各種破布拼成的，但我的却是橄欖形的各色小綢片所縫就，非喜慶大事不給穿；還有一條稱爲“牛繩”的東西，上掛零星小件，如曆本，鏡子，銀篩之類，據說是可以避邪的。

這種布置，好像也真有些力量；我至今沒有死。

不過，現在法名還在，那兩件法寶却早已失去了。前幾年回北平去，母親還給了我嬰兒時代的銀篩，是那時的惟一的記念。仔細一看：原來那篩子圓徑不過寸餘，中央一個太極圖，上面一本書，下面一卷畫，左右綴着極小的尺，剪刀，算盤，天平之類。我於是恍然大悟，中國的邪鬼，

是怕斬釘截鐵，不能含糊的東西的。因為探究和好奇，去年曾經去問上海的銀樓，終於買了兩面來，和我的幾乎一式一樣，不過綴着的小東西有些增減。奇怪得很，半世紀有餘了，邪鬼還是這樣的性情，避邪還是這樣的法寶。然而我又想，這法寶成人却用不得，反而非常危險的。

但因此又使我記起起了半世紀以前的最初的先生。我至今不知道他的法名，無論誰，都稱他爲“龍師父”，瘦長的身子，瘦長的臉，高顴細眼，和尚是不應該留鬚的，他却有兩縷下垂的小鬚子。對人很和氣，對我也很和氣，不教我唸一句經，也不教我一點佛門規矩；他自己呢，穿起袈裟來做大和尚，或者戴上毗盧帽放饑口，“無祀孤魂，來受甘露味”的時候，是莊嚴透頂的，平常可也不唸經，因爲是住持，只管着寺裏的瑣屑事，其實——自然是由我看起來——他不過是一個剃光了頭髮的俗人。

因此我又有一位師母，就是他的老婆。論理，和尚是不應該有老婆的，然而他有。我家的正屋的中央，供着一塊牌位，用金字寫着必須絕對尊敬和服從的五位：“天地君親師”。我是徒弟，他是師，決不能抗議，而在那時，也決不想到抗議，不過覺得似乎有點古怪。但我是很愛我的師母的。在我的記憶上，見面的時候，他已經大約有四十歲了，是一位胖胖的師母，穿着玄色紗衫褲，在自己家裏的院子納涼，她的孩子們就來和我玩耍。有時還有水果和點

心吃，——自然，這也是我所以愛她的一個大原因；用高潔的陳源教授的話來說，便是所謂“有奶便是娘”，在人格上是很不足道的。

我的師父，在約略四十年前已經去世；師兄們大半做了一寺的住持；我們的交情是依然存在的，却已彼此不通消息。但我想，他們一定早各已各有一大批小菩薩，而且有些小菩薩又有小菩薩了。

我生長在偏僻之區，毫不知道什麼是滿漢，只在飯店的招牌上看見過“滿漢酒席”字樣，也從不引起什麼疑問來。聽人講“本朝”的故事是常有的，乾隆皇帝南巡的盛事也很少有人講述了，最多的是“打長毛”。我家裏有一個年老的女工，她說長毛時候，她已經十多歲了，長毛故事要算她對我講的最多。

長媽媽，已經說過，是一個一向帶領着我的女工，說得闊氣一點，就是我的保姆。我的母親和許多別的人都這樣稱呼她，似乎略帶些客氣的意思。只有祖母叫她阿長。我平時叫她“阿媽”，連“長”字也不帶；但到憎惡她的時候，——例如知道了謀死我那隱鼠的却是她的時候，就叫她阿長。

我們那里沒有姓長的；她生得黃胖而矮，“長”也不是形容詞。又不是她的名字，記得她自己說過，她的名字是

叫作什麼姑娘的。什麼姑娘，我現在已經忘却了，總之不是長姑娘；也終于不知道她姓什麼。記得她曾告訴過我這個名稱的來歷：先前的先前，我家有一個女工，身材生得很高大，這就是真阿長。然後她回去了，我那什麼姑娘纔來補她的缺，然而大家因為叫慣了，沒有再改口，于是她從此也就成爲長媽媽了。

雖然背地裏說人長短不是好事情，但倘使要我說句真心話，我可只得說：我實在不大佩服她。最討厭的是常喜歡切切察察，向人們低聲絮說些什麼事。還豎起第二個手指，在空中上下搖動，或者點着對手或自己的鼻尖。我的家裏一有些小風波，不知怎的我總疑心和這“切切察察”有些關係，又不許我走動，拔一株草，翻一塊石頭，就說我頑皮，要告訴我的母親去了。一到夏天，睡覺時她又伸開兩腳兩手，在床中間擺成一個“大”字，擠得我沒有餘地翻身，久睡在一角的席子上，又已經烤得那麼熱。推她呢，不動；叫她呢，也不聞。

“長媽媽生得那麼胖，一定很怕熱罷？晚上的睡相，怕不見得很好罷？……”

母親聽到我多回訴苦之後，曾經這樣地問過她。我也知道這意思是要她多給我一些空席。她不開口。但到夜裏，我熱得醒來的時候，却仍然看見滿牀擺着一個“大”字，一條臂膊還攔在我的頸子上。我想，這實在無法可想

了。

但是她懂得許多規矩，這些規矩，也大概是我所不耐煩的，一年中最高興的時節，自然要數除夕了。辭歲之後，從長輩得到壓歲錢，紅紙包着，放在枕邊，只要過一宵，便可以隨意使用。睡在枕上，看着紅包，想到明天買來的小鼓，刀槍，泥人，糖菩薩……然而她進來，又將一個福橘放在牀頭了。

“哥兒，你牢牢記住！”她極其鄭重地說。“明天是正月初一，清早一睜開眼睛，第一句話就得對我說：‘阿媽，恭喜恭喜！’記得麼？你要記着，這是一年的運氣的事情。不許說別的話！說過之後，還得喫一點福橘。”她又拿起那橘子來在我的眼前搖了兩搖，“那麼一年到頭，順順流流……”

夢裏也記得元旦的，第二天醒得特別早，一醒，就要坐起來。她却立刻伸出臂膊，一把將我按住。我驚異地看她時，只見她惶急地看着我。

她又有所要求似的，搖着我的肩。我忽而記得了——

“阿媽，恭喜……”

“恭喜恭喜！大家恭喜！真聰明！恭喜恭喜！”她于是十分喜歡似的，笑將起來，同時將一點冰冷的東西，塞在我的嘴裏。我大喫一驚之後，也就忽而記得。這就是所謂福橘，元旦關頭的磨難，總算已經受完，可以下牀玩耍去了。

她教給我的道理還很多，例如說人死了，不該說死掉，必須說“老掉了”；死了人，生了孩子的屋子裏，不應該走進去；飯粒落在地上，必須揀起來，最好是喫下去；曬褲子用的竹竿底下，是萬不可鑽過去的……。此外，現在大抵忘却了，只有元旦的古怪儀式記得最清楚。總之：都是些煩瑣之至，至今想起來還覺得非常麻煩的事情。

然而我有一時也對她發生過空前的敬意。她常常對我講“長毛”。她之所謂“長毛”者，不但洪秀全軍，似乎連後來一切土匪強盜都在內，但除却革命黨，因為那時還沒有。她說得長毛非常可怕，他們的話就聽不懂。她說先前長毛進城的時候，我家全都逃到海邊去了，只留一個門房和年老的煮飯老媽子看家。後來長毛果然進門來了，那老媽子便叫他們“大王”，——據說對長毛就應該這樣叫，——訴說自己的飢餓。長毛笑道：“那麼，這東西就給你喫了罷！”將一個圓圓的東西擲了過來，還帶着一條小辮子，正是那門房的頭。煮飯老媽子從此就駭破了膽，後來一提起，還是立刻面如土色，自己輕輕地拍着胸脯道：“阿呀，駭死我了，駭死我了……。”

我那時似乎倒並不怕，因為我覺得這些事和我毫不相干的，我不是一個門房。但她大概也即覺到了，說道，“像你似的小孩子，長毛也要擄的，擄去做小長毛。還有好看的姑娘，也要擄。”

“那麼，你是不要緊的。”我以為她一定最安全了，既不做門房，又不是小孩子，也生得不好看，況且頸子上還有許多灸瘡疤。

“那里的話!?”她嚴肅地說，“我們就沒有用處？我們也要被擄去。城外有兵來攻的時候，長毛就叫我們脫下褲子，一排一排地站在城牆上，外面的大砲就放不出來；再要放，就炸了!”

這實在是出于我意想之外的，不能不驚異。我一向只以為她滿肚子是麻煩的禮節罷了，却不料她還有這樣偉大的神力。從此對於她就有了特別的敬意，似乎實在深不可測；夜間的伸開手脚，佔領全牀，那當然是情有可原的了，倒應該我退讓。

這種敬意，雖然也逐漸淡薄起來，但完全消失，大概是在知道她謀害了我的隱鼠之後。那時就極嚴重地詰問，而且當面叫她阿長。我想我又不真做小長毛，不去攻城，也不放砲，更不怕炮炸，我懼憚她什麼呢!

但當我哀悼隱鼠，給牠復讎的時候，一面又在渴慕着繪圖的山海經了。這渴慕是從一個遠房的叔祖惹起來的。他是一個胖胖的，和藹的老人，愛種一點花木，如珠蘭，茉莉之類，還有極其少見的，據說從北邊帶回去的馬櫻花。他的太太却正相反，什麼莫名其妙，曾將曬衣服的竹竿攔

在珠蘭的枝條上，枝折了，還要憤憤地咒罵道：“死屍”。這老人是個寂寞者，因為無人可談，就很愛和孩子們往來，有時簡直稱我們“小友”。在我們聚族而居的宅子裏，只有他書多，而且特別。制藝和試帖詩，自然也是有的；但我却只在他的書齋裏，看見過陸璣的毛詩鳥獸草木蟲魚疏，還有許多名目很生的書籍。我那時最愛看的是花鏡，上面有許多圖。他說給我聽，曾經有過一部繪圖的山海經，畫着人面的獸，九頭的蛇，三脚的鳥，生着翅膀的人，沒有頭而以兩乳當作眼睛的怪物。……可惜現在不知道放在那里了。

我很願意看看這樣的圖畫，但不好意思力逼他去尋找，他是很疏懶的。問別人呢，誰也不肯真實地回答我。壓歲錢有幾百文，買罷，又沒有好機會。有書買的大街離我家遠得很，我一年中只能在正月間去玩一趟，那時候，兩家書店都緊緊關着門。

玩的時候倒是沒有什麼的，但一坐下，我就記得繪圖的山海經。

大概是太過於念念不忘了，連阿長也來問山海經是怎麼一回事。這是我向來沒有和她說過的，我知道她並非學者，說了也無益；但既然來問，也就對她說了。

過了十多天，或者一個月罷，我還很記得，是她告假回家以後的四五天，她穿着新的藍布衫回來了，一見面，

就將一包書遞給我，高興地說道：——

“哥兒，有畫兒的‘三哼經’，我給你買來了！”

我似乎遇着一個霹靂，全體都震悚起來；趕緊去接過來，打開紙包，是四本小小的書，略略一翻，人面的獸，九頭的蛇，……果然都在內。

這又使我發生新的敬意了，別人不肯做，或不能做的事，她卻能夠做成功。牠確有偉大的神力。謀害隱鼠的怨恨，從此完全消滅了。

這四本書，乃是我最初得到，最爲心愛的寶書。

書的模樣，到現在還在眼前。可是從還在眼前的模樣來說，却是一部刻印都十分粗拙的本子。紙張很黃；圖象也很壞；甚至幾乎全用直線湊合，連動物的眼睛也都是長方形的。但那是我最爲心愛的寶書，看起來，確是人面的獸；九頭的蛇；一脚的牛；袋子似的帝江；沒有頭而“以乳爲目，以臍爲口”，還有“執干戚而舞”的刑天。

此後我就更其搜集繪圖的書，于是有了石印的爾雅音圖和毛詩品物圖攷，又有了點石齋叢書和詩畫舫。山海經也另買了一部石印的，每卷都有圖讀，綠色畫，字是紅的，比那木刻的精緻得多了。這一部直到前年還在，是縮印的郝懿行疏。木刻的却已經記不清是什麼時候失掉了。

我的保姆，長媽媽即阿長，辭了這人世，大概也有了三十年了罷。我終于不知道她的姓名，她的經歷；僅知道

有一個過繼的兒子，她大約是青年守寡的孤孀。

仁厚黑暗的地母呵，願在你懷裏永安她的魂靈！

我們那時有什麼可看呢，只要略有圖畫本子，就要被塾師，就是當時的“引導青年的前輩”禁止，訶斥，甚至至于打手心。我的小學同學因為專讀“人之初性本善”讀得要枯燥而死了，只好偷偷地翻開第一葉，看那題着“文星高照”四個字的惡鬼一般魁星像，來滿足他幼稚的愛美的天性，昨天看這個，今天也看這個，然而他們的眼睛裏還閃出蘇醒和歡喜的光輝來。

在書塾以外，禁令可比較的寬了，但這是說自己的事，各人大概不一樣。我能在大眾面前冠冕堂皇地閱看的，是文昌帝君陰騭文圖說和玉歷鈔傳，都畫着冥冥之中賞善罰惡的故事，雷公電母站在雲中，牛頭馬面布滿地下，不但“跳到半天空”是觸犯天條的，即使半語不合，一念偶差，也都得受相當的報應。這所報的也並非“睚眦之怨”，因為那地方是鬼神為君，“公理”作宰，請酒下跪，全都無功，簡直是無法可想。

我所看的那些陰間的圖畫，都是家藏的老書，並非我所專有。我所收得的最先的畫圖本子，是一位長輩的贈品：二十四孝圖。這雖然不過薄薄的一本書，但是下圖上

說，鬼少人多。又爲我一人所獨有，使我高興極了。那裏面的故事，似乎是誰都知道的；便是不識字的人，例如阿長，也只要一看圖畫便能夠滔滔地講出這一段的事迹。但是，我於高興之餘，接着就是掃興，因爲我請人講完了二十四個故事之後，纔知道“孝”有如此之難，對於先前癡心妄想，想做孝子的計劃，完全絕望了。

要到東關看五猖會去了。這是我兒時所罕逢的一件盛事。因爲那會是全縣中最盛的會，東關又是離我家很遠的地方，出城還有六十多里水路，在那裏有兩座特別的廟。一是梅姑廟，就是聊齋志異所記，室女守節，死後成神，却篡取別人的丈夫的，現在神座上確塑着一對少年男女，眉開眼笑，殊與“禮教”有妨。其一便是五猖廟了，名目就奇特。據有考據癖的人說：這就是五通神。然而也並無確據。神像是五個男人，也不見有什麼媚獠之狀；後面列坐着五位太太，却並不“分坐”遠不及北京戲園裏界限之謹嚴。其實呢，這也是殊與“禮教”有妨的，——但他們既然是五猖，便也無法可想，而且自然也就“又作別論”了。

因爲東關離城遠，大清早大家就起來。昨夜預定好的三道明瓦窗的大船，已經泊在河埠頭，船椅，飯菜，茶炊，點心盒子，都在陸續搬下去了。我笑着跳着，催他們要搬得快。忽然，工人的臉色很謹肅了，我知道有些蹊蹺，四面

一看，父親就站在我背後。

“去拿你的書來。”他慢慢地說。

這所謂“書”是指我開蒙時候所讀的鑑略。因為我再沒有第二本了。我們那裏上學的歲數是多揀單數的，所以這使我記住我其時是七歲。

我忐忑着，拿了書來了。他使我同坐在堂中央的桌子前，教我一句一句地讀下去。我擔着心，一句一句地讀下去。

兩句一行，大約讀了二三十行罷，他說：——

“給我讀熟。背不出，就不准去看會。”

他說完，便站起來，走進房裏去了。

我似乎從頭上澆了一盆冷水。但是，有什麼法子呢？自然是讀着，讀着，強記着，——而且要背出來。

粵自古盤， 生於太荒，
首出御世， 肇開混茫。

這是這樣的書，我現在只記得前四句，別的都忘却了；那時所強記的二三十行，自然也一齊忘却在裏面了。記得那時聽人說，讀鑑略比讀千字文百家姓有用得多，因為可以知道從古到今的大概。知道從古到今的大概，那當然是很好的，然而我一字也不懂。“粵自盤古”就是“粵自盤古”，讀下去，記住牠，“粵自盤古”呵！“生於太荒”呵！……

應用的物件已經搬完，家中由忙亂轉成靜肅了。朝陽照着西牆，天氣很清朗。母親，工人，長媽媽即阿長，都無法營救，只默默地靜候着我讀熟，而且背出來。在百靜中，我似乎頭裏要伸出許多鐵鉗，將什麼“生於太荒”之流夾住；也聽到自己急急誦讀的聲音發着抖，彷彿深秋的蟋蟀，在夜中鳴叫似的。

他們都等候着；太陽也升得更高了。

我忽然似乎已經很有把握，便即站了起來，拿書走進父親的書房，一氣背將下去，夢似的就背完了。

“不錯。去罷。”父親點着頭，說。

大家同時活動起來，臉上都露出笑容，向河埠走去。工人將我高高地抱起，彷彿在祝賀我的成功一般，快步走在最前頭。

我却並沒有他們那麼高興。開船以後，水路中的風景，盒子裏的點心，以及到了東關的五猖會的熱鬧，對於我似乎都沒有什麼大意思。

直到現在，別的完全忘却，不留一點痕迹了；只有背誦鑑略這一段，却還分明如昨日事。

我至今一想起，還詫異我的父親何以要在那時候叫我來背書。

我在小學的時候，看同學們變小戲法，“耳中聽字”

呀，“紙人出血”呀，很以為有趣。廟會時就有傳授這些戲法的人，幾枚銅元一件，學得來時，倒從此索然無味了。

進中學是在城裏，於是興致勃勃的看大戲法，但後來有人告訴了我戲法的祕密，我就再不高興走近圈子的旁邊。

咸豐年間，或一省裏，還有因為能照相而家產被鄉下人搗毀的事情。但當我幼小的時候，——即三十年前，紹興城卻已有照相館了，大家也不甚疑懼。雖然當鬧“義和拳民”時——即二十五年前，或一省裏，還以罐頭牛肉當作洋鬼子所殺的中國孩子的肉看。然而這是例外，萬事萬物，總不免有例外的。

要之，紹興城早有照相館了，這是我每一經過，總須流連賞玩的地方，但一年中也不過經過四五回。大小長短不同顏色不同的玻璃瓶，又光滑又有刺的仙人掌，在我都是珍奇的物事；還有掛在壁上的框子裏的照片：曾大人，李大人，左中堂，鮑軍門。一個族中的好心的長輩，曾經藉此來教育我，說這許多都是當今的大官，平“長毛”的功臣，你應該學學他們。我那時也很願意學，然而想，也須趕快仍復有“長毛”。

我家的後面有一個很大的園，相傳叫作百草園。現在是早已併屋子一起賣給朱文公的子孫了，連那最末次的

相見也已經隔了七八年，其中似乎確鑿只有一些野草；但那時却是我的樂園。

不必說碧綠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欄，高大的皂莢樹，紫紅的桑椹；也不必說鳴蟬在樹葉裏長吟，肥胖的黃蜂伏在菜花上，輕捷的叫天子（雲雀）忽然從草間直竄向雲霄裏去了。單是周圍的短短的泥牆根一帶，就有無限趣味。油蛉在這裏低唱，蟋蟀們在這裏彈琴。翻開斷磚來，有時會遇見蜈蚣；還有斑蝥，倘若用手指按住牠的脊梁，便會拍的一聲，從後竅噴出一陣煙霧。何首烏藤和木蓮藤纏絡着，木蓮有蓮房一般的果實，何首烏有臃腫的根。有人說，何首烏根是有像人形的，喫了便可以成仙，我於是常常拔牠起來，草連不斷地拔起來，也曾因此弄壞了泥牆，却從來沒有見過有一塊根像人樣。如果不怕刺，還可以摘到覆盆子，像小珊瑚珠攢成的小球，又酸又甜，色味都比桑椹要好得遠。

長的草裏是不去的，因為相傳這園裏有一條很大的赤練蛇。

長媽媽曾經講給我一個故事聽：先前，有一個讀書人住在古廟裏用功，晚間，在院子裏納涼的時候，突然聽到有人在叫他，答應着，四面看時，却見一個美女的臉露在牆頭上。向他一笑，隱去了。他很高興；但竟給那走來夜談的老和尚識破了機關。說他臉上有些妖氣，一定遇見‘美

女蛇’了；這是人首蛇身的怪物，能喚人名，倘一答應，夜間便要來喫這人的肉的。他自然嚇得要死，而那老和尚却道無妨，給他一個小盒子，說只要放在枕邊，便可高枕而臥。他雖然照樣辦，却總是睡不着，——當然睡不着的。到半夜，果然來了，沙沙沙！門外像是風雨聲，他正抖作一團時，却聽得豁的一聲，一道金光從枕邊飛出，外面便什麼聲音也沒有了，那金光也就飛回來，斂在盒子裏。後來呢？後來，老和尚說：這是飛蜈蚣，牠能吸蛇的腦髓，美女蛇就被牠治死了。

結末的教訓是：所以倘有陌生的聲音叫你的名字，你萬不可答應他。

這故事很使我覺得做人之險，夏夜乘涼，往往有些擔心，不敢去看牆上，而且極想得到一盒老和尚那樣的飛蜈蚣。走到百草園的草叢旁邊時，也常常這樣想。但直到現在，總還沒有得到，但也沒有遇見過赤練蛇和美女蛇。叫我名字的陌生聲音自然是常有的，然而都不是美女蛇。

冬天的百草園比較的無味；雪一下，可就兩樣了。拍雪人（將自己的全形印在雪上）和塑雪羅漢需要人們鑒賞，這是荒園，人跡罕至，所以不相宜，只好來捕鳥。薄薄的雪，是不行的；總須積雪蓋了地面一兩天，鳥雀們久已無處覓食的時候纔好，掃開一塊雪，露出地面，用一枝短棒支起一面大的竹篩來，下面撒些粗穀，棒上繫一條長

繩，人遠遠地牽着，看鳥雀下來啄食，走到竹籬底下的時候，將繩子一拉，便罩住了。但所得的是麻雀居多，也有白頰的‘張飛鳥’，性子很躁，養不過夜的。

這是閩土的父親所傳授的方法，我却不大能用。明明見牠們進去了，拉了繩，跑去一看，却什麼都沒有，費了半天力，捉住的不過三四隻。閩土的父親是小半天便能捕獲幾十隻，裝在叉袋裏叫着撞着的。我曾經問他得失的緣由，他只靜靜地笑道：你太性急，來不及等牠走到中間去。

我不知道爲什麼家裏的人要將我送進書塾裏去了，而且還是全城中稱爲最嚴厲的書塾。也許是因爲拔何首烏毀了泥牆罷，也許是因爲將磚頭拋到隔壁的梁家去了罷，也許是因爲站在石井欄上跳了下來罷，……都無從知道。總而言之：我將不能常到百草園了。Ade，我的蟋蟀們！Ade，我的覆盆子們和木蓮們！

出門向東，不上半里，走過一道石橋，便是我的先生的家了。從一扇黑油的竹門進去，第三間是書房。中間掛着一塊扁道：三味書屋；扁下面是一幅畫，畫着一隻很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樹下。沒有孔子牌位，我們便對着那扁和鹿行禮。第一次算是拜孔子，第二次算是拜先生。

第二次行禮時，先生便和藹地在一旁答禮。他是一個高而瘦的老人，鬚髮都花白了，還戴着大眼鏡。我對他很恭敬，因爲我早聽到，他是本城中極方正，質樸，博學的

人。

不知從那裏聽來的，東方朔也很淵博，他認識一種蟲，名曰“怪哉”，冤氣所化，用酒一澆，就消釋了。我很想詳細地知道這故事，但阿長是不知道的，因為她畢竟不淵博。現在得到機會了，可以問先生。

“先生，‘怪哉’這蟲，是怎麼一回事？……”我上了生書，將要退下來的時候，趕忙問。

“不知道！”他似乎很不高興，臉上還有怒色了。

我纔知道做學生是不應該問這些事的，只要讀書，因為他是淵博的宿儒，決不至於不知道，所謂不知道者，乃是不願意說。年紀比我大的人，往往如此，我遇見過好幾回了。

我就只讀書，正午習字，晚上對課。先生最初這幾天對我很嚴厲，後來却好起來了，不過給我讀的書漸漸加多，對課也漸漸地加上字去，從三言到五言，終於到七言。

三味書屋後面也有一個園，雖然小；但在那裏也可以爬上花壇去折臘梅花，在地上或桂花樹上尋蟬蛻，最好的工作是捉了蒼蠅喂螞蟻，靜悄悄地沒有聲音。然而同窗們到園裏的太多，太久，可就不行了，先生在書房裏便大叫起來：——

“人都到那裏去了？！”

人們便一個一個陸續走回去；一同回去，也不行的。

他有一條戒尺，但是不常用，也有罰跪的規則，但也不常用，普通總不過瞪幾眼，大聲道：——

“讀書！”

於是大家放開喉嚨讀一陣書，真是人聲鼎沸。有唸“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的，有唸“笑人齒缺曰狗竇大開”的，有唸“上九潛龍勿用”的，有唸“厥土下上上錯厥貢苞茅橘柚”的……。先生自己也唸書。後來，我們的聲音便低下去，靜下去了，只有他還大聲朗讀着：——

“鐵如意，指揮倜儻，一座皆驚呢——；金叵羅，顛倒淋漓噫，千杯未醉嘖——……。”

我疑心這是極好的文章，因為讀到這裏，他總是微笑起來，而且將頭仰起，搖着，向後拗過去，拗過去。

先生讀書入神的時候，於我們是很相宜的。有幾個便用紙糊的盔甲套在指甲上做戲。我是畫畫兒，用一種叫作“荊川紙”的，蒙在小說的繡像上一個個描下來，像習字時候的影寫一樣。讀的書多起來，畫的畫也多起來；書沒有讀成，畫的成績却不少了，最成片段的是蕩寇志和西游記的繡像，都有一大本。後來，爲要錢用，賣給一個有錢的同窗了。他的父親是開錫箔店的；聽說現在自己已經做了店主而且快要升到紳士的地位了。這東西早已沒有了罷。

第三章 無需學費的學校

父親故去之後，我也還常到衍太太家裏去，不過已不是和孩子們玩耍了，却是和衍太太或她的男人談閒天。我其時覺得很有許多東西要買的，看的和喫的，只是沒有錢。有一天談到這里，她便說道，“母親的錢，你拿來用就是了，還不就是你的麼？”我說母親沒有錢，她就說可以拿首飾去變賣；我說沒有首飾，她却道，“也許你沒有留心。到大廚的抽屜裏，角角落落去尋去，總可以尋出一點珠子這類東西……。”

這些話我聽去似乎很異樣，便又不到她那里去了，但有時又真想去打開大廚，細細地尋一尋。大約此後不到一月，就聽到一種流言，說我已經偷了家裏的東西去變賣了，這實在使我覺得有如掉在冷水裏。流言的來源，我是明白的，倘是現在，只要有地方發表，我總要罵出流言家的狐狸尾巴來，但那時太年青，一遇流言，便連自己也彷彿覺得真是犯了罪，怕遇見人們的眼睛，怕受到母親的愛撫。

好，那麼，走罷！

但是，那里去呢？[紹興]城人的臉早經看熟，如此而已，連心肝也似乎有些了然。總得尋別一類人們去，去尋爲紹興人所詬病的人們，無論其爲畜生或魔鬼，那時爲全城所笑罵的是一個開得不久的學校，叫作中西學堂，漢文之外，又教些洋文和算學。然而已經成爲衆矢之的了；熟讀聖賢書的秀才們，還集了四書的句子，做一篇八股來嘲誚牠，這名文便即傳遍了全城，人人當作有趣的話柄。我只記得那“起聲”的開頭是：——

“徐子以告夷子曰：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于夷者也。今也不然：鳩舌之音，聞其請，皆雅言也，……”

以後可忘却了，大概也和現今的國粹保存大家的議論差不多。但我對於這中西學堂，却也不滿足，因爲那裏面只教漢文，算學，英文和法文，功課較爲別致的，還有杭州的求是書院，然而學費貴。

我漸至連極少的學費也無法可想，我的母親便給我籌辦了一點旅費，教我去尋無需學費的學校去。因爲我總不肯做幕友或商人，——這是我鄉裏破落了的讀書人家子弟所常走的兩條路。

其時我是十八歲，便旅行到南京，考入水師學校，分在機關科。

彷彿是想走異路，逃異地，去尋求別樣的人們。

我的母親沒有法，辦了八元的川資，說是由我的自便；然而伊哭了，這正是情理中的事，因為那時讀書應試正路，所謂學洋務，社會上便以為是一種走投無路的人，只得將靈魂賣給鬼子，要加倍的笑落而且排斥的，而况伊又看不見自己的兒子了。然而我也顧不得這些事，終於到[南京]去進了[水師]學堂了。

無須學費的學校在南京，自然只好往南京去。第一個進去的學校，目下不知道稱為什麼了，光復以後，似乎有一時稱為雷電學堂，很像封神榜上“太極陣”“混元陣”一類的名目。總之，一進儀鳳門，便可以見牠那二十丈高的桅杆和不知多高的煙囪。功課也簡單，一星期中，幾乎四整天是英文：“It is a cat.” “Is it a rat?” 一整天是讀漢文：“君子曰，穎考叔可謂純孝也已矣，愛其母，施及莊公。” 一整天是做漢文：“知己知彼百戰百勝論”，“穎考叔論”，“雲從龍風從虎論”，“咬得茶根則百事可做論”。

初進去當然只能做三班生，臥室裏是一桌一櫈一牀，牀板只有兩塊。頭二班學生就不同了，二桌二櫈或三櫈一牀，牀板多至三塊。不但上講堂時挾着一堆厚而且大的洋書，氣昂昂地走着，決非只有一本潑賴媽和四本左傳的三班生所敢正視；便是空着手，也一定將肘彎撐開，像一隻螃蟹，低一班的在後面總不能走出他之前。這一種螃蟹

式的名公巨卿，現在都闊別得很久了，前四五年，竟在教育部的破脚躺椅上，發見了這姿勢，然而這位老爺却並非雷電學堂出身的，可見螃蟹態度，在中國也頗普遍。

可愛的是桅杆。但並非如“東鄰”的“支那通”所說，因為牠“挺然翹然”，又是什麼的象徵。乃是因為牠高，烏鴉喜鵲，都只能停在牠的半塗的木盤上。人如果爬到頂，便可以近看獅子山，遠眺莫愁湖，——但究竟是否真可以眺得那麼遠，我現在可委實有點記不清楚了。而且不危險，下面張着網，即使跌下來，也不過如一條小魚落在網子裏；況且自從張網以後，聽說也還沒有人曾經跌下來。

原先還有一過池，給學生學游泳的。這裏面却淹死了兩個年幼的學生。當我進去時，早填平了，不但填平，上面還造了一所小小的關帝廟。廟旁是一座焚化字紙的磚爐，爐口上橫寫着四個大字道：“敬惜字紙”。只可惜那兩個淹死鬼失了池子，難討替代，總在左近徘徊，雖然已有“伏魔大帝關聖帝君”鎮壓着。辦學的人大概是好心腸的，所以每年七月十五，總請一羣和尚到雨天操場來放餓口，一個紅鼻而胖的大和尚戴上毗盧帽，捏訣念咒：“迴資囉，普彌耶吽！唵耶吽！唵！耶！吽！！！”

我的前輩同學被關聖帝君鎮壓了一整年，就只在這時候得到一點好處，——雖然我並不深知是怎樣的好處。所以當這些時，我每每想做學生總得自己小心些。

總覺得不大合適，可是無法形容出這不合適來，現在是發見了大致相近的字眼了，“烏煙瘴氣”，庶幾乎其可也。只得走開。

大約過了半年，我又走出，改進礦路學堂去學開礦。

近來是單是走開也就不容易，“正人君子”者流，會說你罵人罵到了聘書，或者是發“名士”脾氣，給你幾句正經的俏皮話。不過那時還不打緊，學生所得的津貼，第一年不過二兩銀子，最初三個月的試習期內是零用五百文。於是毫無問題，去考礦路學堂去了，也許是礦路學堂，已經有些記不真，文憑又不在手頭，更無從查考。試驗並不難，錄取的。

這回不是 *It is a cat* 了。是 *Der Mann, DieWeib, Das Kind*。漢文仍舊是“穎考叔可謂純孝也已矣”，但外加小學集註。論文題目也小有不同，譬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論”，是先前沒有做過的。

此外還有所謂格致，地學，金石學，……都非常新鮮，但是還得聲明：後兩項，就是現在之所謂地質學和礦物學，並非講與地和鐘鼎碑版的。只是畫鐵軌橫斷面圖却有些麻煩，平行線尤其討厭，但第二年的總辦是一個新黨，他坐在馬車上的時候大抵看着時務報，考漢文也自己出題目，和教員出的很不同。有一次是“華盛頓論”，漢文

教員反而惴惴地來問我們道：“華盛頓是什麼東西呀？……”

看新書的風氣便流行起來，我也知道了中國有一部書叫天演論。星期日跑到城南去買了來，白紙石印的一厚本，價五百文正。翻開一看，是寫得很好的字，開首便道：

“赫胥黎獨處一室之中，在英倫之南，背山而面野，檻外諸境，歷歷如在机下。乃懸想二千年前，當羅馬大將愷撒未到時，此間有何景物？計惟有天造草昧……”

哦！原來世界上竟還有一個赫胥黎坐在書房裏那麼想，而且想得那麼新鮮？一口氣讀下去，“物競”“天擇”也出來了，蘇格拉第柏拉圖也出來了，斯多噶也出來了。學堂裏又設立了一個閱報處，時務報不待言，還有譯學彙編，那書面上的張廉卿一流的四個字，就蓋得很可愛。

“你這孩子有點不對了，拿這篇文章去看去，抄下來去看去。”一位本家的老輩嚴肅地對我說，而且遞過一張報紙來。接來看時，“臣許應騤跪奏……”，那文章現在是一句也不記得了，總之是參康有為變法的；也不記得可曾抄了沒有。

仍然自己不覺得有什麼‘不對’，一有閒空，就照例地喫倭餅，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論。

但我們也曾經有過一個很不平安的時期。那是第二

年，聽說學校就要裁撤了。這也無怪。這學堂的設立，原是因為兩江總督（大約是劉坤一罷）聽到青龍山的煤礦出息好，所以開手的。待到開學時，煤礦那面却已將原先的技師辭退，換了一個不甚了然的人了。理由是：一，先前的技師薪水太貴；二，他們覺得開煤礦並不難。於是不到一年，就連煤在那里也不甚了然起來，終於是所得的煤，只能供燒那兩架抽水機之用，就是抽了水掘煤，掘出煤來抽水，結一筆出入兩清的賬。既然開礦無利，礦路學堂自然也就無須乎開了，但是不知怎的，却又並不裁撤。到第三年我們下礦洞去看的時候，情形實在頗淒涼，抽水機當然還在轉動，礦洞裏積水却有半尺深，上面也點滴而下，幾個礦工便在這裏面鬼一般工作着。

畢業，自然大家都盼望的，但一到畢業，却又有些爽然若失。爬了幾次桅，不消說不配做半個水兵；聽了幾年講，下了幾回礦洞，就能掘出金銀銅鐵錫來麼？實在連自己也茫無把握，沒有做‘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論’的那麼容易。爬上天空二十丈和鑽下地面二十丈，結果還是一無所能，學問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了。所餘的只還有一條路：到外國去。

留學的事，官僚也許可了，派定五名到日本去。其中的一個因為祖母哭得死去活來，不去了，只贖了四個。日本是同中國很兩樣的，我們應該如何準備呢？有一個前輩

同學在比我們早一年畢業，曾經游歷過日本，應該知道些情形。跑去請教之後，他鄭重地說：——

“日本的襪是萬不能穿的，要多帶些中國襪。我看紙票也不好，你們帶去的錢不如都換了他們的現銀。”

四個人都說遵命。別人不知其詳，我是將錢都在上海換了日本的銀元，還帶了十雙中國襪——白襪。

後來呢？後來，要穿制服和皮鞋，中國襪完全無用；一元的銀圓日本早已廢置不用了，又賠錢換了半元的銀圓和紙票。

我在南京的學堂做學生的時候，也曾經因這“釗”字碰過幾個小釘子，但自然因為我自己不“安分”。一個新的職員到校了，勢派非常之大，學者似的，很傲然。可惜他不幸遇見了一個同學叫“沈釗”的。就倒了楣，因為他叫他“沈鈞”，以表白自己的不識字。於是我們一見面就譏笑他，就叫他為“沈鈞”，並且由譏笑而至於相罵。兩天之內，我和十多個同學就疊連記了兩小過兩大過；再記一小過，就要開除了。但開除在我們那個學校裏並不算什麼大事件，大堂上還有軍令，可以將學生殺頭的。做那里的校長這纔威風呢，——但那時的名目却叫作“總辦”的，資格又須是候補道。

假使那時也像現在似的專用高壓手段，我們大概是

早經“正法”。

在這學堂裏，我纔知道世上還有所謂格致，算學，地理，歷史，繪圖和體操。生理學並不教，但我們却看到些木版的全體新論和化學衛生論之類了，我還記得先前的醫生的議論和方藥，和現在所知道的比較起來，便漸漸的悟得中醫不過是種有意的或無意的騙子，同時又很起了對於被驅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從譯出的歷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維新是大半發端於西方醫學的事實。

第四章 從南京到日本

因為這些幼稚的知識，後來便使我的學籍列在日本一個鄉間的醫學專門學校裏了，我的夢很美滿，豫備卒業回來，救治像我父親似的被誤的病人的疾苦，戰爭時候便去當軍醫，一面又促進了國人對於維新的信仰。

待到在東京的豫備學校畢業，我已經決意要學醫了，原因之一是因為我確知道了新的醫學對於日本的維新有很大的助力。

我已不知道教授微生物學方法，現在又有了怎樣的進步了，總之那時是用了電影，來顯示微生物的形狀的，因此有時講義的一段落已完，而時間還沒有到，教師便映些風景或時事的畫片給學生看，以用去這多餘的光陰。其時正當日俄戰爭的時候，關於戰事的畫片自然也就比較的多，我在這一個學堂中，便須常常隨喜我那同學們的拍手和喝采。有一回，我竟在畫片上忽然會見我久違的許多中國人了，一個綁在中間，許多站在左右，一樣是強壯

的體格，而顯出麻木的神情，據解說，則綁着的是替俄國做了軍事上的偵探，正要被日軍砍下頭顱來示衆，而圍着的便是來賞鑑這示衆的盛舉的人們。

這一學年沒有完畢，我已經到了東京了，因為從那一回以後，我便覺得醫學並非一件緊要事，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衆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於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於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

在東京的留學生很有學法政理化以至警察工業的，但沒有人治文學和美術；可是在冷淡的空氣中，也幸而尋到幾個同志了，此外又邀集了必須的幾個人，商量之後，第一步當然是出雜誌，名目是取“新的生命”的意思。因為我們那時大抵帶些復古的傾向，所以只謂之新生。

新生的出版之期接近了，但最先就隱去了若干擔當文字的人，接着又逃走了資本，結果只剩下不名一錢的三個人。創始時候既已背時，失敗時候當然無可告語，而其後却連這三個人也都為各自的運命所驅策，不能在一處縱談將來的好夢了，這就是我們的並未產生的新生的結局。

我感到未嘗經驗的無聊，是自此以後的事。我當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後來想，凡有一人的主張，得了贊和，是促其前進的，得了反對，是促其奮鬪的，獨有叫喊於生人中，而生人並無反應，既非贊同，也無反對，如置身毫無邊際的荒原，無可措手的了，這是怎樣的悲哀呵，我於是以致我所感到者為寂寞。

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長大起來，如大毒蛇，纏住了我的靈魂了。

然而我雖然自有無端的悲哀，却也並不憤懣，因為這經驗使我反省，看見自己了：就是我決不是一個振臂一呼應者雲集的英雄。

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驅除的，因為這於我太痛苦。我於是用了種種方法，來麻醉自己的靈魂，使我沉入於國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後來也親歷或旁觀過幾樣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都為我所不顧追懷，甘心使他們和我的腦一同消滅在泥土裏的，但我的麻醉法却也已經奏了功，再沒有青年時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

東京也無非是這樣。上野的櫻花爛漫的時節，望去確也像緋紅的輕雲，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羣結隊的“清國留學生”的速成班，頭頂上盤着大辮子，頂得學生制帽的頂上高高聳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辮子，盤得平的，除

下帽來，油光可鑑，宛如小姑娘的髮髻一般，還要將鬚子扭幾扭。實在標緻極了。

中國留學生會館的門房裏有幾本書買，有時還值得去一轉；倘在上午，裏面的幾間洋房裏倒也還可以坐坐的。但到傍晚，有一間的地板便常不免要咚咚地響得震天，兼以滿房煙塵斗亂；問問精通時事的人，答道：“那是在學跳舞。”

到別的地方去看看，如何呢？

我就往仙台的醫學專門學校去。從東京出發，不久便到一處驛站，寫道：日暮里；不知怎地，我到現在還記得這名目。其次却只記得水戶了；這是明的遺民朱舜水先生客死的地方。仙台是一個市鎮，並不大；冬天冷得利害；還沒有中國的學生。

大概是物以希為貴罷。北京的白菜運往浙江，便用紅頭繩繫住菜根，倒掛在水果店頭，尊為“膠菜”；福雀野生着的蘆薈，一到北京就請進溫室，且美其名曰“龍舌蘭”。我到仙台也頗受了這樣的優待，不但學校不收學費，幾個職員還為我的食宿操心。我先是住在監獄旁邊一個客店裏的，初冬已經頗冷，蚊子却還多，後來用被蓋了全身，用衣服包了頭臉，只留兩個鼻孔出氣。在這呼吸不息的地方，蚊子竟無從插嘴，居然睡安穩了。飯食也不壞。但一位

先生却以爲這客店也包辦囚人的飯食，我住在那里不相宜，幾次三番，幾次三番地說。我雖然覺得客店兼辦囚人的飯食和我不相干，然而好意難却，也只得別尋相宜的住處了。於是搬到別一家，離監獄也很遠，可惜每天總要喝難以下咽的芋梗湯。

從此就看見許多陌生的先生；聽到許多新鮮的講義。解剖學是兩個教授分任的。最初是骨學，其時進來的是一個黑瘦的先生，八字鬚，戴着眼鏡，挾着一疊大大小小的書。一將書放在講臺上，便用了緩慢而很有頓挫的聲調，向學生介紹自己道：——

“我就是叫作藤野嚴九郎的……”

後面有幾個人笑起來了。他接着便講述解剖學在日本發達的歷史，那些大大小小的書，便是從最初到現今關於這一門學問的著作。起初有幾本是線裝的；還有翻刻中國譯本的。他們的翻譯和研究新的醫學，並不比中國早。

那坐在後面發笑的是上學年不及格的留級學生，在校已經一年，掌故頗爲熟悉的了。他們便給新生講演每個教授的歷史。這藤野先生，據說是穿衣服太模糊了，有時竟會忘記帶領結；冬天是一件舊外套，寒顛顛的，有一回上火車去，致使管車的疑心他是扒手，叫車裏的客人大家小心些。

他們的話大概是真的。我就親見他有一次上講堂沒

有帶領結。

過了一星期，大約是星期六，他使助手來叫我了。到得研究室，見他坐在八骨和許多單獨的頭骨中間，——他其時正在研究着頭骨，後來有一篇論文在本校的雜誌上發表出來。

“我的講義，你能抄下來麼？”他問。

“可以抄一點。”

“拿來我看！”

我交出所抄的講義去，他收下了，第二三天便還我，並且說，此後每一星期要送給他看一回。我拿下來打開看時，很喫了一驚，同時也感到一種不安和感激。原來我的講義已經從頭到尾，都用紅筆添改過了，不但增加了許多脫漏的地方，連文法的錯誤，也都一一訂正。這樣一直繼續到教完了他所擔任的功課：骨學，血管學，神經學。

可惜我那時太不用功，有時也很任性。還記得有一回藤野先生將我叫到他的研究室裏去，翻出我那講義上的一個圖來，是下臂的血管，指着，向我和藹的說道：——

“你看，你將這條血管移了一點位置了。——自然，這樣一移，的確比較的好看些，然而解剖圖不是美術，實物是那麼樣的，我們沒法改換牠，現在我給你改好了，以後你要全照着黑板上那樣的畫。”

但是我還不服氣，口頭答應着，心裏却想道：——

“圖還是我畫的不錯；至於實在的情形，我心裏自然記得的。”

學年試驗完畢之後，我便到東京玩了一夏天，秋初再回學校，成績早已發表了，同學一百餘人之中，我在中間不過是沒有落第。這回藤野先生所擔任的功課，是解剖實習和局部解剖學。

解剖實習了大概一星期，他又叫我去，很高興地，仍用了極有抑揚的聲調對我說道：——

“我因為聽說中國人是很敬重鬼的，所以很擔心，怕你不肯解剖屍體。現在總算放心了。沒有這回事。”

但他也偶有使我很為難的時候。他聽說中國的女人是裹腳的，但不知道詳細，所以要問我怎麼裹法，足骨變成怎樣的畸形，還歎息道，“總要看一看纔知道。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

有一天，本級的學生會幹事到我寓裏來了，要借我的講義看。我檢出來交給他們，却只翻檢了一通，並沒有帶走。但他們一走，郵差就送到一封很厚的信，拆開看時，第一句是：——

“你改悔罷！”

這是新約上的句子罷，但經託爾斯泰新近引用過的。其時正值日俄戰爭，託老先生便寫了一封給俄國和日本的皇帝的信，開首便是這一句。日本報紙上很斥責他的不

遜，愛國青年也憤然，然而暗地裏却早受了他的影響了，其次的話，大略是說上年解剖學試驗的題目，是藤野先生講義上做了記號，我像先知道的，所以能有這樣的成績。末尾是匿名。

我這纔回憶到前幾天的一件事：因為要開同級會，幹事便在黑板上寫廣告，末一句是‘請全數到會勿漏為要’，而且在‘漏’字旁邊加了一個圈。我當時雖然覺到圈得可笑，但是毫不介意，這回纔悟出那字也在譏刺我了，猶言我得了教員漏洩出來的題目。

我便將這事告知了藤野先生；有幾個和我熟識的同學也很不平，一同去詰責幹事託辭檢查的無禮，並且要求他們將檢查的結果，發表出來。終於這流言消滅了，幹事却又竭力運動，要收回那一封匿名信去。結末是我便將這託爾斯泰式的信退還了他們。

中國是弱國，所以中國人當然是低能兒，分數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無怪他們疑惑。但我接着便有參觀鎗斃中國人的命運了。第二年添教微菌學，細菌的形狀是全用電影來顯示的，一段落已完而還沒有到下課的時候，便影幾片時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戰勝俄國的情形。但偏有中國人夾在裏邊：給俄國人做偵探，被日本軍捕獲，要鎗斃了，看着看的也是一羣中國人；在講堂裏的還有一個我。

“萬歲！”他們都拍掌歡呼起來。

這種歡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這一聲却特別聽得刺耳。此後回到中國來，我看見那些開看鎗斃犯人的人們，他們也何嘗不酒醉似的喝采，——嗚呼，無法可想；但在那時那地，我的意見却變化了。

到第二學年的終結，我便去尋藤野先生，告訴他我將不學醫學，並且離開這仙台。他的臉色彷彿有些悲哀，似乎想說話，但竟沒有說。

“我想去學生物學，先生教給我的學問，也還有用的。”其實我並沒有決意要學生物學，因為看得他有些悽然，便說了一個慰安他的謊話。

“爲醫學而教的解剖學之類，怕於生物學也沒有什麼大幫助。”他歎息說。

將走的前幾天，他叫我到他家裏去，交給我一張照相，後面寫着兩個字道：“惜別”，還說希望將我的也送他。但我這時適值沒有照相了；他便叮囑我將來照了寄給他，並且時時通信告訴他此後的狀況。

我離開仙台之後，就多年沒有照過相，又因爲狀況也無聊，說起來無非使他失望，便連信也怕敢寫了。經過的年月一多，話更無從說起，所以雖然有時想寫信，却又難以下筆，這樣的一直到現在，竟沒有寄過一封信和一張照片。從他那一面看起來，是一去之後，杳無消息了。

但不知怎地，我總還時時記起他，在我所認為我師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給我鼓勵的一個。有時我常常想：他的對於我的熱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誨，小而言之，是為中國，就是希望中國有新的醫學；大而言之，是為學術，就是希望新的醫學傳到中國去。他的性格，在我的眼裏和心裏是偉大的，雖然他的姓名並不為許多人所知道。

他所改正的講義，我曾經訂成三厚本，收藏着的，將作為永久的紀念。不幸七年前遷居的時候，中塗毀壞了一口書箱，失去半箱書，恰巧這講義也遺失在內了。責成運送局去找尋，寂無回信。只有他的照相至今還掛在我北京寓居的東牆上，書桌對面。每當夜間疲倦，正想偷懶時，仰面在燈光中瞥見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說出抑揚頓挫的話來，便使我忽又良心發現，而且增加勇氣了，於是點上一枝煙，再繼續寫些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惡痛疾的文字。

記得在日本留學時候，有些同學問我在中國最有大利的買賣是什麼，我答道：“造反”。他們便大駭怪。在萬世一系的國度裏，那時聽到皇帝可以一脚踢落，就如我們聽說父母可以一棒打殺一般。

前清光緒末年，我在日本東京留學，親自看見的。那

時的留學生中，很有一部分抱着革命的思想，而所謂革命者，其實是種族革命，要將土地從羅族的手裏取得歸還舊主人。除實行之外，有些人是辦報，有些人是鈔舊書。所鈔的大抵是中國所沒有的禁書，所講的大概是明末清初的情形，可以使青年猛省的。久之印成了一本書，因為是湖北學生界的特刊，所以名曰漢聲，那封面上就題着四句古語：據懷舊之蓄念，發思古之幽情，光祖宗之玄靈，振大漢之天聲！

這是明明白白，叫我們想想漢族繁榮時代和現狀比較一下，看是如何，——必須“光復舊物”。說得露骨些，就是“排滿”；推而廣之，就是“排外”。

這裏還應該補敘一點的，是當我留心文學的時候，情形和現在很不同：在中國，小說不算文學，做小說的也決不能稱為文學家，所以並沒有人想在這一條道路上出世。我也並沒有要將小說抬進“文苑”裏的意思，不過想利用他的力量，來改良社會。

但也不是自己想創作。注重的倒是在紹介，在翻譯，而尤其注重於短篇，特別是被壓迫的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因為那時正盛行着排滿論，有些青年，都引那叫喊和反抗的作者為同調的。所以小說作法之類，我一部都沒有看過，看短篇小說卻不少，小半是自己也愛看，大半則

因了搜尋介紹的材料。也看文學史和批評，這是因為想知道作者的爲人和思想，以便決定應否介紹給中國和學問之類，是絕不相干的。

因爲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勢必至於傾向了東歐，因此所看的俄國，波蘭，以及巴爾幹諸小國作家的東西就特別多。也曾熱心的搜求印度，埃及的作品，但是得不到。記得當時最愛看的作者，是俄國的果戈理 (N. Gogol) 和波蘭的顯克微支 (H. Sienkiewicz)，日本的，是夏目漱石和森鷗外。

回想起來，在年青時候，讀了偉大的文學者的作品，雖然敬服那作者，然而總不能愛的，一共有兩個人。一個是但丁，那神曲的煉獄裏，就有我所愛的異端在；有些鬼魂還在把很重的石頭，推上峻峭的巖壁去。這是極吃力的工作，但一鬆手，可就立刻壓爛了自己。不知怎地，自己也好像很是疲乏了。於是我就在這地方停住，沒有能夠走到天國去。

還有一個，就是陀思妥夫斯基。一讀他二十四歲時所作的窮人，就已經吃驚於他那暮年似的孤寂。到後來，他竟作爲罪孽深重的罪人，同時也是殘酷的拷問官而出現了。他把小說中的男男女女，放在萬難忍受的境遇裏來試煉它們，不但剝去了表面的潔白，拷問出藏在底下的罪

惡，而且還要拷問出藏在那罪惡之下的真正的潔白來，而且還不肯爽利的處死，竭力要放它們活得長久。而這陀思妥夫斯基，則彷彿就在和罪人一同苦惱，和拷問官一同高興着似的。這決不是平常人做得到的事情，總而言之，就因為偉大的緣故。但我自己，却常常想廢書不觀。

第五章 回國

我就從日本回到故鄉來，嘴上就留着宋太祖或什麼宗似的向上翹起的鬍子，坐在小船裏，和船夫談天。

“先生，你的中國話說得真好。”後來，他說。

“我是中國人，而且和你是同鄉，怎麼會……”

“哈哈，你這位先生還會說笑話。”

記得我那時的沒奈何，確乎比看見X君的通信要超過十倍。我那時隨身並沒有帶着家譜，確乎不能證明我是中國人。即使帶着家譜，而上面只有一個名字，並無畫像，也不能證明這名字就是我，即使有畫像，日本人會假造從漢到唐的石刻，宋太祖或什麼宗的畫像，難道偏不會假造一部木版的家譜麼？

凡對於以真話為笑話的，以笑話為真話的，以笑話為笑話的，只有一個方法：就是不說話。

於是我從此不說話。

然而，倘使在現在我大約還要說：“噯，噯，……今天天氣多麼好呀？……那邊的村子叫什麼名字？……”因為

我實在比先前似乎油滑得多了，——好了。

現在我想，船夫的改變我的國籍，大概和文君的高見不同。其原因只在於鬍子罷，因為我從此常常為鬍子受苦。

國度會亡，國粹家是不會少的，而只要國粹家不少，這國度就不算亡。國粹家者，保存國粹者也；而國粹者，我的鬍子是也。這雖然不知道是什麼“邏輯”法，但當時的實情確是如此的。

“你怎麼學日本人的樣子，身體既矮小，鬍子又這樣，……”一位國粹家兼愛國者發過一篇崇論宏議之後，就達到這一個結論。

可惜我那時還是一個不識世故的少年，所以就憤憤地爭辯。第一，我的身體是本來只有這樣高，並非故意設法用什麼洋鬼子的機器壓縮，使他變成矮小，希圖冒充。第二，我的鬍子，誠然和許多日本人的相同，然而我雖然沒有研究過他們的鬍鬚樣式變遷史，但曾經見過幾幅古人的畫像，都不向上，只是向外，向下，和我們的國粹差不多。維新以後，可是翹起來了，那大約是學了德國式。你看威廉皇帝的鬍鬚，不是上指眼梢，和鼻梁正作平行麼？雖然他後來因為吸煙燒了一邊，只好將兩邊都剪平了。但在日本明治維新的時候，他這一邊還沒有失火……。

我的辮子留在日本，一半送給客店裏的一位使女做

了假髮，一半給了理髮匠，人是在宣統初年回到故鄉來了。一到上海，首先得裝假辮子。這時上海有一個專裝假辮的專家，定價每條大洋四元，不折不扣，他的大名，大約那時的留學生都知道。做也真做得巧妙，只要別人不留心，是很可以不出岔子的，但如果人知道你原是留學生，留心研究起來，那就漏洞百出。夏天不能戴帽，也不大行，人堆裏要防擠掉或擠歪，也不行。裝了一個多月，我想如果在路上掉了下來或者被人拉下來，不是比沒有辮子更不好看麼？索性不裝了。賢人說過的：一個人做人要真實。

我一回國，就在浙江杭州的兩級師範學堂做化學和生理學教員，第二年就走出，到紹興中學堂去做教務長，第三年又走出，沒有地方可去，想在一個書店去做編譯員，到底被拒絕了。但革命也就發生，紹興光復後，我做了師範學校的校長。

我回中國的第一年在杭州做教員，還可以穿了洋服算是洋鬼子；第二年回到故鄉紹興中學去做學監，却連洋服也不行了，因為有許多人是認識我的，所以不管如何裝束，總不失為“裏通外國”的人，於是我所受的無辮之災，以在故鄉為第一。尤其應該小心的是滿洲人的紹興知府的眼睛，他每到學校來，總喜歡注視我的短頭髮，和我多說話。

學生們裏面，忽然起了剪辮風潮了，很有許多要剪掉。我連忙禁止，他們就舉出代表來詰問道：究竟有辮子好呢，還是沒有辮子好呢？我的不假思索的答覆是：沒有辮子好，然而我勸你們不要剪。學生是向來沒有一個說我“裏通外國”的，但從這時起，却給了我一個“言行不一致”的結語，看不起了。

“不亦快哉”！——到了一千九百十一年的一月，後來紹興也掛起白旗來，算是革命了，我覺得革命給我的好處，最大，最不能忘的是我從此可以昂頭露頂，慢慢的在街上走，再不聽到什麼嘲罵，幾個也是沒有辮子的老朋友從鄉下來，一見面就摩着自己的光頭，從心底裏笑了出來道：哈哈，終於也有了這一天了。

在東京的客店裏，我們大抵一起來就看報。學生所看的多是朝日新聞和讀賣新聞，專愛打聽社會上瑣事的就看二六新聞。一天早晨，開頭就看見一條從中來的電報，大概是：——

“安徽巡撫恩銘被 Jo Shiki Rin 刺殺，刺客就擒”。

大家一怔之後，便容光煥發地互相告語，並且研究這刺客是誰，漢字是怎樣三個字。但只要是紹興人，又不專看教科書的，却早已明白了。這是徐錫麟，他留學回國之後，在做安徽候補道，辦着巡警事務，正合於刺殺巡撫。

的地位。

大家接着就豫測也將被極刑，家族將被連累。不久，秋瑾姑娘在紹興被殺的消息也傳來了，徐錫麟是被挖了心，給恩銘的親兵炒食淨盡。人心很憤怒。有幾個人便祕密地開一個會，籌集川資；這時用得着日本浪人了，撕烏賊魚下酒，慷慨一通之後，他便登程去接徐伯蓀的家屬去。

照例還有一個同鄉會，弔烈士，罵滿洲；此後便有人主張打電報到北京，痛斥滿政府的無人道。會衆即刻分成兩派：一派要發電，一派不要發。我是主張發電的，但當我說出之後，即有一種鈍滯的聲音跟着起來：——

“殺的殺掉了。死的死掉了，還發什麼屁電報呢。”

這是一個高大身材，長頭髮，眼球白多黑少的人，看人總像在渺視。他蹲在席子上，我發言大抵就反對，我早覺得奇怪，注意着他的了，到這時纔打聽別人：說這話的是誰呢，有那麼冷？認識的人告訴我說：他叫范愛農，是徐伯蓀的學生。

我非常憤怒了，覺得他簡直不是人，自己的先生被殺了，連打一個電報還害怕，於是便堅執地主張要發電，同他爭起來。結果是主張發電的居多數，他屈服了。其次要推出人來擬電稿。

“何必推舉呢？自然是主張發電的人囉——。”他說。

我覺得他的話又在針對我，無理倒也並非無理的。但我便主張這一篇悲壯的文章必由深知烈士生平的人做，因為他比別人關係更密切，心裏更悲憤，做出來就一定更動人。於是又爭起來。結果是他不做，我也不做，不知誰承認做去了；其次是大家走散，只留下一個擬稿的和一兩個幹事，等候做好之後去拍發。

從此我總覺得這范愛農離奇，而且很可惡。天下可惡的人，當初以為是滿人，這時纔知道還在其次：第一倒是范愛農。中國不革命則已，要革命，首先就必須將范愛農除去。

然而這意見後來似乎逐漸淡薄，到底忘却了，我們從此也沒有再見面。直到革命的前一年，我在故鄉做教員，大概是春末時候罷，忽然在熟人的客座上看見了一個人，互相熟視了不過兩三秒鐘，我們便同時說：——

‘哦哦，你是范愛農！’

“哦哦，你是魯迅！”

不知怎地我們便都笑了起來，是互相的嘲笑和悲哀。他眼睛還是那樣，儼而奇怪，只這幾年，頭上却有了白髮了，但也許本來就有，我先前沒有留心到。他穿着很舊的布馬褂，破布鞋，顯得很寒素。談起自己的經歷來，他說他後來沒有了學費，不能再留學，便回來了。回到故鄉之後，又受着輕蔑，排斥，迫害，幾乎無地可容。現在是躲在鄉

下，教着幾個小學生糊口。但因為有時覺得很氣悶，所以也趁了航船進城來。

他又告訴我現在愛喝酒；於是我們便喝酒。從此他每一進城，必定來訪我，非常相熟了。我們醉後常談些愚不可及的瘋話，連母親偶然聽到了也發笑。一天我忽而記在東京開同鄉會時的舊事，便問他：——

“那一天你專門反對我，而且故意似的，究竟是什麼緣故呢？”

“你還不知道？我一向就討厭你的，——不但我，我們。”

“你那時之前，早知道我是誰麼？”

“怎麼不知道。我們到橫濱，來接的不就是子英和你麼？你看不起我們，搖搖頭，你自己還記得麼？”

我略略一想，記得的，雖然是七八年前的事。那時是子英來約我的，說到橫濱去接新來留學的同鄉。汽船一到，看見一大堆，大概一共有十多人，一上岸便將行李放到稅關上去候查，檢關吏在衣箱中翻來翻去，忽然翻出一雙繡花的弓鞋來，便放下公事，拿着仔細地看。我很不滿，心裏想，這些烏男人，怎麼帶這東西來呢。自己不注意，那時也許就搖了搖頭。檢驗完畢，在客店小坐之後，即須上火車。不料這一羣讀書人又在客車上讓起坐位來了，甲要乙坐在這位上，乙要丙去坐。揖讓未終，火車已開，身子一

搖，即刻跌倒了三四個。我那時也很不滿，暗地裏想：連火車上的坐位，他們也要分出尊卑來……。自己不注意，也許又搖了搖頭。然而那羣雍容揖讓的人物中就有范愛農，却直到這一天纔想到。豈但他呢，說起來也慚愧，這一羣裏，還有後來在安徽戰死的陳伯平烈士，被害的馬宗漢烈士，被囚在黑獄裏，到革命後纔見天日而身上永帶着匪刑的傷痕的也還有一兩人。而我都茫無所知，搖着頭將他們一併運上東京了。徐伯蔭雖然和他們同船來，却不在這車上，因為他在神戶就和他的夫人坐車走了陸路了。

我想我那時搖頭大約有兩回，他們看見的不知道是那一回。讓坐時喧鬧，檢查時幽靜，一定是在稅關上的那一回了，試問愛農，果然是的。

“我真不懂你們帶這東西做什麼？是誰的？”

“還不是我們師母的？”他瞪着他多白的眼。

“到東京就要假裝大腳，又何必帶這東西呢？”

“誰知道呢？你問她去。”

到冬初，我們的景況更拮据了，然而還喝酒，講笑話。忽然是武昌起義，接着是紹興光復。第二天愛農就上城來，戴着農夫常用的氈帽，那笑容是從來沒有見過的。

“老迅，我們今天不喝酒了。我要去看看光復的紹興，我們去。”

我們便到街上去走了一通，滿眼是白旗，然而貌雖如

此，內骨子是依舊的，因為還是幾個舊鄉紳所組織的軍政府，什麼鐵路股東是行政司長，錢店掌櫃是軍械司長……這軍政府也到底不長久，幾個少年一嚷，王金發帶兵從杭州進來了，但即使不嚷或者也會來，他進來以後，也就被許多開漢和新進的革命黨所包圍，大做王都督。在衙門裏的人物，穿布衣來的，不上十天也大概換上皮袍子了，天氣還並不冷。

我被擺在師範學校校長的飯碗旁邊，王都督給了我校款二百元。愛農做監學，還是那件布袍子，但不大喝酒了，也很少有工夫談閒天。他辦事，兼教書，實在勤快得可以。

“情形還是不行，王金發他們。”一個去年聽過我的講義的少年來訪問我，慷慨地說，“我們要辦一種報來監督他們。不過發起人要借用先生的名字。還有一個是子英先生，一個是德清先生，為社會，我們知道你決不推却的。”

我答應他了。兩天後便看見出報的傳單，發起人誠然是三個。五天後便見報，開首便罵軍政府和那裏的人員；此後是罵都督，都督的親戚，同鄉，姨太太……。

這樣地罵了十多天，就有一種消息傳到我的家裏來，說都督因為你們詐取了他的錢，還罵他，要派人用手鎗來打死你們了。

別人倒還不打緊，第一個着急的是我的母親，可囑我

不要再出去。但我還是照常走，並且說明，王金發是不來打死我們的，他雖然綠林大學出身，而殺人却不很輕易。況且我拿的是校款，這一點他還能明白的，不過說說罷了。

果然沒有來殺。寫信去要經費，又取了二百元。但彷彿有些怒意，同時傳令道：再來要，沒有了！

不過愛農得到了一種新消息，却使我很為難。原來所謂“詐取”者，並非指學校經費而言，是指另有送給報館的一筆款。報紙上罵了幾天之後，王金發便叫人送去了五百元。於是乎我們的少年們便開起會議來，第一個問題是：收不收？決議曰：收。第二個問題是：收了之後罵不罵？決議曰：罵。理由是：收錢之後，他是股東；股東不好，自然要罵。

我即刻到報館去問這事的真假。都是真的。略說了幾句不該收他錢的話，一個名為會計的便不高興了，質問我道：——

“報館為什麼不收股本？”

“這不是股本……。”

“不是股本是什麼！”

我就不再說下去了，這一點世故是早已知道的，倘我再說出連累我們的話來，他就會面斥我太愛惜不值錢的生命，不肯為社會犧牲，或者明天在報上就可以看見我怎

樣怕死發抖的記載。

然而事情很湊巧，季荊寫信來催我往南京了。愛農也很贊成，但頗淒涼，說——

“這裏又是那樣，住不得。你快去罷……。”

我懂得他無聲的話，決計往南京。先到都督府去辭職，自然照准，派來了一個拖鼻涕的接收員，我交出賬目和餘款一角又兩銅元，不是校長了。後任是孔教會會長傅力臣。

報館案是我到南京後兩三星期了結的，被一羣兵們搗毀。

革命政府在南京成立，教育部長招我去做部員，移入北京，一直到現在。近幾年，我還兼做北京大學，師範大學，女子師範大學的國文系講師。這是真的，從那時以來，我確沒有帶兵獨立過，但我也沒有冷笑雲南起義，也沒有希望國民軍失敗；對於教育部，其實是脫離過兩回，一是張勳復辟時，一就是章士釗長部時。

袁世凱也如一切儒者一樣，最主張尊孔，著了離奇的古衣冠，盛行祭孔的時候，大概是要做皇帝以前的一兩年。自此以來，相承不替，但也因秉政者的變換，儀式上，尤其是行禮之狀有些不同：大概自以為維新者出，則西裝

而鞠躬，尊古者興，則古裝而頓首。我曾經是教育部的僉事，因為“區區”，所以還不入鞠躬或頓首之列的；但屆春秋二祭，仍不免要被派去做執事。執事者，將所謂“帛”或“爵”遞給鞠躬或頓首之諸公的聽差之謂也。

又是章士釗。我之遇到這個姓名而搖頭，實在由來已久；但是，先前總算是爲“公”，現在却像憎惡中醫一樣，彷彿也挾帶一點私怨了，因為他“無故”將我免了官，所以，在先已經說過：我正在給他打官司。近來看見他的古文的答辯書了，很斤斤於“無故”之辨，其中有一段：——

“……又該僞校務維持會擅舉該員爲委員，該員又不聲明否認，顯係有意抗阻本部行政，既情理之所難容，亦法律之所不許。……不得已於八月十二日，呈請執政將周樹人免職，十三日由 執政明令照准……”

於是乎我也“之乎者也”地駁掉他：——

“查校務維持會公舉樹人爲委員，係在八月十三日，而該總長呈請免職，據稱在十二日。豈先預知將舉樹人爲委員而先爲免職之罪名耶？……”

其實，那些什麼“答辯書”也不過是中國的胡牽亂扯的照例的成法，章士釗未必一定如此胡塗；假使真只胡塗，倒還不失爲胡塗人，但他是知道舞文玩法的。他自己說過：“輒近政治。內包甚複。一端之起。其真意往往難於迹象求之。執法抗爭。不過迹象間事。……”所以倘若事不

于己，則與其聽他說政法，談邏輯，實在遠不如看太陽曬屁股賦，因為欺人之意，這些賦裏倒沒有的。

自從[一九二四年]春間，北京女子師範大學有了反對校長楊蔭榆事件以來，於是而有該校長在太平湖飯店請客之後任意將學生自治會員六人除名的事；[原註：那地點是錯誤的，後來知道那時的請客是西長安街的西安飯店。等到五月二十一日即我們“碰壁”的那天，這纔換了地方，“由校特請全體主任專任教員評議會會員在太平湖飯店開校務緊急會議，解決種種重要問題”。]有引警察及打手蜂擁入校的事；迫教育總長章士釗復出，遂有非法解散學校的事；有司長劉百昭僱用流氓女丐毆曳學生出校，禁之補習所空屋中的事；有手忙腳亂，急掛女子大學招牌以掩天下耳目的事；有胡敦復之趁火打劫，攫取女大校長飯碗，助章士釗欺罔世人的事。女師大的許多教職員，——我敢特地聲明：並不是全體！——本極以章楊的措置爲非，復痛學生之無辜受戮，無端失學，而校務維持會之組織，遂愈加嚴固。我先是該校的一個講師，於黑暗殘虐情形，多曾目覩；後是該會的一個委員，待到女師大在宗帽胡同自賃校舍，而章士釗尙且百端迫壓的苦痛，也大抵親歷的，當章氏勢燄熏天時，我也曾環顧這首善之區，尋求所謂“公理”“道義”之類而不得；

而現在突起之所謂“教育界名流”者，那時則鴉雀無聲；甚且捧獻肉麻透頂的呈文，以歌頌功德。但這一點，我自然也判不定是因爲畏章氏有嗾使兵警痛打之威呢，還是貪圖分潤金款之利；抑或真以他爲“公理”或“道義”等類的具象的化身？但是，從章氏逃走，女師大復校以後，所謂“公理”等件，我却忽而間接地從女子大學在擷英館宴請“北京教育界名流及女大學生家長”的席上找到了。

據十二月十六日的北京晚報說，則有些“名流”即於十四日晚六時在那個擷英餐館開會。請喫飯的，去喫飯的，在中國一天不知道有多多少少，本不與我相干，雖然也令我記起楊蔭榆也愛在太平湖飯店請人喫飯的舊事。

但使我留心的是，從這飯局裏產生了“教育界公理維持會”，從這會又變出“國立女子大學後援會”，從這會又發出“致國立各校教職員聯席會議函”，聲勢浩大，據說是“而於該校附和暴徒，自墮人格之教職員，即不能投畀豺虎，亦宜屏諸席外，勿與爲伍”云。他們之所謂“暴徒”，蓋卽劉百昭之所謂“土匪”。官僚名流，口吻如一，從局外人看來，不過煞是可笑而已。而我是女師大維持會員之一，又是女師大教員，人格所關，當然有抗議的權利。豈但抗議？“投虎”“割席”，“名流”的熏灼之狀，竟至於斯，則雖報以惡

聲，亦不爲過。但也無須如此，只要看一看這些“名流”究竟是什麼東西，就儘夠了。報上和函上有名單：——

除了萬里鳴是太平湖飯店掌櫃，以及董子鶴輩爲我所不知道的不計外，陶昌善是農大教務長，教長兼農大校長章士釗的替身；石志泉是法大教務長；查良釗是師大而務長；李順卿，王桐齡是師大教授；蕭友梅是前女師大教員，今女大教員；蹇華芬是前女師大而今女大學生；馬寅初是北大講師，又是中國銀行的什麼，也許是“總司庫”，這些名目我記不清楚了；燕樹棠，白鵬飛，陳源即做閒話的西滄，丁燮林即做過一隻馬蜂的西林，周鯁生即周覽，皮宗石，高一涵，李仲揆即李四光曾有一篇楊蔭榆要用汽車迎他“觀劇”的作品登在現代評論上的，都是北大教授，又大抵原住在東吉祥胡同，又大抵是先前反對北大對章士釗獨立的人物，所以當章士釗炙手可熱之際，大同晚報曾稱他們爲“東吉祥派的正人君子”，雖然他們那時並沒有開什麼“公理”會。但他們的住址，今年新印的北大職員錄上可很有些函胡了，我所依據的是民國十一年的本子。

日本人學了中國人口氣的順天時報，即大表同情於女子大學，據說多人的意見，以爲女師大教員多係北大兼任，有附屬於北大之嫌。麇馳徵得這麼多人的意見。然而從上列的名單看來，那觀察是錯的。女師大嚮來少有專任教員，正是楊蔭榆的狡計，這樣，則校長即可以獨攬大權；

當我們說話時，高仁山即以講師不宜與聞校事來箝制我輩之口。況且女師大也決不因為中有北大教員，即精神上附屬於北大，便是北大教授，正不乏有當學生反對楊蔭榆的時候，即協力來殲滅她們的人。即如八月七日的大同晚報，就有“某當局……謂北大教授中，如東吉祥派之正人君子，亦主張解散”等語。順天時報的記者倘竟不知，可謂昏聩，倘使知道而故意淆亂黑白，那就有挑撥對於北大懷着惡感的人物，將那惡感蔓延於女師大之嫌，居心可謂卑劣。但我們國內戰爭，尚且常有日本浪人從中作祟，使良民愈陷於水深火熱之中，更何況一校女生和幾個教員之被誣蔑。我們也只得自責國人之不爭氣，竟任這樣的報紙跳梁！

北大教授王世杰在攝英館席上演說，即云“本人決不主張北大少數人與女師大合作”，就可以證明我前言的不誣。至又謂“照北大校章教職員不得兼他機關主要任務然而現今北大教授在女師大兼充主任者已有五人實屬違法應加以否認云云”，則頗有語病。北大教授兼國立京師圖書館副館長月薪至少五六百元的李四光，不也是正在坐中“維持公理”，而且演說的麼？使之何以爲情？李教授兼副館長的演說辭，報上却不載；但我想，大概是不贊成這個辦法的。

北大教授燕樹棠謂女大學生極可佩服，而對於“形同

土匪破壞女大的人應以道德上之否認加之’，則竟連所謂女大教務長蕭純錦的自辯女大當日所理伏者是聽差而非流氓的啓事也沒有見，却已一口咬定，嘴上忽然跑出一個“道德”來了。那麼，對於形同鬼域破壞女師大的人應以什麼上之否認加之呢？

“公理”實在是不容易談，不但在一個維持會上，就要自相矛盾，有時竟至於會用了“道義上”之手，自批“公理”上之臉的嘴巴。西澄是曾在現代評論（三十八）的閒話裏冷嘲過援助女師大的人們的：“外國人說，中國人是重男輕女的，我看不見得吧，”現在却簽名於什麼公理會上了，似乎性情或體質有點改變。而且曾經感慨過：“你代被羣衆專制所壓迫者說了幾句公平話，那麼你不是與那人有‘密切的關係’便是吃了他或她的酒飯。”（現代四十）然而現在的公理什麼會上的言論和發表的文章上，却口口聲聲，側重多數了，似乎主張又頗有些參差，只有“喫飯”的一件事還始終如一。在現代評論（五十三）上，自嘲是“所有的批評都本於學理和事實，絕不肆口“嫚罵”而忘却了自己曾稱女師大爲“臭毛廁”並且署名於要將人“投畀豺虎”的信尾曰：陳源。陳源不就是西澄麼：半年的事，幾個人，就這麼矛盾支離，實在可以使人悞笑。但他們究竟是聰明的，大約不獨覺得“公理”歪邪，而且連自己們的“公理維持會”也很有些歪邪了罷，所以突然一變而爲“女子

大學後援會”了，這是的確的後援，就是站在背後的援助。

但是十八日晨報上所載該後援會開會的記事，却連發言的人的名姓也沒有了，一律叫作“某君”，莫非後來連對於自己的姓名也覺得可羞，真是“內愧於心”了？還是將人“投畀豺虎”之後，豫備歸過於“某君”，免得自己負責任，受報復呢？雖然報復的事，並為“正人君子”們所反對，但究竟還不如先使人不知道“後援”者為誰的穩當，所以即使為着“道義”而坦白的態度，也仍為他們所不取罷。因為明白地站出來，就有些“形同土匪”或“暴徒”。怕要失了專在背後，用暗箭的聰明人的人格。

其實，攝英館裏和後援會中所嘯聚的一夥人馬，也不過是各處流來的雜人，正如我一樣，到北京來騙一口飯，豈但“投畀豺虎”，簡直是已經“投畀有北”的了。這算得什麼呢？以人論，我與王桐齡，李順卿雖曾在西安點首談話，却並不當作朋儕；與陳源雖嘗在給泰戈爾祝壽的戲臺前一握手，而早已視為異類，又何至於會有和他們連席之意？而況於不知什麼東西的雜人等輩也哉！以事論，則現在的教育界中實無豺虎，但有些城狐社鼠之流，那是當然不能免的。不幸十餘年來，早見得不少了；我之所以對於有些人的口頭的烏‘公理’而不敬者，即大抵由於此。

我今年〔按即一九二五年〕已經有兩次被封為“學者”

而發表之後，也就即刻取消，第一次是我主張中國的青年應當多看外國書，少看，或者竟不看中國書的時候，便有論客以爲素稱學者的魯迅不該如此，而現在竟至如此，則不但決非學者，而且還有洋奴的嫌疑。第二次就是這回僉事免職之後，我在莽原上發表了答K.S.君信，論及章士釗的脚色和文章的時候，又有論客以爲因失了“區區僉事”而反對章士釗，確是氣量狹小，沒有“學者的態度”；而且，豈但沒有“學者的態度”而已哉，還有“人格卑污”的嫌疑云。

其實，沒有“學者的態度”，那就不是學者嘍，而有些人偏要硬派我做學者。至於何時封贈，何時考定，却連我自己也一點不知道。待到他們在報上說出我是學者，我自己也藉此知道了原來我是學者的時候，則已經同時發表了我的罪狀，接着就將這體面名稱革掉了，雖然總該還要恢復，以便第三次的藉口。

據我想來，僉事——文士詩人往往誤作簽事，今據官書正定——這一個官兒倒也並不算怎樣“區區”，只要看我免職之後，就頗有些人在那裏鑽謀補缺，便是一個老大的證據。至於又有些人以爲無足重輕者，大約自己現在還不過做幾句“說不出”的詩文，所以不知不覺地就來“據他人之愷”了罷，因爲人的將來是想不到的。然而，慚愧我還不是“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式的理想奴才，所以竟不能

“盡如人意”，已經在平政院對章士釗提起訴訟了。

提起訴訟之後，我只在答 K.S.君信裏論及一回章士釗，但聽說已經要“人格卑污”了。然而別一論客却道是並不大罵，所以魯迅究竟不足取。我所經驗的事委實有點稀奇，每有“碰壁”一類的事，平時回護我的大抵願我設法應付，甚至於暫圖苟全。平時憎惡我的却總希望我做一個完人，即使敵手用了卑劣的流言和陰謀，也應該正襟危坐，毫無憤怨，默默地喫苦；或則戟指嚼舌，噴血而亡，爲什麼呢？自然是專爲顧全我的入格起見嘍。

夠了，我其實又何嘗“碰壁”，至多也不過遇見了“鬼打牆”罷了。

我向來也不專以北大教員自居，因爲另外還與幾個學校有關係。然而不知怎的，——也許是含有神妙的用意的罷，今年忽而頗有些人指我爲“北大”派。我雖然不知道北大可真有特別的派，但也就以此自居了。北大派麼？就是北大派！怎麼樣呢？

我覺得北大也並不壞。如果真有所謂派，那麼，被派進這派裏去，也還是也就算了。

……據近七八年的事實看來，第一，北大是常爲新的，改進的運動的先鋒，要使中國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雖然很中了許多暗箭，背了許多謠言；教授和學生

也都逐年地有些改換了，而那向上的精神還是始終一貫，不見得弛懈。自然，偶爾也免不了有些很想勒轉馬頭的，可是這也無傷大體，“萬衆一心”，原不過是書本子上的冠冕話。

第二，北大是常與黑暗勢力抗戰的，即使只有自己。自從章士釗提了“整頓學風”的招牌來“作之師”並且分送金款以來，北大却還是給他一個依照彭允彝的待遇。現在章士釗雖然還伏在暗地裏做總長，本相却已顯露了；而北大的校格也就愈明白，那時固然也曾顯出一角灰色，但其無傷大體。也和第一條所說相同。

我不是公論家，有上帝一般決算功過的能力。僅據我所感得的說，則北大究竟還是活的，而且還在生長的。凡活的而且在生長者，總有着希望的前途。

我在先前，本來也還無須賣文糊口的，拿筆的開始，是在應朋友的要求。不過大約心裏原也藏着一點不平，因此動起筆來，每不免露些憤言激語，近於鼓動青年的樣子。段祺瑞執政之際，雖頗有人造了謠言，但我敢說，我們所做的那些東西，決不沾別國的半個盧布，閩人的一文津貼，或者書鋪的一點稿費。我也不想充“文學家”，所以也從不連絡一班同夥的批評家叫好。幾本小說銷到上萬，是我想也沒有想到的。

至於希望中國有改革，有變動之心，那的確是有一點。雖然有人指定爲我沒有出路——哈哈，出路，中狀元麼——的作者，“毒筆”的文人，但我自信並未抹殺一切。我總以爲下等人勝於上等人，青年勝於老頭子，所以從前並未將我的筆尖的血，灑到他們身上去。我也知道一有利害關係的時候，他們往往也就和上等人老頭子差不多了，然而這是在這樣的社會組織之下，勢所必至的事。對於他們，攻擊的人又正多，我何必再來助人下石呢，所以我所揭發的黑暗是只有一方面的，本意實在並不在欺蒙閱讀的青年。

以上是我尚在北京，就是成仿吾所謂“蒙在鼓裏”做小資產階級時候的事。但還是因爲行文不慎，飯碗敲破了，並且非走不可了。

第六章 創作生活的回顧

凡是關心現代中國文學的人，誰都知道新青年是提倡“文學改良”，後來更進一步而號召“文學革命”的發難者。但當一九一五年九月中在上海開始出版的時候，却全部是文言的。蘇曼殊的創作小說，陳嘏和劉半農的翻譯小說，都是文言。到第二年，胡適的“改良文學芻議”發表了，作品也只有胡適的詩文和小說是白話。後來白話作者逐漸多了起來，但又因為新青年其實是一個論議的刊物，所以創作並不怎樣著重，比較旺盛的只有白話詩；至於戲曲和小說，也依然大抵是翻譯。

從一九一八年五月起，狂人日記、孔乙己、藥等，陸續的出現了，算是顯示了“文學革命”的實績，又因那時的認為“表現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別”，頗激動了一部分青年讀者的心。然而這激動，却是向來怠慢了介紹歐洲大陸文學的緣故。一八三四年頃，俄國的果戈里(N. Gogol)就已經寫了狂人日記；一八八三年頃，尼采(Fr. Nietzsche)也早借了蘇魯支(Zarathustra)的嘴說過“你們

已經走了從蟲走到人的路，在你們裏面還有許多份是蟲豸。你們做過猴子，到了現在，人還尤其猴子，無論比那一個“猴子”的。而且藥的收束，也分明的留着安特萊夫(L. Andreev)式的陰冷。但後的狂人日記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禮教的弊害，却比果戈理的憂憤深廣，也不如尼采的超人的渺茫。此後雖然脫離了外國作家的影，技巧稍為圓熟，刻劃也稍加深切，如肥皂，離婚等，但一面也減少了熱情，不為讀者們所注意了。

從新青年上，此外也沒有養成什麼小說的作家。

“五四”事件一起，這運動的大營的北京大學負了盛名，但同時也遭了艱險。終於，新青年的編輯中樞不得不復歸上海，新潮羣中的健將，則大抵遠遠的到歐美留學去了，新潮這雜誌，也雖有大吹大播的預告，却至今還以未出版的名著介紹收場，留給國內的社員的，是一萬部子民先生言行錄和七千部點滴。創作衰歇了，為人生的文學自然也衰歇了。

我在留學時候，只在雜誌上登過幾篇不好的文章。

不過看起來也引起我一點回憶。例如最先的兩篇，就是我故意刪掉的。一篇為“雷錠”的最初的紹介，[一九〇三年作，題為說錠]。一篇是斯巴達的尚武精神的描寫，[亦一九〇三年所作，題為斯巴達之魂]但我記得自己那

時的化學和歷史的程度並沒有這樣高，所以大概總是從什麼地方偷來的，不過後來無論怎麼記，也再也記不起牠們的老家；而且我那時初學日文，文法並未了然，就急於看書，看書並不很懂，就急於翻譯。所以那內容也就可疑得很，而且文章又多麼古怪，尤其是那一篇斯巴達之魂，現在看起來，自己也不免耳朵發熱。但這是當時的風氣，要激昂慷慨，頓挫抑揚，纔能被稱爲好文章，我還記得“披髮大叫，抱書獨行，無淚可揮，大風滅燭，”是大家傳誦的警句。但我的文章裏，也有受着嚴又陵的影響的，例如“涅伏”就是“神經”的臘丁語的音譯，這是現在恐怕只有我自己懂得的了。以後又受了章太炎先生的影響，古了起來，但這一集子[指集外集]裏却一篇也沒有。

以後回到中國來，還給日報之類做了些古文，自己不記得究竟是什麼了。

但我的來做小說，也並非自以爲有做小說的才能，只因爲那時是住在北京的會館裏的，要做論文罷，沒有參考書，要翻譯罷，沒有底本，就只好做一點小說模樣的東西塞責，這就是狂人日記。大約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過的百來篇外國作品和一點醫學上的知識，此外的準備，一點也沒有。

但是新青年的編輯者，却一回一回的來催，催幾回，

我就做一篇，這裏我必得記念陳獨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說最着力的一個。

S會館裏有三間屋，相傳是往昔曾在院子裏的槐樹上縊死過一個女人的；現在槐樹已經高不可攀了，而這屋還沒有人住；許多年，我便寓在這屋裏鈔古碑。客中少有人來，古碑中也遇不到什麼問題和主義，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這也就是我惟一的願望。夏夜，蚊子多了，便搖着蒲扇坐在槐樹下，從密葉縫裏看那一點一點的青天，晚出的槐蠶又每每冰冷的落在頭頸上。

那時偶或來談的是一個老朋友金心異，將手提的大皮夾放在破桌上，脫下長衫，對面坐下了，因為怕狗 似乎心房還在怦怦的跳動。

“你鈔了這些有什麼用？”有一夜，他翻着我那古碑的鈔本，發了研究的質問了。

“沒有什麼用。”

“那麼，你鈔他是什麼意思呢？”

“沒有什麼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點文章……”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們正辦新青年，然而那時彷彿不特沒有人來贊同，並且也還沒有人來反對，我想，他們許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說：

“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裏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從昏睡入死滅，並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麼？”

“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說決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

是的，我雖然自有我的確信，然而說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殺的，因為希望是在於將來。決不能以我之必無的證明，來折服了他之所謂可有，於是我終於答應他也做文章了，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記。從此以後，便一發而不可收，每寫些小說模樣的文章，以敷衍朋友們的囑託，積久就有了十餘篇。

在我自己，本以為現在是已經並非一個切迫而不能已於言的人了，但或者也還未能忘懷於當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罷，所以有時候仍不免吶喊幾聲，聊以慰藉那在寂寞裏奔馳的猛士，使他不憚於前驅，至於我的喊聲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顧及的，但既然是吶喊，則當然須聽將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筆，在藥的瑜兒的墳上平空添上一個花環，在明天裏也不敘單四嫂子竟沒有做到看見兒子的夢，因為那時的主將是不主張消極的。至於自己，却也並不願將自以為苦的寂寞，

再來傳染給也如我那年青時候似的正做着好夢的青年。

這樣說來，我的小說和藝術的距離之遠，也就可想而知了，然而到今日還能蒙着小說的名，甚而至於且有成集的機會，無論如何總不能不說是一件微幸的事。但微幸雖使我不安於心，而懸揣人間暫時還有讀者，則究竟也仍然是高興的。

既不是直接對於“文學革命”的熱情，爲什麼常常提筆的呢？想起來，大半倒是爲了對於熱情者們的同感。這些戰士，我想，雖在寂寞和艱難中，那想頭却不錯的，也來喊幾聲助助威罷。——首先，就是爲此。在這中間，自然也不免夾雜些將舊社會的病根暴露出來，催人留心，設法加以治療的願望。但爲達到這願望起見，是必須與前驅者取同一的步調的，我於是遵着將令，刪削些黑暗，裝點些歡容，使作品比較的顯出若干亮色，那就是後來結集起來的吶喊，一共有十四篇。

[故事新編]第一篇補天——原先題作不周山——還是一九二二年的冬天寫成。那時的意見，是想從古代和現代都採取題材，來做短篇小說，不周山便是取了“女媧煉石補天”的神話，動手試作的第一篇。首先，是很認真的，雖然也不過取了荊羅特說，來解釋創造——人和文

學的——的緣起。不記得怎麼一來，中途停了筆，去看日報了，不幸正看見了誰——現在忘記了名字——的對於汪靜之君的蕙的風的批評，他說要含淚哀求，請青年不要再寫這樣的文字。這可憐的陰險使我感到滑稽，當再寫小說時，就無論如何，止不住有一個古衣冠的小丈夫，在女媧的兩腿之間出現了。這就是從認真陷入了油滑的開端。油滑是創作的大敵，我對於自己很不滿。

我決計不再寫這樣的小說 當編印吶喊時，便將它附在卷末，算是一個開始，也就是一個收場。

我是不薄“庸俗”也自甘“庸俗”的；對於歷史小說，則以為博考獻文，言必有據者，縱使有人譏為“教授小說”，其實是很難組織之作，至於只取一點因由，隨意點染，鋪成一篇，倒無需怎麼的手腕；況且“如魚飲水，冷暖自知”，用庸俗的話來說，就是“自家有病自家知”罷；不周山的後半是很草率的，決不能稱為佳作。

也做了幾首新詩。我其實是不喜歡做新詩的——但也不喜歡做古詩——只因為那時詩壇寂寞，所以打打邊鼓，湊些熱鬧；待到稱為詩人的一出現，就洗手不作了。我更不喜歡徐志摩那樣的詩，而他偏愛到處投稿，語絲一出版，他也就來了，有人贊成他，登了出來，我就做了一篇雜感，和他開一通玩笑，使他不能來，他也果然不來了。這

是我和後來的“新月派”積鑿的第一步；“語絲社”同人中有幾位也因此很不高興我。

所以，這些“革命文學”，也可以說，就是“遵命文學”。不過我所遵奉的，是那時在壓迫之下的革命的前驅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本來願意遵奉的命令，決不是皇上的聖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揮刀。

後來，“新青年”的團體散掉了，有的高陞，有的退隱，有的前進，我又經歷了一回同一戰陣中的伙伴不久還是會這麼變化，並且落得一個所謂“小說家”的頭銜，依然在沙漠上走來走去，不過已經逃不脫在散漫的刊物上做文字，叫作隨便談談。從此有了小感觸，我便寫些短文誇大點說，就是散文詩，自洗手不作之後，即印成一本書，謂之野草。得到較為整齊的材料，則還是做短篇小說，只因為變了散伏的游勇，佈不成陣了，所以技術雖然比先前好一些，思想也似乎較無拘束，而戰鬥的意氣却冷得不少。新的戰友在那里呢？我想這樣下去，是很不好的，於是集印了這時期的十一篇作品，謂之彷徨。別了別了，願以後不再這模樣。

現在有誰經過西長安街一帶的，總可以看見幾個衣履破碎的窮苦孩子叫賣報紙。記得三四年前，在他們身上

偶而還剩有制服模樣的殘餘。再早，就更體面，簡直是童子軍的擬態。

那是中華民國八年，即西歷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學生對於山東問題的示威運動以後，因為當時散傳單的是童子軍，不知怎的竟惹了投機家的注意，童子軍式的賣報孩子就出現了。其年十二月，日本公使小幡西吉抗議排日運動，情形和今年大致相同；只是我們的賣報孩子却穿破了第一身新衣以後，便不再做，只見得年不如年地顯出窮苦。

我在新青年的“隨感錄”中做些短評，還在這前一年，因為所評論的多是小問題，所以無可道：原因也大都忘却了。但就現在的文字看起來，除幾條泛論之外，有的是對於扶乩，靜坐，打拳而發的；有的是對於所謂“保存國粹”而發的；有的是對於那時舊官僚的以經驗自豪而發的；有的是對於上海時報的諷刺畫而發的。記得當時的新青年是正在四面受敵之中，我所對付的不過一小部分；其他大事，則本誌具在，無須我多言。

五四運動之後，我沒有寫什麼文字，現在已經說不清是不做，還是散失消滅的了。但那時革新運動，表面上却頗有些成功，於是主張革新的也就蓬蓬勃勃，而且有許多還就是在先譏笑嘲罵新青年的人們；但他們却是另起了一個冠冕堂皇的名目：新文化運動。這也就是後來又將

這名目反套在新青年身上，而又加以嘲罵譏笑的，正如笑罵白話文的人，往往自稱最得風氣之先，早經主張過白話文一樣。

再後，更無可道了。只記得一九二一年中的一篇是對於所謂“虛無哲學”而發的；更後一年則大抵對於上海之所謂“國學家”而發，不知怎的那時忽而有許多人都自命爲國學家了。

自新青年出版以來，一切應之而嘲罵改革，後來又贊成改革，後來又嘲罵改革者，現在擬態的制服早已破碎，顯出自身的本相來了，真所謂“事實勝於雄辯”，又何待於紙筆喉舌的批評。所以我的應時的淺薄的文字，也應該置之不顧，一任其消滅的；但幾個朋友却以爲現狀和那時並沒有大兩樣，也還可以存留，給我編輯起來了。這正是我所悲哀的。我以為凡對於時弊的攻擊，文字須與時弊同時滅亡，因為這正如白血輪之釀成瘡癤一般，倘非自身也被排除，則當牠的生命的存留中，也即證明着病菌尚在。

但如果凡我所寫，的確都是冷的呢？則牠的生命原來就沒有，更談不到中國的病證究竟如何。然而，無情的冷嘲和有情的諷刺相去本不及一張紙，對於周圍的感受和反應，又大概是所謂“如魚飲水，冷暖自知”的；我却覺得周圍的空氣太寒冽了，我自說我的話，所以反而稱之曰熱風。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不料這大口竟誇得無影無蹤。逃出北京，躲進廈門，只在大樓上寫了幾則故事新編和十篇朝花夕拾。前者是神話，傳說及史實的演義，後者則只是回憶的記事罷了。

此後就一無所作，“空空如也”。

可以勉強稱為創作的，在我至今只有這五種。

我向來就沒有格外用力或格外偷懶的作品，所以也沒有自以為特別高妙，配得上提拔出來的作品。

第七章 關於“阿Q正傳”

我先要抄一段西諦先生的原文——

“這篇東西值得大家如此的注意，原不是無因的，但也有幾點值得商榷的，如最後‘大團圓’的一幕，我在晨報上初讀此作之時，即不以爲然，至今也還不以爲然，似乎作者對於阿Q之收局太匆促了；他不欲再往下寫了，便如此隨意的給他以一個‘大團圓’。像阿Q那樣的一個人，終於要做起革命黨來，終於受到那樣大團圓的結局，似乎連作者他自己在最初寫作時也是料不到的。至少在人格上似乎是兩個。”

阿Q是否真要做革命黨，即使真做了革命黨，在人格上是否似乎是兩個，現在姑且勿論。單是這篇東西的成因，說起來就要很費功夫了。我常常說，我的文章不是湧出來的，是擠出來的。聽的人往往誤解爲謙遜，其實是真情。我沒有什麼話要說，也沒有什麼文章要做，但有一種自害的脾氣，是有時不免吶喊幾聲想給人們去添點熱鬧。

譬如一匹疲牛罷，明知不堪大用的了，但廢物何妨利用呢，所以張家要我耕一弓地，可以的；李家要我挨一轉磨，也可以的；趙家要我在他店前站一刻，在我背上帖出廣告道：敝店備有肥牛，出售上等消毒滋養牛乳。我雖然深知道自己是怎麼瘦，又是公的，並沒有乳，然而想到他們爲張羅生意起見，情有可原，只要出售不是毒藥，也就不說什麼了。但倘若用得我太苦，是不行的，我還要自己覓草喫，要喘氣的工夫；要專指我爲某家的牛，將我關在他的牛牢內，也不行的，我有時也許還要給別家挨幾轉磨。如果連肉都要出賣，那自然更不行，理由自明，無須細說。倘遇到上述的三不行，我就跑，或者索性躺在荒山裏。即使因此忽而從深刻變爲淺薄，從戰士化爲畜生，嚇我以康有爲，比我以梁啓超，也都滿不在乎，還是我跑我的，我躺我的，決不出來再上當，因爲我於“世故”實在是太深了。

近幾年吶喊有這許多人看，當初是萬料不到的，而且連料也沒有料。不過是依了相識者的希望，要我寫一點東西就寫一點東西，也不很忙，因爲不很有人知道魯迅就是我。我所用的筆名也不只一個：LS，神飛，唐俟，某生者，雪之，風聲；更以前還有：自樹，索士，令飛，迅行。魯迅就是承迅行而來的，因爲那時的新青年編輯者不願意有別號一般的署名。

現在是有人以爲我想做什麼狗首領了，真可憐，偵察

了百來回，竟還不明白。我就從不曾插了魯迅的旗去訪過一次人；魯迅即周樹人，是別人查出來的。這些人有四類：一類是爲要研究小說，因而要知道作者的身世；一類單是好奇；一類是因爲我也做短評，所以特地揭出來，想我受點禍；一類是以爲於他有用處，想要鑽進來。

那時我住在西城邊，知道魯迅就是我的，大概只有新青年，新潮社裏的人們罷；孫伏園也是一個。他正在晨報館編副刊。不知是誰的主意，忽然要添一欄稱爲“開心話”的了，每週一次。他就來要我寫一點東西。

阿Q的影像，在我心目中似乎確已有了好幾年，但我一向毫無寫他出來的意思。經這一提，忽然想起來了，晚上便寫了一點，就是第一章：序。因爲要切“開心話”這題目，就胡亂加上些不必有的滑稽，其實在全篇裏也是不相稱的。署名是“巴人”，取“下里巴人”，並不高雅的意思。誰料這署名又闖了禍了，但我却一向不知道，今年在現代評論上看見涵廬（即高一涵）的閒話才知道的。那大略是——

“……我記得當阿Q正傳一段一段陸續發表的時候，有許多人都慄慄危懼，恐怕以後要罵到他的頭上。並且有一位朋友，當我面說，昨日阿Q正傳上某一段彷彿就是罵他自己。因此便猜疑阿Q正傳是某人作的，何以呢？因爲祇有某人知道他這一段私事。

……從此疑神疑鬼，凡是阿Q正傳中所罵的，都以爲就是他的陰私；凡是與登載阿Q正傳的報紙有關係的投稿人，都不免做了他所認爲阿Q正傳的作者嫌疑犯了！等到他打聽出來阿Q正傳的作者名姓的時候，他才知道他和作者素不相識，因此，才恍然大悟，又逢人聲明說不是罵他：’（第四卷第八十九期）

我對於這位“某人”先生很抱歉，竟因我而做了許多天嫌疑犯。可惜不知是誰，“巴人”兩字很容易疑心到四川人身上去，或者是四川人罷，直到這一篇收在吶喊裏，也還有人問我：你實在是罵誰和誰呢？我只能悲憤，自恨不能使人看得我不至於如此下劣。

第一章登出之後，便“苦”字臨頭了，每七天必須做一篇。我那時雖然並不忙，然而正在做流民，夜晚睡在做通路的屋子裏，這屋子只有一個後窗，連好好的寫字地方也沒有，那里能夠靜坐一會，想一下。伏園雖然還沒有現在這樣胖，但已經笑嬉嬉，善於催稿了，每星期來一回，一有機會，就是：“先生，阿Q正傳……。明天要付排了。”於是只得做。心裏想着，‘俗語說：‘討飯怕狗咬，秀才怕歲考。’我既非秀才，又要週考，真是爲難……’然而終於又一章。但是，似乎漸漸認真起來了；伏園也覺得不很“開心”，所以從第二章起，便移在“新文藝”欄裏。

這樣地一週一週挨下去，於是乎就不免發生阿Q要做革命黨的問題了。據我的意思，中國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會做的。我的阿Q的運命，也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並不是兩個。民國元年已經過去，無可追蹤了，但此後倘再有改革，我相信還會有阿Q似的革命黨出現。我也很願意如人們所說，我只寫出了現在以前的或一時期，但我還恐怕我所看見的並非現代的前身，而是其後，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後。其實這也不算辱沒了革命黨，阿Q究竟已經用竹筷盤上他的辮子了；此後十五年，長虹“走到出版界”，不也就成爲一個中國的“綏惠略夫”了麼？

阿Q正傳大約做了兩個月，我實在很想收束了，但我已經記不大清楚，似乎伏園不贊成，或者是我疑心倘一收束，他會來抗議，所以將“大團圓”藏在心裏，而阿Q却已經漸漸向死路上走。到最末的一章，伏園倘在，也許會壓下，而要求放阿Q多活幾星期的罷。但是“會逢其適”，他回去了，代庖的是何作霖君，於阿Q素無愛憎，我便將“大團圓”送去，他便登出來，待到伏園回京，阿Q已經鎔斃了一個多月了。縱令伏園怎樣善於催稿，如何笑嘻嘻，也無法再說“先生，阿Q正傳……。”從此我總算收束了一件事，可以另幹別的去。另幹了別的什麼，現在也已經記不清，但大概還是這類的事。

其實“大團圓”倒不是“隨意”給他的：至於初寫時可曾料到，那倒確乎也是一個疑問。我彷彿記得：沒有料到。不過這也無法，誰能開首就料到人們的“大團圓”？不但對於阿Q連我自己將來的“大團圓”，我就料不到究竟是怎樣。終於是“學者”或“教授”乎？還是“學匪”或“學棍”呢？“官僚”乎，還是“刀筆吏”呢？“思想界之權威”乎，抑“思想界先驅者”乎，抑又“世故的老人”乎？“藝術家”？“戰士”？抑又是見客不怕麻煩的特別“亞拉籍夫”乎？乎？乎？乎？乎？

但阿Q自然還可以各種別樣的結果，不過這不是我所知道的事。

先前，我覺得我很有寫得“太過”的地方，近來却不這樣想了。中國現在的事，即使如實描寫，在別國的人們，或將來的好中國的人們看來，也都會覺得 grotesk。我常常假想一件事，自以為這是想得太奇怪了；但倘遇到相類的事實，却往往更奇怪。在這事實發生以前，以我的淺見寡識，是萬萬想不到的。

大約一個多月以前，這裏鎗斃一個強盜，兩個穿短衣的人各拿手鎗，一共打了七鎗。不知道是打了不死呢，還是死了仍然打，所以要打得這麼多。當時我便對我的一羣少年同學們發感慨，說：這是民國初年初用鎗斃的時候的情形；現在隔了十多年，應該進步些，無須給死者這麼多

的苦痛。北京就不然，犯人未到刑場，刑吏就從後腦一鎗，結果了性命，本人還來不及知道已經死了呢。所以北京究竟是‘首善之區’，便是死刑，也比外省的好得遠。

但是前幾天看見十一月二十三日的北京世界日報，又知道我的話並不的確了，那第六版上有一條新聞，題目是杜小拴子刀鋸而死，共分五節，現在撮錄一節在下面——

▲杜小拴子刀鋸餘人槍斃 先時，衛戍司令部因為從了毅軍各兵士的請求，決定用“梟首刑”；所以杜等不會到場以前，刑場已預備好了鋸草大刀一把了。刀是長形的，下邊是木底，中縫有厚大而銳利的刀一把，刀下頭有一孔橫嵌木上，可以上下的活動，杜等四人入刑場之後，由招扶的兵士把杜等架下刑車，就叫他們臉沖北，對着已備好的刑棹前站着。……杜並沒有跪，有外右五區的某巡官去問杜：要人把着不要？杜就笑而不答，後來就自己跑到刀前，自己睡在刀上，仰面受刑，先時行刑兵已將刀抬起，杜枕到適宜的地方後，行刑兵就合眼猛力一鋸，杜的身首，就不在一處了。當時血出極多。在旁邊跪等槍決的宋振山等三人，也各偷眼去看，中有趙振一名，身上還發起顫來。後由某排長拿手槍站在宋等的後面，先斃宋振山，後斃李有三趙振，每人都是一槍斃命。

……先時，被害程步擲的兩個兒子忠智忠信，都在場觀看；放聲大哭，到各人執刑之後，去大喊：爸！媽呀！你的仇已報了！我們怎麼辦哪？聽的人都非常難過，後來由家族引導着回家去了。

假如有一個天才，真感着時代的心搏，在十一月二十二日發表出記敘這樣情景的小說來，我想，許多讀者一定以為是說着包龍圖爺爺時代的事，在西歷十一世紀，和我們相差將有九百年。

這真是怎麼好……。

這在我是很應該感謝，也是很覺得欣幸的事，就是：我的一篇短小的作品，仗着深通中國文學的王希禮（B.A. Vassiliev）先生的翻譯，竟得展開在俄國讀者的面前了。

[按阿Q正傳是一九二五年譯成俄文的。]

我雖然已經試做，但終於自己還不能很有把握，我是否真能夠寫出一個現代的我們國人的魂靈來；別人我不得而知，在我自己，總仿佛覺得我們人人之間各有一道高牆，將各個分離使大家的心無從相印，這就是我們古代的聰明人，即所謂聖賢，將人們分為十等，說是高下各不相同。其名目現在雖然不用了，但那鬼魂却依然存在，並且，變本加厲，連一個人的身體也有了等差，使手對於足也不免視為下等的異類；造化生人，已經非常巧妙，使一個人

不會感到別人的肉體上的痛苦了，我們的聖人和聖人之徒却又補了造化之缺，並且使人們不再會感到別人的精神上的痛苦，

我們的古人又造出了一種難到可怕的一塊一塊的文字；但我還並不十分怨恨，因為我覺得他們倒並不是故意的。然而，許多人却不能藉此說話了，加以古訓所築成的高牆，更使他們連想也不敢想。現在我們所能聽到的不過是幾個聖人之徒的意見和道理，爲了他們自己；至于百姓，却就默默的生長，萎黃，枯死了，像壓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樣，已經有四千年！

要畫出這樣沈默的國民的魂靈來，在中國實在算一件難事，因為，已經說過，我們究竟還是未經革新的古國的人民，所以也還是各不相通，並且連自己的手也幾乎不懂自己的足。我雖然竭力想摸索人們的魂靈，但時時總自憾有些隔膜。在將來，圍在高牆裏面的一切人衆，該會自己覺醒，出走，都來開口的罷，而現在還少見，所以我也只得依了自己的覺察，孤寂地姑且將這些寫出，作爲在我的眼裏所經過的中國的人生。

我的小說出版之後，首先收到的是一個青年批評家的譴責；後來，也有以爲是病的，也有以爲滑稽的，也有以爲諷刺的，或者還以爲冷嘲，至於使我自己也要疑心自己的心裏真藏着可怕的冰塊。然而我又想，看人生是因作者

而不同，看作品又因讀者而不同，那麼，這一篇在毫無“我們的傳統思想”的俄國讀者的眼中，也許又會照見別樣的情景的罷，這實在是使我覺得很有意味的。

第八章 五卅時期及其後

我們的市民被上海租界的英國巡捕擊殺了，我們並不還擊，却先來趕緊洗刷犧牲者的罪名。說道我們並非“赤化”，因為沒有受別國的煽動；說道我們並非“暴徒”，因為都是空手，沒有兵器的。我不解為什麼中國人如果真使中國赤化，真在中國暴動，就得聽英捕來處死刑？記得新希臘人也曾用兵器對付過國內的土耳其人，却並不被稱為暴徒；俄國確已赤化多年了，也沒有得到別國開槍的懲罰。而獨有中國人，則市民被殺之後，還要皇皇然辯誣，張着含冤的眼睛，向世界搜求公道。

我願意自首我的罪名：這回除硬派的不算外，我也另捐了極少的幾個錢，可是本意並不在以此救國，倒是爲了看見那些老實的學生們熱心奔走得可感，不好意思給他們碰釘子。

學生們在演講的時候常常說，“同胞，同胞！……”但你們可知道你們所有的是怎樣的“同胞”，這些“同胞”是

怎樣的心麼？

不知道的。即如我的心，在自己說出之前，募捐的人們大概就不知道。

我的近鄰有幾個小學生，常常用幾張小紙片，寫些幼稚的宣傳文，用他們弱小的腕，來貼在電桿或牆壁上。待到第二天，我每見多被撕掉了。雖然不知道撕的是誰，但未必是英國人或日本人罷。

“同胞，同胞！……”學生們說。

我敢於說，中國人中，讎視那真誠的青年的眼光，有的比英國或日本人還凶險。爲“排貨”復讎的，倒不一定是外國人！

要中國好起來，還得做別樣的工作。

這回在北京的演講和募捐之後，學生們和社會上各色人物接觸的機會已經很不少了，我希望有若干留心各方面的人，將所見，所受，所感的都寫出來，無論是好的，壞的，像樣的，丟臉的，可恥的，可悲的，全給牠發表，給大家看看我們究竟有着怎樣的“同胞”。

明白以後，這纔可以計畫別樣的工作。

而且也無須掩飾。即使所發見的並無所謂同胞，也可以從頭創造的；即使所發見的不過完全黑暗，也可以和黑暗戰鬥的。

中國的精神文明，早被鎗砲打敗了，經過許多經驗，已經要證明所有的還是一無所有。諱言這“一無所有”自然可以聊以自慰；倘更鋪排得好聽一點，還可以寒天烘火爐一樣，使人舒服得要打盹兒。但那報應是永遠無藥可醫，一切犧牲全都白費，因為在大家打着盹兒的時候，狐鬼反將犧牲喫盡，更加肥胖了。

大概，人必須從此有記性，觀四向而聽八方，將先前一切自欺欺人的希望之談全都掃除，將無論是誰的自欺欺人的假面全都撕掉，將無論是誰的自欺欺人的手段全都排斥，總而言之，就是將華夏傳統的所有小巧的玩藝兒全都放掉，倒去屈尊學學鎗擊我們的洋鬼子，這纔可望有新的希望的萌芽。

上海的風潮，也出於意料之外。可是今年的學生的動作，據我看來是比前幾回進步了。不過這些表示，真所謂“就是這麼一回事”。試想：北京全體(?)學生而不能去一章士釗，女師大大多數學生而不能去楊蔭榆，何況英國和日本。但在學生一方面，也只能這麼做，唯一的希望，就是等候意外飛來的“公理”。現在“公理”也確有點飛來了，而且，說英國不對的，還有英國人。所以無論如何，我總覺得洋鬼子比中國人文明，貨只管排，而那品性却很有可學的地方。這種敢於指摘自己國度的錯誤的，中國人就

少。

所謂“經濟絕交”者，在無法可想中，確是一個最好的方法。但有附帶條件，要耐久，認真，這麼辦起來，有人說中國的實業就會藉此促進，那是自欺欺人之談。（前幾年排斥日貨時，大家也那麼說，然而結果不過做成功了一種“萬年糊”。草帽和火柴發達的原因，尚不在此。那時候，是連這種萬年糊也不會做的，排貨事起，有三四個學生組織了一個小團體來製造，我還是小股東，但是每瓶賣八枚銅子的糊，成本要十枚，而且貨色總敵不過日本品。後來，折本，鬧架，關門。現在所做的好得多，進步得多了，但和我輩無關也。）因此獲利的却是美法商人。我們不過將送給英日的錢，改送美法，歸根結蒂，二五等於一十。但英日却究竟受損，爲報復計，亦足快意而已。

可是據我看來，要防一個不好的結果，就是白用了許多犧牲，而反爲巧人取得自利的機會，這種在中國常有的，但在學生方面，也愁不得這些，只好憑良心做去，可是要緩而韌，不要急猛。中國青年中，有些很有太“急”的毛病，因此，就難於耐久（因爲開首太猛，易將力氣用完），也容易碰釘子，喫虧而發脾氣，此不佞所再三申說者也，亦自己所曾經實驗者也。

一九二五年九月間，北京突然有“莽原社”出現，這其

實不過是不滿於京報副刊編輯者的一羣，另設莽原週刊，却仍附京報發行，聊以快意的團體。奔走最力者爲高長虹，中堅的小說作者也還是黃鵬基，尚鉞，向培良，三個；而魯迅是被推爲編輯的。

但聲援的很不少，到十一月，京報要停止副刊以外的小幅了，便改爲半月刊，由未名社出版。

但不久這“莽原社”內部衝突了，長虹一流，便在上海設立了“狂瀛社”。

中國現今文壇(?)的狀況，實在不佳，但究竟做詩及小說者尚有人。最缺少的是“文明批評”和“社會批評”，我之以莽原起哄，大半也就爲了想由此引些新的這一種批評者來，雖在割去敵舌之後，也還有人說話，繼續撕去舊社會的假面。

莽原的投稿，就是小說太多，議論太少。現在則并小說也少，大約大家專心愛國，要“到民間去”，所以不做文章了。

至於莽原，說起來實在慚愧，正如武昌的C先生來信所說，不過“是些廢話和大部分的文藝作品。”我們倒也並不是看見社會主義四個字就嚇得兩眼朝天，口吐白沫，只是沒有研究過，所以也沒有談，自然更沒有用此來宣傳任

何主義的意思，“爲什麼要辦刊物？一定是宣傳什麼主義。爲什麼要宣傳主義，一定是在得某國的錢”這一類的教授邏輯，在我們的心裏還沒有。

“未名社”却相反，主持者韋素園，是甯願作爲無名的泥土，來栽植奇花和喬木的人，事業的中心，也多在外國文的譯述。

我這幾年來，常想給別人出一點力，所以在北京時，拚命地做，忘記喫飯，減少睡眠，喫了藥來編輯，校對，作文。誰料結出來的，都是苦果子。有些人就將我做廣告來自私，不必說了；便是小小的莽原，我一走也就鬧架。長虹因爲社裏壓下（壓下而已）了投稿，和我理論，而社裏則時時來信，說沒有稿子，催我作文。我實在有些憤憤了，擬至二十四期止，便將莽原停刊，沒有了刊物，看大家還爭持些什麼。

先前利用過我的人，現在見我偃旗息鼓，遯居海濱，無從再來利用，就開始攻擊了，長虹在狂飆第五期上儘力攻擊，自稱見過我不下百回，知道得很清楚，并捏造許多會話（如說我罵郭沫若之類）。其意即在推倒莽原，一方面則推廣狂飆的銷路，其實還是利用，不過方法不同，他們那時的種種利用我，我是明白的，但還料不到他看出活着他

不能吸血了，就要打殺了羹喫，有如此惡毒。我現在姑置之不理，看看他技倆發揮到如何。總之他戴着見了我“不下百回”的假面具，現在是除下來了，我還要子細的看看。

我在靜夜中，回憶先前的經歷，覺得現在的社會，大抵是可利用時則竭力利用，可打擊時則竭力打擊，只要於他有利。我在北京這麼忙，來客不絕，但一受段祺瑞章士釗們的壓迫，有些人就立刻來索還原稿，不要我選定，作序了。其甚者還要乘機下石，連我請他喫過飯也是罪狀了，這是我在運動他；請他喝過好茶也是罪狀了，這是我奢侈的證據。藉自己的升沈，看看人們的嘴臉的變化，雖然很有益，也有趣，但我的涵養工夫太淺了，有時總還不免有些憤激，因此又常遲疑於此後所走的路：（一）死了心，積幾文錢，將來什麼事都不做，顧自己苦苦過活；（二）再不顧自己，為人們做些事，將來餓肚也不妨，也一任別人唾罵；（三）再做一些事，倘連所謂“同人”也都從背後鎗擊我了，為生存和報復起見，我便什麼事都敢做，但不願失了我的朋友。第二條我已行過兩年了，終於覺得太傻。前一條當先託庇於資本家，恐怕熬不住。末一條則頗險，也無把握（於生活），而且又略有所不忍。所以實在難於下一決心，我也就想寫信和我的朋友商議，給我一條光。

從昨天起，我又很冷靜了，一是因為決定赴粵，二是因為決定對長虹們給一打擊。景宋的話大抵不錯的，但我之所以憤慨，却並非因為他們使我失望，而在覺得了他先前日日吮血，一看見不能再吮了，便想一棒打殺，還將肉作罐頭賣以獲利。這回長虹笑我對章士釗的失敗道，“於是遂戴其紙糊的‘思想界的權威者’之假冠，而入於身心交病之狀態矣。但他八月間在新女性上登廣告，却云‘與思想界先驅者魯迅合辦’莽原，一面自己加我“假冠”以欺人，一面又因別人所加之“假冠”而罵我，真是輕薄卑劣，不成人樣。有青年攻擊或譏笑我，我是向來不去還手的，他們還脆弱，還是我比較的禁得起踐踏。然而他竟得步進步，罵個不完，好像我即使避到棺材裏去，也還要戮屍的樣子。所以我昨天就決定，無論什麼青年我也不再留情面，先作一個啓事，將他利用我的名字，而對於別人用我名字，則加笑罵等情狀，揭露出來，比他的嘵嘵叨叨的長文要刻毒得多，即送登語絲，莽原，新女性，北新四種刊物。我已決定不再彷徨，拳來拳對，刀來刀當，所以心裏也很舒服了。

我大約也終於不見得爲了小障礙而不走路，不過因爲神經不好，所以容易說憤話。小障礙能絆倒我，我不至於要離開廈門了。我也很想走坦途，但目前還不能，非不願，勢不可也。

狂風中人一面罵我，一面又要用我了。培良要我在廈門或廣州尋地方，尙斌要將小說編入烏合叢書去，并謂前係誤罵，後當停止，附寄未發表的罵我之文稿，請看畢燒掉云。我想，我先前的種種不客氣，大抵施之於同年輩或地位相同者，而對於青年，則必退讓，或默然甘受損失，不料他們竟以爲可欺，或糾纏，或奴役，或責罵，或誣釀，得步進步，鬧個不完，我常歎中國無“好事之徒”，所以什麼也沒有人管，現在看來，做“好事之徒”，實在也大不容易，我略管閒事，就弄得這麼麻煩。現在是方針要改變了，地方也不尋，叢書也不編，文稿也不看，也不燒，回信也不寫，關門大吉，自己看書，吸煙，睡覺。

單在這三四年中，我對於熟識的和初初相識的文學青年是怎麼樣，只要有可以盡力之處就盡力，並沒有什麼壞心思。然而男的呢，他們自己之間也掩不住嫉妬，到底爭起來了，一方面於心不滿足，就想打殺我，給那方面也失了助力。看見我有女生在座，他們便造流言。這些流言，無論事之有無，他們是在所必造的，除非我和女人不見面，他們大抵是貌作新思想者，骨子裏却是暴君酷吏，偵探，小人。如果我再隱忍，退讓，他們更要得步進步，不會完的。我蔑視他們了。我先前偶一想到愛，總立刻自己蒙

愧，怕不配，因而也不敢愛某一個人，但看清了他們的言行思想的內幕，便使我自信我決不是必須自己貶抑到那麼樣的人了，我可以愛！

那流言，是直到[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從章漱園的信裏纔知道的。他說，由沈鐘社裏聽來，長虹的拚命攻擊我是爲了一個女性，狂飆上有一首詩，太陽是自比，我是夜，月是她，他還問我這事可是真的，要知道一點詳細。我這纔明白長虹原來在害“單相思病”，以及川流不息的到我這里來的原因；他並不是爲莽原，却在等月亮。但對我竟毫不表示一些敵對的態度，直待我到了廈門，纔從背後罵得我一個莫名其妙，真是卑怯得可以。我是夜，則當然要有月亮的，還要做什麼詩，也低能得很。那時就做了一篇小說，和他開了一些小玩笑，寄到“未名社”去了。

那時我又寫信去打聽孤靈，才知道這種流言，早已有之，傳播的是品青，伏園，亥倩，微風，宴太。有些人又說我將她帶到廈門去了，這大約伏園不在內，是送我上車的人們所流布的。白果從北京接家眷來此，又將這帶到廈門，爲攻擊我起見，便和田千頃分頭廣佈於人，說我之不肯留居廈門，乃爲月亮不在之故。在送別會上，田千頃且故意當衆發表，意圖中傷，不料完全無效，風潮並不稍減，因爲二次風潮，根柢甚深，並非由我一入而起，而他們還要玩些這樣的小把戲，真可謂“至死不悟”了。

在一年的盡頭的深夜中，整理了這一年所寫的雜感，竟比收在熱風裏的整四年中所寫的還要多。意見大部分還是那樣，而態度卻沒有那麼質直了，措辭也時常彎彎曲曲，議論又往往執滯在幾件小事情上，很足以貽笑於大方之家。然而那又有什麼法子呢。我今年偏遇到這些小事情，而偏有執滯於小事情的脾氣。

我知道偉大的人物能洞見三世，觀照一切，歷大苦惱，嘗大歡喜，發大慈悲。但又知道這必須深入山林，坐古樹下，靜靜默想，得天眼通，離人間愈遠遙，而知人間也愈深，愈廣；於是凡有言說，也愈高，愈大；於是而為天人師。我幼時雖曾夢想飛空，但至今還在地上，救小創傷尚且來不及，那有餘暇使心開意豁，立論都公允妥洽，平正通達，像“正人君子”一般；正如沾水小蜂，只在泥土上爬來爬去，萬不敢比附洋樓中的通人，但也自有悲苦憤激，決非洋樓中的通人所能領會。

這病痛的根柢就在我活在人間，又是一個常人，能夠交着“華蓋運”。

我平生沒有學過算命，不過聽老年人說，人是有時要交“華蓋運”的，這“華蓋”在他們口頭上大概已經訛作“錢蓋”了，現在加以訂正。所以，這運，在和尚是好運：頂有華蓋，自然是成佛作祖之兆。但俗人可不行，華蓋在上，就要

給罩住了，只好碰釘子。我今年開手作雜感時，就碰了兩個大釘子：一是爲了咬文嚼字，一是爲了青年必讀書。署名和匿名的豪傑之士的罵信，收了一大捆，至今還塞在書架下，此後又突然遇見了一些所謂學者，文士，正人，君子等等，據說都是講公話，談公理，而且深不以“黨同伐異”爲然的，可惜我和他們太不同了，所以也就被他們伐了幾下，——但這自然是爲“公理”之故，和我的“黨同伐異”不同。這樣，一直到現下還沒有完結，只好“以待來年”。

也有人勸我不要做這樣的短評，那好意，我是很感激的，而且也並非不知道創作之可貴，然而要做這樣的東西的時候，恐怕也還要做這樣的東西，我以為如果藝術之宮裏有這麼麻煩的禁令，倒不如不進去；還是站在沙漠上，看看飛沙走石，樂則大笑，悲則大叫，憤則大罵，即使被沙礫打得遍身粗糙，頭破血流，而時時撫摩自己的凝血，覺得若有花紋，也未必不及跟着中國的文士們去陪莎士比亞喫黃油麵包之有趣。

然而只恨我的眼界小，單是中國，這一年的大事件也可以算是很多的了，我竟往往沒有論及，似乎無所感觸。我早就很希望中國的青年站出來，對於中國的社會，文明，都毫無忌憚地加以批評，因此曾編印莽原週刊，作爲發言之地，可惜來說話的竟很少。在別的刊物上，倒大抵是對於反抗者的打擊，這實在是使我怕敢想下去的。

現在是一年的盡頭的深夜，深得這夜將盡了，我的生命，至少是一部分的生命，已經耗費在寫這些無聊的東西中，而我所獲得的，乃是我自己的靈魂的荒涼和粗糙。但是我並不懼怕這些，也不想遮蓋這些，而且實在有些愛他們了，因為這是我轉輾而生活於風沙中的癡痕。凡有自己也覺得在風沙中轉輾而生活着的，會知道這意思。

我編熱風時，除遺漏的之外，又刪去了好幾篇。這一回却小有不同了，一時的雜感一類的東西，幾乎都在這裏面。

這裏面[指華蓋集續編]所講的仍然並沒有宇宙的奧義和人生的真諦。不過是，將我所遇到的，所想到的，所要說的，一任牠怎樣淺薄，怎樣偏激，有時便都用筆寫了下來。說得自誇一點，就如悲喜時節的歌哭一般，那時無非藉此來釋憤抒情，現在更不想和誰去搶奪所謂公理或正義。你要那樣，我偏要這樣是有的；偃不遵命，偏要磕頭是有的；偏要在莊嚴高尚的假面上撥牠一撥也是有的，此外却毫無什麼大舉，名副其實，“雜感”而已。

這二十多篇小品[指野草]，如每篇末尾所注，是一九二四至二六年在北京所作，陸續發表於期刊語絲上的。大抵僅僅是隨時的小感想，因為那時難於直說，所以有時

措辭就很含糊了。

現在舉幾個例罷，因為諷刺當時盛行的失戀詩，作我的失戀，因為憎惡社會上旁觀者之多，作復讎第一篇，又因為驚異於青年之消沈，作希望。這樣的戰士，是有感於文人學士們幫助軍閥而作，臘葉是為愛我者的想要保存我而作的。段祺瑞政府鎗擊徒手民衆後，作淡淡的血痕中，其時我已避居別處；奉天派和直隸派軍閥戰爭的時候，作一覺，此後我就不能住在北京了。

所以，這也可以說，大半是廢弛的地獄邊沿的慘白色小花，當然不會美麗。但這地獄也必須失掉。這是由幾個有雄辯和辣手，而那時還未得志的英雄們的臉色和語氣所告訴我的。我於是作失掉的好地獄。

後來，我不再作這樣的東西了。日在變化的時代，已不許這樣的文章，甚而至於這樣的感想存在。我想，這也許倒是好的罷。

第九章 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

中華民國十六年三月十八日，段祺瑞政府使衛兵用步鎗大刀，在國務院門前包圍虐殺徒手請願，意在援助外交之青年男女，至數百人之多。還要下令，誣之曰“暴徒”！

如此殘虐險狠的行爲，不但在禽獸中所未曾見，便是在人類中也極少有的，除却俄皇尼古拉二世使可薩克兵擊殺民衆的事，僅有一點相像。

中國只任虎狼侵食，誰也不管。管的只有幾個年青的學生，他們本應該安心讀書的，而時局漂搖得他們安心不下。假如當局者稍有良心，應如何反躬自責，激發一點天良？

然而竟將他們虐殺了！

假如這樣的青年一殺就完，要知道屠殺者也決不是勝利者。

中國要和愛國者的滅亡一同滅亡。屠殺者雖然因為積有金資，可以比較長久地養育子孫，然而必至的結果是一定要到的。“子孫繩繩”又何足喜呢？滅亡自然較遲，但他們要住最不適於居住的不毛之地，要做最深的礦洞的礦工，要操最下賤的生業……。

如果中國還不至於滅亡，則已往的史實示教過我們，將來的事便要大出於屠殺者的意料之外——

這不是一件事的結束，是一件事的開頭。

墨寫的謊說，決掩不住血寫的事實。

血債必須用同物償還。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

以上都是空話。筆寫的，有什麼相干？

實彈打出來的却是青年的血。血不但不掩於墨寫的謊語，不醉於墨寫的輓歌；威力也壓牠不住，因為牠已經驅不過，打不死了。

三月十八日的慘殺事件，在事後看來，分明是政府佈成的羅網，純潔的青年們竟不幸而陷下去了，死傷至於三百多人。這羅網之所以佈成，其關鍵就全在於“流言”的奏了功效。

這是中國的老例，讀書人的心裏大抵含着殺機，對於異己者總給他安排下一點可死之道。就我所眼見的而論，凡陰謀家攻擊別一派，光緒年間用“康黨”，宣統年間用“革黨”，民二以後用“亂黨”，現在自然要用“共產黨”了。

但次日，徐謙，李大釗，李煜瀛，易培基，顧兆熊的通緝令發表了。因為他們“嘯聚羣衆”，像去年女子師範大學生的“嘯聚男生”（章士釗解散女子師範大學呈文語）一樣，“嘯聚”了帶着一根木棍，兩支手鎗，三瓶煤油的羣衆，以這樣的羣衆來顛覆政府，當然要死傷三百多人；而徐謙們以人命爲兒戲到這地步，那當然應該負殺人之罪了；而況自己又不到場，或者全都逃跑了呢？

以上是政治上的事，我其實不很了然。但從別一方面看來，所謂“嚴拿”者，似乎倒是趕走；所謂“嚴拿”暴徒者，似乎不過是趕走北京中法大學校長兼清室善後委員會委員長（李），中俄大學校長（徐），北京大學教授（李大釗），北京大學教務長（顧），女子師範大學校長（易）；其中的三個又是俄款委員會委員：一共空出九個“優美的差缺”也。

三月十八日段祺瑞，賈德耀，章士釗們使衛兵鎗殺民衆，通緝五個所謂“暴徒首領”之後，報上還流傳着一張

他們想要第二批通緝的名單。對於這名單的編纂者，我現在並不想研究。但將這一批人的籍貫職務條查開列起來，卻覺得取捨是頗為巧妙的。先開前六名，但所任的職務，因為我見聞有限，所以也許有遺漏：

- 一 徐謙（安徽）俄國退還庚子賠款委員會委員，中俄大學校長，廣東外交團代表主席。
- 二 李大釗（直隸）國立北京大學教授，校長室秘書。
- 三 吳敬恆（江蘇）清室善後委員會監理。
- 四 李煜瀛（直隸）俄款委員會委員長，清室善後委員會委員長，中法大學代理校長，北大教授。
- 五 易培基（湖南）前教育總長，現國立北京女子師範大學校長。
- 六 顧兆熊（直隸）俄款委員會委員，北大教務長，北京教育會會長。

四月九日京報云：“姓名上尚有圈點等符號，其意不明。……徐李等五人名上各有三圈，吳稚輝雖列名第三，而僅一點。餘或兩圈一圈或一點，不記其詳。”於是就有人推測，以為吳老先生之所以僅有一點者，因章士釗還想引以為重，以及別的原因云云。案此皆未經開列職務，以及未見陳源閒話之故也。只要一看上文，便知道圈點之別，不過表明“差缺”之是否“優美”。監理是點查物件的監督

者，又沒有什麼薪水，所以只配一點；而別人之“差缺”則大矣，自然值得三圈。“不記其詳”的餘人，依此類推，大約即不至於有大錯。將冠冕堂皇的“整頓學風”的盛舉，只作如是觀，雖然太煞風景，對不住“正人君子”們，然而我的眼光這樣，也就無法可想。再寫下去罷，計開：

- 七 陳友仁（廣東）前民報英文記者，現國民新報英文記者。
- 八 陳啓修（四川）中俄大學教務長，北大教授，女師大教授，國民新報副刊編輯。
- 九 朱家驊（浙江）北大教授。
- 十 蔣夢麟（浙江）北大教授，代理校長。
- 十一 馬裕藻（浙江）北大國文系主任，師大教授，前女師大總務長，現教授。
- 十二 許壽裳（浙江）教育部編審員，前女師大教務長，現教授。
- 十三 沈兼士（浙江）北大國文系教授，清室善後委員會委員，女師大教授。
- 十四 陳垣（廣東）前教育次長，現清室善後委員會委員北大導師。
- 十五 馬鈺倫（浙江）前教育次長，教育特稅督辦，現國立師範大學教授，北大講師。
- 十六 邵振青（浙江）京報總編輯。

- 十七 林玉堂（福建）北大英文系教授，女師大教務長，國民新報英文部編輯，語絲撰稿者。
- 十八 蕭子昇（湖南）前民報編輯，教育部秘書，猛進撰稿者。
- 十九 李玄伯（直隸）北大法文系教授，猛進撰稿者。
- 二十 徐炳昶（河南）北大哲學系教授，女師大教授，猛進撰稿者。
- 二十一 周樹人（浙江）教育部僉事，女師大教授，北大國文系講師，中國大學講師，國副編輯，莽原編輯，語絲撰稿者。
- 二十二 周作人（浙江）北大國文系教授，女師大教授，燕京大學副教授，語絲撰稿者。
- 二十三 張鳳舉（江西）北大國文系教授，女師大講師，國副編輯，猛進及語絲撰稿者。
- 二十四 陳大齊（浙江）北大哲學系教授，女師大教授。
- 二十五 丁維汾（山東）國民黨。
- 二十六 王法勤（直隸）國民黨，議員。
- 二十七 劉清揚（直隸）國民黨婦女部長。
- 二十八 潘廷幹
- 二十九 高魯（福建）中央觀象臺長，北大講師。

- 三十 譚熙鴻 (江蘇) 北大教授, 猛進撰稿者。
- 三十一 陳彬和 (江蘇) 前平民中學教務長, 前天津南開學校總務長, 現中俄大學總務長。
- 三十二 孫伏園 (浙江) 北大講師, 京報副刊編輯。
- 三十三 高一涵 (安徽) 北大教授, 中大教授, 現代評論撰稿者。
- 三十四 李書華 (直隸) 北大教授, 猛進撰稿者。
- 三十五 徐寶璜 (江西) 北大教授, 猛進撰稿者。
- 三十六 李麟玉 (直隸) 北大教授, 猛進撰稿者。
- 三十七 成平 (湖南) 世界日報及晚報總編輯
女師大講師。
- 三十八 潘蘊巢 (江蘇) 益世報記者。
- 三十九 羅敦偉 (湖南) 國民晚報記者。
- 四十 鄧飛黃 (湖南) 國民新報總編輯。
- 四十一 彭齊羣 (吉林) 中央觀象臺科長, 猛進撰稿者。
- 四十二 徐巽 (安徽) 中俄大學校務委員會委員長。
- 四十三 高穰 (福建) 律師, 曾擔任女師大學生控告章士釗劉百昭事。
- 四十四 梁鼎
- 四十五 張平江 (四川) 女師大學生。

四十六 姜昭謨 (浙江) 前教育部秘書。

四十七 郭春濤 (河南) 北大學生。

四十八 紀人慶 (雲南) 大中公學教員。

以上只有四十八人，五十缺二，不知是失，還是像九六的制錢似的，這就算是足串了。至於職務，除遺漏外，怕又有錯誤，並且有幾位是爲我所一時無從查考的。但即此已經足夠了，早可以看出許多秘密來——

甲 改組兩個機關：

1 俄國退還庚子賠款委員會；

2 清室善後委員會。

乙 “掃除”三個半學校：

1 中俄大學；

2 中法大學；

3 女子師範大學；

4 北京大學之一部分。

丙 撲滅四種報章：

1 京報；

2 世界日報及晚報；

3 國民新報；

4 國民晚報。

丁 “逼死”兩種副刊：

1 京報副刊；

2 國民新報副刊。

戊 妨害三種期刊：

1 猛進；

2 語絲；

3 莽原。

“孤桐先生”是“正人君子”一流人，“黨同伐異”怕是不至於的，“睚眦之怨”或者也未必報。但是趙子昂的畫馬，豈不是據說先對着鏡子，摹倣形態的麼？據上面的鏡子，從我的眼睛，還可以看見一些額外的形態——

- 1 連替女師大學生控告章士釗的律師都要獲罪，上面已經說過了。
- 5 陳源“流言”中的所謂“某籍”，有十二人，佔全數四分之一。
- 3 陳源“流言”中的所謂“某系”（案蓋指北大國文系也），計有五人。
- 4 曾經發表反章士釗宣言的北大評議員十七人，有十四人在內。
- 5 曾經發表反楊蔭榆宣言的女師大教員七人，有三人是在內，皆“某籍”。

這通緝如果實行，我是想要逃到東交民巷或天津去的；能不能自然是別一問題。這種舉動雖將為“正人君子”所冷笑，但我却不願意為要博得這些東西的誇獎，便到

“孤桐先生”的麾下去投案。但這且待後來再說，因為近幾天是“孤桐先生”也如“政客，富人，和革命猛進者及民衆的首領”一般，“安居在東交民巷裏”了。

第十章 從廈門到廣州

我九月一日[一九二六]年夜半上船，二日晨七時開，四日午後一時到廈門，一路無風，船很平穩，這裏的話，我一字都不懂，只得暫到客寓，打電話給林語堂，他便來接，當晚即移入學校居住了。

我的功課，大約每週當有六小時，因為語堂希望我多講，情不可卻。其中兩點是小說史，無須豫備；兩點是專書研究，須豫備；兩點是中國文學史，須編講義。看看這裏舊存的講義，則我隨便講講就很夠了，但我還想認真一點，編成一本較好的文學史。

此地北伐順利的消息也極多，極快人意。

看廈大的國學院，越看越不行了。朱山根是自稱只佩服胡適陳源兩個人的，而田千頃，辛家本，白果三人，似皆他所薦引。白果尤善興風作浪，他曾在女師大做過職員你該知道的罷，現在是玉堂的襄理，還兼別的事，對於較小的職員，氣不可當，嘴裏都是油滑話。我因為親聞他

密語玉堂，“誰怎樣不好”等等，就看不起他了。前天就很給他碰了一個釘子，他昨天借題報復，我便又給他碰了一個大釘子，而自己則辭去國學院兼職。我是不與此輩共事的，否則，何必到廈門。

此地的生活也實在無聊，外省的教員，幾乎無一人作長久之計，兼士之去，固無足怪。但我比兼士隨便一些，又因為見玉堂的兄弟及太太，都很為我們的生活操心：學生對我尤好，只恐怕在此住不慣，有幾個本地人，甚至於星期六不回家，預備星期日我若往市上去玩，他們好同去作翻譯。所以只要沒有什麼大下不去的事，我總想在此至少講一年，否則，我也許早跑到州廣或上海去了。（但還有幾個很歡迎我的人，是要我首先開口攻擊此地的社會等等，他們好跟着來開鎗。

“現代評論派”的勢力，在這裏我看要膨脹起來，當局者的性質，也與此輩相合理。科也很忌文科，正與北大一樣。閩南與閩北人之感情頗不洽，有幾個學生極希望我走，但並非對我有惡意，乃是要學校倒楣。

北伐軍得武昌，得南昌，都是確的。浙江確也獨立了，上海附近也許又要小戰。

……一個教員和我談起，知道有幾個諍回同來的人

物之排斥我，漸漸顯著了，因為從他們的語氣裏，他已經聽得出來，而且他們似乎還同他去聯絡。他於是歎息說：“玉堂敵人頗多，但對於國學院不敢下手者，只因為兼士和你兩人在此也。兼士去而你在，尚可支持，倘你亦走，敵人即無所顧忌，玉堂的國學院就要開始動搖了。玉堂一失敗，他們也站不住了。而他們一面排斥你，一面又個個接家眷，準備作長久之計，真是胡塗”云云。我看這是確的，這學校，就如一部三國志演義，你鎗我劍，好看煞人。北京的學界在都市中擠軋，這裏是在小島上擠軋，地點雖異，擠軋則同。但國學院內部的排擠現象，外敵却還未知道。他們誤以為那些人們倒是兼士和我的小卒，我們是給他們來打地盤的)，將來一知道，就要樂不可支。我於這裏毫無留戀，喫苦的還是玉堂，但我和玉堂的交情，還不到可以向他說明這些事情的程度，即使說了，他是否相信，也難說的。我所以只好一聲不響，自做我的事，他們想攻倒我，一時也很難，我在這裏到年底或明年，看我自己的高興。至於玉堂，我大概是愛莫能助的了。

我雖然在這裏[廈門大學]，也常想投稿給語絲，但是一句也寫不出，連野草也沒有一莖半葉。現在只是編講義。為什麼呢？這是你一定了然的：為喫飯。喫了飯為什麼呢？倘照這樣下去，就是為了編講義。喫飯是不高尚的事，

我倒並不這樣想。然而編了講義來喫飯，喫了飯來編講義，可也覺得未免近於無聊。別的學者們教授們又作別論，從我們平常人看來，教書和寫東西是勢不兩立的，或者死心塌地地教書，或者發狂變死地寫東西，一個人走不了方向不同的兩條路。

但我對於此後的方針，實在很有些徘徊不決，那就是：做文章呢，還是救書！因為這兩件事，是勢不兩立的：作文要熱情，救書要冷靜。兼做兩樣的，倘不認真，便兩面都油滑淺薄，倘都認真，則一時使熱血沸騰，一時使心平氣和，精神便不勝困憊，結果也還是兩面不討好。看外國，兼做教授的文學家，是從來很少有的。我自己想，我如寫點東西，也許於中國不無小好處，不寫也可惜；但如果使我研究一種關於中國文學的事，大概也可以說出一點別人沒有見到話來，所以放下也似乎可惜。但我想，或者還不如做些有益的文章，至於研究，則於餘暇時做，不過倘使應酬一多，可又不行了。

北伐事，廣州也說得很好，說是周蔭人已死，西北軍進行順利，都是好消息。

[十一月四日]有從中大寄給伏園的信到來，可見他已經離開廣州，但尚未到，也許到汕頭或福州游玩去了。

他走後給我達封信，關於我的事，一字不提。今天看見中大的考試委員名單，文科中人多得很，他也在內，郭沫若，郁達夫也在；那麼，我的去不去也似乎沒有多大關係，可以不必急急趕到了。

中大的薪水比廈大少，這我倒並不在意，所慮的是功課多，聽說每週最多可至十二小時，而做文章一定也萬不能免，即如伏園所辦的副刊，就非投稿不可，倘再加上別的事情，我就又須喫藥做文章了。在這幾年中，我很遇見了些文學青年，由經驗的結果，覺他們之於我，大抵是可以使役時便竭力使役，可以詰責時便竭力詰責，可以攻擊時自然是竭力攻擊，因此我於進退去就，頗有戒心，這或也是頹唐之一端，但我覺得這也是環境造成的。

其實我也還有一點野心，也想到廣州後，對於“紳士”們仍然加以打擊，至多無非不能回北京去，並不在意。第二是與“創造社”聯合起來，造一條戰線，更向舊社會進攻，我再勉力寫些文字。但不知怎的，看見伏園回來吞吞吐吐之後，便又不作此想了。然而這也不過是近一兩天如此，究竟如何，還當看後來的情形的。

浙江獨立早已灰色，夏超確已死了，是為自己的兵所殺的，浙江的警備隊，全不中用。今天看報，知九江已克，周鳳岐（浙兵師長）降，也已見於路透電，定是確的，則孫

傳芳仍當聲勢日盛耳，我想浙江或當還有點變化。

我這幾天忽而對於到廣州教書的事，很有些躊躇了；恐怕情形會和在北京時相像。廈門當然難以久留，此外也無處可走，實在有些焦躁。我其實還敢站在前線上，但發見當面稱爲“同道”的暗中將我作傀儡或從背後鎗擊我，却比被敵人所傷更其悲哀。我的生命，碎割在給人改稿子，看稿子，編書，校字，陪坐這些事情上者，已經很不少，而有些人因此竟以主子自居，稍不合意，就責難紛起，我此後頗想不再蹈這覆轍了。

這裏還是照先前一樣，並沒有什麼，只聽說漳州是民軍就要入城了。克復九江，則其事當甚確。〔十一月九日〕又聽到一消息，說陳儀入浙後，也獨立了，這使我很高興，但今天無確得之消息，必須再過幾天，纔能知道真假。

中國學生學什麼意大利，以趨奉北政府，還說什麼“樹的黨”，可笑極了。別的人就不能用更粗的棍子對打麼？

〔十一月廿五日〕本地報上的消息很好，泉州已得，浙陳儀又獨立，商震反戈攻張家口，國民一軍將至潼關。此地報紙大概是民黨色彩，消息或傾於宣傳，但我想，至少

泉州攻下總是確的。本校學生中，民黨不過三十左右，其中不少是新加入者，昨夜開會，我覺得他們都沒有歷練，不深沈，連設法取得學生會以供我用的事情都不知道，真是奈何奈何。

我一生的失計，即在向來不爲自己生活打算；一切聽人安排，因爲那時豫料是活不久的。後來豫料並不確中，仍能生活下去，遂至弊病百出，十分無聊，再後來，思想改變了，但還是多所顧忌，這些顧忌，大部分自然是爲生活，幾分也爲地位，所謂地位者，就是指我歷來的一點小小工作而言，怕因我的行爲的劇變而失去力量。這些瞻前顧後，其實也是很可笑的，這樣下去，更將不能動彈。第三法最爲直截了當，而細心一點，也可以比較的安全，所以一時也決不定。總之，我先前的辦法已是不妥，在廈大就行不通，我也決計不再敷衍了，第一步我一定於年底離開這裏，就中大教授職。

離開此地之後，我必須改變我的農奴生活；爲社會方面，則我想除教書外，仍然繼續作文藝運動，或其他更好的工作，俟那時再定。我覺得現在H. M.比我有決斷得多，我自到此地以後，彷彿全感空虛，不再有什麼意見，而且有時確也有莫明其妙的悲哀，曾經作了一篇我的雜文集的跋就寫着那時的心情。

廈大我只得拋開了，中大如有可爲，我還想爲之盡一點力，但自然以不損自己之身心爲限。我來廈門，雖是爲了暫避軍閥官僚，“正人君子”們的迫害，然而小半也在休息幾時，及有些準備，不料有些人遽以爲我被奪掉筆墨了，不再有開口的可能，便即翻臉攻擊，想踏着死屍站上來，以顯他的英雄，并報他自己心造的讎恨。北京似乎也流言，和在上海所聞者相似，且云長虹之拚命攻擊我，乃爲此。這真出我意外，但無論如何，用這樣的手段，想來征服我，是不行的，我先前對於青年的唯唯聽命，乃是退讓，何嘗是無力戰鬥。現既逼迫不完，我就偏又出來做些事，而且偏在廣州，住得更近點，看他們躲在黑暗裏的諸公其奈我何。然而這也許是適逢其會的藉口，其實是即使並無他們的閒話，我也還是要到廣州的。

十二月卅一日，我已將正式的辭職書提出，截至當日止，辭去一切職務！這事很給學校當局一點苦悶：爲虛名計，想留我，爲乾淨，省事計，願放我走，所以頗爲難，但我和廈大根本衝突，無可調和，故無論如何，總是收得後者的結果的。

這幾天，“名人”做得太苦了，赴了幾處送別會，都要演說，照相。我原以爲這裏是死海，不料經這一攪，居然也

有了些波動，許多學生因此而憤慨，有些人頗惱怒，有些人則藉此來攻擊學校或人們，而被攻擊者是竭力要將我之爲人說得壞些，以減輕自己的傷害。所以近來謠言頗多，但我袖手旁觀，煞是有趣。然而這些事故，於學校是仍無益處的，這學校除全盤改造之外，沒有第二法。

學生至少有二十個也要走。我確也非走不可了，因爲我在這裏，竟有從河南中州大學轉學而來的，而學校的實際又是這模樣，我若再幫同來招徠，豈不是誤人子弟？所以我一面又做了一篇通信，去登語絲；表明我已離開廈門。我好像也已經成了偶像了，記得先前有幾個學生拿了狂瀾來，力勸我回罵長虹，說道：你不是你自己的了，許多青年等着聽你的話，我曾爲之喫驚，心裏想，我成了大家的公物，那是不得了的，我不願意。還不如倒下去，舒服得多。

現在看來，還得再硬做“名人”若干時，這纔能夠罷手。但也並無大志，只要中大的文科辦得還像樣，我的目的就達了，此外都不管。我近來改變了一點態度，諸事都隨手應付，不計利害，然而也不很認真，倒覺得辦事很容易，也不疲勞。

直到一九二六年的秋天，一個人住在廈門的石屋裏，對着大海，翻着古書，四近無生人氣，心裏空空洞洞，而北



廈門大學講學時期的魯迅



在全國木刻展覽會場上

京的未名社，却不絕的來信，催促雜誌的文章。這時我不願意想到目前；於是回憶在心裏出土了，寫了十篇朝華夕拾；並且仍舊拾取古代的傳說之類，預備足成八則故事新編。但剛寫了奔月和鑄劍——發表的那時題爲眉間尺，——我便奔向廣州，這事就又完全擱起了，後來雖然偶爾得到一點題材，一段速寫，却一向不加整理。

我常想在紛擾中尋出一點閒靜來，然而委實不容易。目前是這麼離奇，心裏是這麼蕪雜。一個人做到只剩了回憶的時候，生涯大概總要算是無聊了罷，但有時竟會連回憶也沒有。中國的做文章有軌範，世事也仍然是螺旋。前幾天我離開中山大學的時候，便想起四個月以前的離開廈門大學；聽到飛機在頭上鳴叫，竟記得了一年前在北京城上日日旋繞的飛機。我那時還做了一篇短文，叫做一覺。現在是，連這一覺也沒有了。

廣州的天氣熱得真早，夕陽從西窗射入，逼得人只能勉強穿一件單衣。書桌上的一盆“水橫枝”，是我先前沒有見過的，就是一段樹只要浸在水中，枝葉便青蔥得可愛，看看綠葉，編編舊稿，總算也在做一點事。做着這等事，真是雖生之日，猶死之年，很可以驅除炎熱的。

帶露折花，色香自然要好得多，但是我不能夠。便是現在心目中的離奇和蕪雜，我也還不能使他即刻幻化，轉

成離奇或蕪雜的文章。或者，他日仰看流雲時，曾在我的眼前一閃爍罷。

我有一時，曾經屢次憶起兒時在故鄉所喫的蔬果：菱角，羅漢豆，茭白，香瓜，凡這些，都是極其鮮美可口的；都會是使我思鄉的蠱惑。後來，我在久別之後嘗到了，也不過如此；惟獨在記憶上，還有舊來的意味留存。他們也許要哄騙我一生，使我時時反顧。

我所遇見的那些事，全是社會上的常情，我倒並不覺得怎樣。我所感到悲哀的，是有幾個同我來的學生，至今還找不到學校進，還在顛沛流離。我還要補足一句，是，他們都不是共產黨，也不是親共派。其喫苦的原因，就在和我認得。所以有一個，曾得到他的同鄉的忠告道：“你以後不要再說你是魯迅的學生了罷。”在某大學裏，聽說尤其嚴厲，看看語絲，就要被稱爲“語絲派”，和我認識，就要被叫爲“魯迅派”的。

這樣子，我想，已經夠了，大足以平平正人君子之流的心了。但還要聲明一句，這是一部分的人們對我的情形。此外，肯忘掉我，或者至今還和我來往，或要我寫字或講演的人，偶然也仍舊有的。

第十一章 “語絲”四年

同我關係較為長久的，要算語絲了。

大約這也是原因之一罷，“正人君子”們的刊物，曾封我為“語絲派主將”，連急進的青年所做的文章，至今還說我是“語絲”的“指導者”。

自然，“主將”和“指導者”並不是壞稱呼，被晨報館所壓迫，也不能算是恥辱，老人該受青年的教訓，更是進步的好現象，還有什麼話可說呢。但是，“不虞之譽”，也和“不虞之毀”一樣地無聊，如果生平未曾帶過一兵半卒，而有人拱手頌揚道“你真像拿破崙呀！”則雖是志在做軍閥的未來的英雄，也不會怎樣舒服的。我並非“主將”的事，[一九二七年]早已聲辯了——雖然似乎很少效力——這回想要寫一點下來的，是我從來沒有受過晨報館的壓迫，也並不是和孫伏園先生兩個人創辦了語絲。這的創辦，倒要歸功於伏園一位的。

那時伏園是晨報副刊的編輯，我是由他個人來約，投些稿件的人。

然而我並沒有什麼稿件，於是就有人傳說，我是特約撰述，無論投稿多少，每月總有酬金三四十元的。據我所聞，則晨報館確有這一種太上作者，但我並非其中之一，不過因為先前的師生——恕我僭妄，暫用這兩個字——關係罷，似乎也頗受優待：一是稿子一去，刊登得快；二是每千字二元至三元的稿費，每月底大抵可以取到；三是短短的雜評，有時也送些稿費來。但這樣的好景象並不久長，伏園的椅子頗有不穩之勢。因為有一位留學生（不幸我忘掉了他的名姓）新從歐洲回來，和晨報館有深關係，甚不滿意於副刊，決計加以改革，並且為戰鬥計，已經得了“學者”的指示，在開手看 Anatole France 的小說了。

那時的法蘭斯，威爾士，蕭，在中國是大有威力，足以嚇倒文學青年的名字，正如今年的辛克萊兒一般，所以以那時而論，形勢實在是已經非常嚴重。不過我現在無從確說，從那位留學生開手讀法蘭斯的小說起到伏園氣忿忿地跑到我的寓裏來為止的時候，其間相距是幾月還是幾天。

“我辭職了。可惡！”

這是有一夜，伏園來訪，見面後的第一句話。那原足意料中事，不足異的。第二步，我當然要問問辭職的原因，而不料竟和我有了關係。他說，那位留學生乘他外時，到排字房去將我的稿子抽掉，因此爭執起來，弄到非辭職

不可了。但我並不氣忿，因為那稿子不過是三段打油詩，題作“我的失戀”，是看見當時“阿呀阿唷，我要死了”之類的失戀詩盛行，故意做一首用“由她去罷”收場的東西，開玩笑的。這詩後來又添了一段，登在語絲上，再後來就收在野草中。而且所用的又是另一個新鮮的假名，在不肯登載第一次看見姓名的作者的稿子的刊物上，也當然很容易被有權者所放逐的。

但我很抱歉伏園爲了我的稿子而辭職，心上似乎壓了一塊沈重的石頭。幾天之後，他提議要自辦刊物了，我自然答應願意竭力“吶喊”。至於投稿者，倒全是他獨力邀來的，記得是十六人，不過後來也並非都有投稿。於是印了廣告，到各處張貼，分散，大約又一星期，一張小小的一週刊便在北京——尤其是大學附近——出現了。這便是語絲。

那名目的來源，聽說，是有幾個人，任意取一本書，將書任意翻開，用指頭點下去，那被點到的字，便是名稱。那時我不在場，不知道所用是什麼書，是一次便得了語絲的名，還是點了好幾次，而曾將不像名稱的廢去，但要之，即此已可知這刊物本無所謂一定的目標，統一的戰綫；那十六個投稿者，意見態度也各不相同，例如顧頡剛教授，投的便是“考古”稿子，不如說，和語絲的喜歡涉及現在

社會者，倒是相反的。不過有些人們，大約開初是只在敷衍和伏園的交情的罷，所以投了兩三回稿，便取“敬而遠之”的態度，自然離開。連伏園自己，據我的記憶，自始至今，也只做過三回文字，末一回是宣言從此要人為語絲撰述，然而宣言之後，却連一個字也不見了。於是語絲的固定的投稿者，至多便只剩了五六人，但同時也在不意中顯了一種特色，是：任意而談，無所顧忌，要催促新的產生，對於有害於新的舊物，則竭力加以排擊，——但應該產生怎樣的“新”，却並無明白的表示，而一到覺得有些危急之際，也還是故意隱約其詞。陳源教授痛斥“語絲派”的時候，說我們不敢直罵軍閥，而偏和握筆的名人為難。便由於這一點。但是，叱吧兒狗險於叱狗主人；我們其實也知道的，所以隱約其詞者，不過要使走狗嗅得，跑去獻功時，必須詳加說明，比較地費些力氣，不能直捷痛快，就得好處而已。

當開辦之際，努力確也可驚，那時做事的，伏園之外，我記得還有小峯和川島，都是乳毛還未褪盡的青年，自跑印刷局，自去校對，自疊報紙，還自己拿到大衆聚集之處去兜售，這真是青年對於老人，學生對於先生的教訓，令人覺得自己只用一點思索，寫幾篇文章，未免過於安逸，還須竭力學好了。

但自己賣報的成績，聽說並不佳，一紙風行的，還是

在幾個學校，尤其是北京大學，尤其是第一院（文科）。理科次之。在法科則不大有人顧問。倘若說，北京大學的法政，經濟科出身諸君中，絕少有語絲的影響，恐怕是不會很錯的。至於對於晨報的影響，我不知道，但以乎也頗受些打擊，曾經和伏園來說和，伏園得意之餘，忘其所以，曾以勝利者的笑容，笑着對我說道——

“真好，他們竟不料踏在炸藥上了！”

這話對別人說是不算什麼的。但對我說，却好像澆了一碗冷水，因為我即刻覺得這“炸藥”是指我而言，用思索，做文章，都不過使自己為別人的一個小糾葛而粉身碎骨，心裏就一面想——

“真糟，我竟不料被埋在地下了！”

我於是乎“彷徨”起來。

譚正璧先生有一句用我的小說的名目，來批評我的作品的經過的極伶俐而省事的話道：“魯迅始於‘吶喊’而終於‘彷徨’”（大意），我以為移來敘述我和語絲由始以至此時的歷史，倒是很確切的。

但我的“彷徨”並不用許多時，因為那時還有一點讀過尼采的“Zarathustra”的餘波，從我這裏只要能擠出一——雖然不過是擠出一——文章來，就擠了去罷，從我這裏只要能做出一點“炸藥”來，就拿去做了罷，於是也就決定，還是照舊投稿了——雖然對於意外的被利用，心裏也耿

耿了好幾天。

語絲的銷路可只是增加起來，原定是撰稿者同時負擔印費的，我付了十元之後，就不見再來收取了，因為收支已足相抵，後來並且有了贏餘。於是小峯就被尊為“老板”，但這推尊並非美意，其時伏園已另就京報副刊編輯之職，川島還是搗亂小孩，所以幾個撰稿者便只好辭住了多睏眼而少開口的小峯，加以榮名，勒令拿出贏餘來，每月請一回客。這“將欲取之，必先與之”的方法果然奏效，從此市場中的茶居或飯鋪的或一房門外，有時便會看見掛着一塊上寫“語絲社”的木牌。倘一駐足，也許就可以聽到疑古玄同先生的又快又響的談吐，但我那時是在避開宴會的，所以毫不知道內部的情形。

我和語絲的淵源和關係，就不過如此。雖然投稿時多時少。但這樣地一直繼續到我走出了北京。到那時候，我還不知道實際上是誰在編輯。

語絲雖總想有反抗精神，而時時有疲勞的顏色，大約因為看得中國的內情太清楚，所以不免有些失望之故罷。由此可見事太明，做事即失其勇，莊子所謂“察見淵魚者不祥”，蓋不獨謂將為衆所忌，且於自己的前進亦復大有妨礙也。我現在還要找尋生力軍，加多破壞論者。

到得廈門，我投稿就很少了。一者因為相離已遠，不受催促，責任便覺得輕；二者因為人地生疏，學校裏所遇到的又大抵是些念佛老嫗式的口角，不值得費紙墨。倘能做魯賓孫教書記或蚊蟲叮卵脬論，那也許倒很有趣的，而我又沒有這樣的“天才”，所以只寄了一點極瑣碎的文字。這年底到了廣州，投稿也很少。第一原因是和在廈門相同的；第二，先是忙於事務，又看不清那裏的情形，後來頗有感慨了，然而我不想在牠的敵人的治下去發表。

不願意在有權者的刀下，頌揚他的威權，并奚落其敵人來取媚，可以說，也是“語絲派”一種幾乎共同的態度。所以語絲在北京雖然逃過了段祺瑞及其吧兒狗們的撕裂，但終究被“張大元帥”所禁止了，發行的北新書局，且同時遭了封禁，其時是一九二六年。

這一年小峯有一回到我的上海的寓居，提議語絲就要在上海印行，且囑我擔任做編輯。以關係而論，我是不應該推託的。於是擔任了。從這時起，我纔探問向來的編法。那很簡單，就是：凡社員的稿件，編輯者並無取捨之權，來則必用，只有外來的投稿，由編輯者略加選擇，必要時且或略有所刪除。所以我應做的，不過後一段事，而且社員的稿子，實際上也十之九直寄北新書局，由那裏逕送印刷局的，等到我看見時，已在印釘成書之後了。所謂“社員”，也並無明確的界限，最初的撰稿者，所餘早已無多，

中途出現的人，則在中途忽來忽去。因為語絲是又有愛登碰壁人物的牢騷的習氣的，所以最初出陣，尚無用武之地的人，或本在別一團體，而發生意見，借此反攻的人，也每和語絲暫時發生關係，待到功成名遂，當然也就淡漠起來。至於因環境改變，意見分歧而去的，那自然尤為不少，因此所謂“社員”者，便不能有明確的界限。前年的方法，是只要投稿幾次，無不刊載，此後便放心發稿，和舊社員一律待遇了。但經舊的社員紹介，直接交到北新書局，刊出之前，為編輯者的眼睛所不能見者，也間或有之。

經我擔任了編輯之後，語絲的時運就很不濟了，受了一回政府的警告，遭了浙江當局的禁止，還招了創造社式“革命文學”家的拚命的圍攻。警告的來由，我莫名其妙，有人說是因為一篇戲劇；禁止的緣故也莫名其妙，有人說是因為登載了揭發復旦大學內幕的文字，而那時浙江的黨務指導委員老爺却有復旦大學出身的人們。至於創造社派的攻擊，那是屬於歷史底的了，他們在把守“藝術之宮”，還未“革命”的時候，就已經將“語絲派”中的幾個人看作眼中釘的，敘事夾在這裏太冗長了，且待下一回再說罷。

但語絲本身，却確實也在消沈下去。一是對於社會現象的批評幾乎絕無，連這一類的投稿也少有，二是所餘的幾個較久的撰稿者，這時又少了幾個了。前者的原因，

我以為是在無話可說，或有話而不敢言，警告和禁止，就是一個實證，後者，我恐怕是其咎在我的。舉一點例罷，自從我萬不得已，選登了一篇極平和的糾正劉半農先生的“林則徐被俘”之誤的來信以後，他就不再有片紙隻字；江紹原先生介紹了一篇油印的“馮玉祥先生……”來，我不給編入之後，紹原先生也就從此沒有投稿了，並且這篇油印文章不久便在也是伏園所辦的貢獻上登出，上有鄭重的小序，說明着我託辭不載的事由單。

還有一種顯著的變遷是廣告的雜亂。看廣告的種類，大概是就可以推見這刊物的性質的。例如“正人君子”所辦的現代評論上，就會有金城銀行的長期廣告，南洋華僑學生所辦的秋野上，就能見“虎標良藥”的招牌。雖是打着“革命文學”旗子的小報，只要看那上面的廣告大半是花柳藥和飲食店，便知道作者和讀者，仍然和先前的專講妓女戲子的小報的人們同流，現在不過用男作家，女作家來替代了倡優，或捧或罵，算是在文壇上做工夫。語絲初辦的時候，對於廣告的選擇是極嚴的，雖是新書，倘社員以為不是好書，也不給登載。因為是同人雜誌，所以撰稿者也可行使這樣的職權。聽說北新書局之辦北新半月刊，就因為在語絲上不能自由登載廣告的緣故。但自從移在上海出版以後，書籍不必說，連醫生的診例也出現了，襪廠的廣告也出現了，甚至於立愈遺精藥品的廣告

也出現了。固然，誰也不能保證語絲的讀者決不遺精，況且遺精也並非惡行，但善後辦法，却須向申報之類，要穩當，則向醫藥學報的廣告上去留心的。我因此得了幾封詰責的信件，又就在語絲本身上登了一篇投來的反對的文章。

但以前我也曾盡了我的本分。當德廠出現時，曾經當面質問過小峯，回答是“發廣告的人弄錯的”；遺精藥出現時，是寫了一封信，並無答覆，但從此以後，廣告却也不見了。我想，在小峯，大約還要算是讓步的，因為這時對於一部分的作家，早由北新書局致送稿費，不只負發行之責，而語絲也因此並非純粹的同人雜誌了。

積了半年的經驗之後，我就決計向小峯提議，將語絲停刊，沒有得到贊成，我便辭去編輯的責任：小峯要我尋一個替代的人，我於是推舉了柔石。

但不知爲什麼，柔石編輯了六個月，第五卷的上半卷一完，也辭職了。

以上是我所遇見的關於語絲四年中的瑣事。

第十二章 解剖別人尤其是解剖自己

我再說我自己如何在世上混過去的方法，以供參考罷——

一，走“人生”的長途，最易遇到的有兩大難關。其一是“歧路”，倘是墨翟先生，相傳是慟哭而返的，但我不哭，也不返，先在歧路頭坐下，歇一會，或者睡一覺，於是選一條似乎可去的路再走，倘遇老實人；也許奪他食物來充飢，但是不問路，因為我料定他並不知道的，如果遇見老虎，我就爬上樹去，等牠餓得走去了再下來，倘牠竟不走，我就自己餓死在樹上，而且先用帶子縛住，連死屍也決不給牠喫；但倘若沒有樹呢？那麼，沒有法子，只好請牠喫了，但也不妨咬牠一口。其二便是“窮途”了，聽說阮籍先生也大哭而回，我却也像在歧路上的辦法一樣，還是跨進去，在刺叢裏姑且走去。但我也並未遇到全是荆棘毫無可走的地方過，不知道是否世上本無所謂窮途，還是我幸而沒有遇着。

二，對於社會的戰鬥 我是並不挺身而出的，我不勸

別人犧牲什麼之類者就爲此。歐戰的時候，最重“壕塹戰”，戰士伏在壕中，有時吸煙，也唱歌，打紙牌，喝酒，也在壕內開美術展覽會，但有時忽向敵人開他幾鎗。中國多暗箭，挺身而出的勇士容易喪命，這種戰法是必要的罷。但恐怕也有時會逼到非短兵相接不可的，這時候，沒有法子，就短兵相接。

總結起來，我自己對於苦悶的辦法，是專與襲來的苦痛搗亂，將無賴手段當作勝利，硬唱凱歌，算是樂趣，這或者就是糖罷。但臨末也還是歸結到“沒有法子”，這真是沒有法子！

以上，我自己的辦法說完了，就不過如此，而且近於遊戲，不像步步走在人生的正軌上。（人生或者有正軌罷，但我不知道。）

記得先已說過：這不過是我的生活中的一點陳迹。如果我的過往，也可以算作生活，那麼，也就可以說我也曾工作過了。但我並無噴泉一般的思想，偉大華美的文章，既沒有主義要宣傳，也不想發起一種什麼運動。不過我曾經嘗得，失望無論大小，是一種苦味，所以幾年以來，有人希望我動動筆的，只要意見不很相反，我的力量能夠支撐，就總要勉力寫幾句東西，給來者一些極微末的歡喜。人生多苦辛，而人們有時却極容易得到安慰，又何必惜一

點筆墨，給多嘗些孤獨的悲哀呢？於是除小說雜感之外，逐漸又有了長長短短的雜文十多篇。其間自然也有為賣錢而作的，這回就都混在一處。我的生命的一部分，就這樣地用去了，也就是做了這樣的工作。然而我至今終於不明白我一向是在做什麼。比方做土工的罷，做着做着，而不明是在築臺呢還在掘坑。所知道的是即使是築臺，也無非要將自己從那上面跌下來或者顯示老死；倘是掘坑，那就當然不過是埋掉自己。總之：逝去 逝去，一切一切，和光陰一同早逝去，在逝去，要逝去了。——不過如此，但也為我所十分甘願的。

記得在先也已說過，還有願使偏愛我的文字的主顧得到一點喜歡；憎惡我的文字的東西得到一點嘔吐，——我自己知道，我並不大度，那些東西因我的文字而嘔吐，我也很高興的。別的就什麼意思也沒有了。倘若硬要說出好處來，那麼，其中所介紹的幾個詩人的事，或者還不妨一看；最末的論費厄潑賴這一篇，也許可供參考罷，因為這雖然不是我的血所寫，却是見了我的同輩和比我年幼的青年們的血而寫的。

偏愛我的作品的讀者，有時批評說，我的文字是說真話的。這實是過譽，那原因就因為他偏愛。我自然不想太欺騙人，但也未嘗將心裏的話照樣說盡，大約只要看得可

以交卷就算完。我的確時時解剖別人，然而更多的是更無情面地解剖我自己，發表一點，酷愛溫暖的人物已經覺得冷酷了，如果全露出我的血肉來，末路正不知要到怎樣。我有時也想就此驅除旁人，到那時還不唾棄我的，即使是鼻蛇鬼怪，也是我的朋友，這纔真是我的朋友。倘使并這個也沒有，則就是我一個人也行，但現在我並不，因為，我還沒有這樣勇敢，那原因就是我還想生活，在這社會裏。還有一種小緣故，先前也曾屢次聲明，就是偏要使所謂正人君子也者之流多不舒服幾天，所以自己便特地留幾片鐵甲在身上，站着 給他們的世界多有一點缺陷，到我自己厭倦了，要脫掉了的時候為止。

我於是就拋了死相，放心說笑起來，而不意立刻又碰了正經人的釘子：說是使他們“失望”了。我自然是知道的，先前是老人們的世界，現在是少年們的世界了；但竟不料治世的人們雖異，而其禁止說笑也則同。那麼，我的死相也還得裝下去，裝下去，“死而後已”，豈不痛哉！

我於是又恨我生得太遲一點。何不早二十年，趕上那大人還准說笑的時候？真是“我生不辰，正當可詛咒的時候 活在可詛咒的地方了。

約翰·彌耳說：專制使人們變成冷嘲。我們却天下太平，連冷嘲也沒有。我想：暴君的專制使人們變成冷嘲，慙

民的專制使人們變成死相；大家漸漸死下去，而自己反以為衛道有效，這纔漸近於正經的活人。

世上如果還有真要活下去的人們，就先該敢說，敢笑，敢哭，敢怒，敢罵，敢打，在這可詛咒的地方擊退了可詛咒的時代！

我自己也知道，在中國，我的筆要算較為尖刻的，說話有時也不留情面。但我又知道人們怎樣地用了公理正義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號，溫良敦厚的假臉，流言公論的武器，吞吐曲折的文字，行私利己，使無刀無筆的弱者不得喘息。倘使我沒有這筆，也就是被欺侮到赴訴無門的一個；我覺悟了，所以要常用，尤其是用於使鸚鵡皮下露出馬脚。萬一那些虛偽者居然覺得一點痛苦，有些省悟，知道技倆也有窮時，少裝些假面目，則用了陳源教授的話來說，就是一個“教訓”。只要誰露出真價值來，即使只值半文，我決不敢輕薄半句。但是，想用了串戲的方法來哄騙，那是不行的；我知道的，不和你們來敷衍。

“惰性表現的形式不一，而最普通的，第一就是聽天任命，第二就是中庸。”我以為這兩種態度的根柢，怕不可僅以惰性了之，其實乃是卑怯。遇見強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這些話來粉飾，聊以自慰，所以中國人倘有權力，

看見別人奈何他不得，或者有“多數”作他護符的時候，多是凶殘橫恣，宛然一個暴君，做事並不中庸；待到滿口“中庸”時，乃是勢力已失，早非“中庸”不可的時候了。一到全敗，則又有“命運”來做話柄，縱為奴隸，也處之泰然，但又無往而不合於聖道。這些現象，實在可以使中國人敗亡，無論有沒有外敵。要救正這些，也只好先行發露各樣的劣點，撕下那好看的假面具來。

大同的世界，怕一時未必到來，即使到來，像中國現在似的民族，也一定在大同的門外。所以我想，無論如何，總要改革纔好。但改革最快的還是火與劍，孫中山奔波一世，而中國還是如此者，最大原因還在他沒有黨軍，因此不能不遷就有武力的別人。近幾年似乎他們也覺悟了，開起軍官學校來，惜已太晚。中國國民性的墮落，我覺得並不是因為顧家，他們也未嘗為“家”設想。最大的病根，是眼光不遠，加以“卑怯”與“貪婪”，但這是歷久養成的，一時不容易去掉。我對於攻打這些病根的工作，倘有可為，現在還不想放手，但即使有效，也恐很遲，我自己看不見了。由我想來——這只是如此感到，說不出理由——目下的壓制和黑暗還要增加，但因此也許可以發生較激烈的反抗與不平的新分子，為將來的新的變動的萌蘗。

說起民元的事來，那時確是光明得多，當時我也在南

京教育部，覺得中國將來很有希望。自然，那時惡劣分子固然也有的，然而他總失敗。一到二年二次革命失敗之後，即漸漸壞下去，壞而又壞，遂成了現在的情形。其實這也不是新添的壞，乃是塗飾的新漆剝落已盡，於是舊相又顯了出來，使奴才主持家政，那里會有好樣子。最初的革命是排滿，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國民改革自己的壞根性，於是就不肯了。所以此後最要緊的是改革國民性，否則，無論是專制，是共和，是什麼什麼，招牌雖換，貨色照舊，全不行的。

我又無拳無勇，真沒有法，在手頭的只有筆墨，能寫這封信一類的不得要領的東西而已。但我總還想對於根深蒂固的所謂舊文明，施行襲擊，令其動搖，冀於將來有萬一之希望。而且留心看看，居然也有幾個不問成敗而要戰鬥的人，雖然意見和我並不盡同，但這是前幾年所沒有遇到的，我所謂“正在準備破壞者目下也彷彿有人”的人不過這麼一回事。要成聯合戰線，還在將來。

希望我做一點什麼事的人，也頗有幾個了，但我自己知道，是不行的。凡做領導的人，一須勇猛，而我看事情太仔細，一仔細，即多疑慮，不易勇往直前；二須不惜用犧牲，而我最不願使別人做犧牲（這其實還是革命以前的種種事情的刺激的結果），也就不能有大局面。所以，其結果，終於不外乎用空論來發牢騷，印一通書籍雜誌。你按即景

宋]如果也要發牢騷，請來幫我們，倘曰“馬前卒”，則吾豈敢，因為我實無馬，坐在人力車上，已經是鬧氣的時候了。

無破壞即無新建設，大致是的；但有破壞却未必即有新建設。盧梭，斯諦納爾，尼采，託爾斯泰，伊孛生等輩，若用勃蘭克斯的話來說，乃是“軌道破壞者”。其實他們不單是破壞，而且是掃除，是大呼猛進，將礙脚的舊軌道不論整條或碎片，一掃而空，並非想挖一塊廢鐵古磚挾回家去，預備賣給舊貨店。中國很少這一類人，即使有之，也會被大眾的唾沫淹死。

瓦礫場上還不足悲，在瓦礫場上修補老例是可悲的。我們要革新的破壞者，因為他內心有理想的光。我們應該知道他和寇盜奴才的分別；應該留心自己墮入後兩種。這區別並不煩難，只要觀人，省己，凡言動中，思想中，含有藉此據為己有的朕兆者是寇盜，含有藉此佔些目前的小便宜的朕兆者是奴才，無論在前面打著的是怎樣鮮明好看的旗子。

人們有自志取捨，和牛羊不同，僕雖不敏，是知道的。然而這“自志”又豈出於本來，還不是很受一時代的學說和別人的言動的影響的麼？那麼，那學說的是否真實，那人的是否適當，就是一個問題，我先前何嘗不出於自願，

在生活的路上，將血一滴一滴地滴過去，以飼別人，雖自覺漸漸瘦弱，也以爲快活。而現在呢，人們笑我瘦弱了，連飲過我的血的人，也來嘲笑我的瘦弱了。我聽得甚至有人說：“他一世過着這樣無聊的生活，本早可以死了的，但還要活着，可見他沒出息。”於是也乘我困苦的時候，竭力給我一下悶棍，然而，這是他們在替社會除去無用的廢物呵！這實在使我憤怒，怨恨了，有時簡直想報復，我並沒有略存求得稱譽，報答之心，不過以爲喝過血的人們，看見沒有血喝了就該走散，不要記着我是血的債主，臨走時還要打殺我；並且爲消滅債券計，放火燒掉我的一間可憐的灰棚。我其實並不以債主自居，也沒有債券。他們的這種辦法，是太過的。我近來的漸漸傾向個人主義，就是爲此；常常想到像我先前那樣以爲“自所甘願，即非犧牲”的人，也就是爲此；常常勸別人要一併顧及自己，也就是爲此，但這是我的意思，至於行爲，和這矛盾的還很多，所以終於是言行不一致。

但是，無論如何，不革新，是生存也爲難的，而況保古。現狀就是鐵證，比保古家的萬言書有力得多。

我們目下的當務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苟有阻礙這前途者，無論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墳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圖，金人玉佛，祖傳丸散，

秘製膏丹，全都踏倒他。

革命者爲達目的，可用任何手段的話，我是以爲不錯的，所以即使因爲我罪孽深重，革命文學的第一步，必須拿我來開刀，我也敢於咬着牙關忍受。殺不掉，我就退進野草裏，自己舐盡了傷口的血痕，決不煩別人傅藥。

尼采式的超人，雖然太覺渺茫，但就世界現有人種的事實看來，却可以確信將來總有尤爲高尚尤近圓滿的人類出現。到那時候，類人猿上面，怕要添出“類猿人”這一個名詞。

所以我時常害怕，願中國青年都擺脫冷氣，只是向上走，不必聽自暴自棄者流的話。能做事的做事，能發聲的發聲。有一分熱，發一分光，就令螢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裏發一點光，不必等候炬火。

此後如竟沒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倘若有了炬火，出了太陽，我們自然心悅誠服的消失，不但毫無不平，而且還要隨喜贊美這炬火或太陽：因爲他照了人類，連我都在內。

更進一步而希望於點火的青年的，是對於羣衆，在引起他們的公憤之餘，還須設法注入深沈的勇氣，當鼓舞他

們的感情時候，還須竭力啓發明白的理性；而且還得偏重於勇氣和理性，從此繼續地訓練許多年。這聲音，自然斷乎不及大叫宣戰殺賊的大而闊，但我以為却是更緊要而更艱難偉大的工作。

我很閑，決不至於連寫字工夫都沒有。但我的不發議論，是很久了，還是去年[一九二六年]夏天決定的，我豫定的沈默期間是兩年。我看得時光不大重要，有時往往將牠當作兒戲。

但現在沈默的原因，却不是先前決定的原因，因為我離開廈門的時候，思想已經有些改變，這種變遷的徑路，說起來太煩，姑且略掉罷，我希望自己將來或者會發表。單就近時而言，則大原因之一，是：我恐怖了。而且這種恐怖，我覺得從來沒有經驗過。

我至今還沒有將這“恐怖”仔細分析。姑且說一兩種我自己已經診察明白的，則：

一，我的一種妄想破滅了。我至今為止，時時有一種樂觀，以為壓迫，殺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這種老人漸漸死去，中國總可比較地有生氣，現在我知道不然了，殺戮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而且對於別個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更無顧惜。如果對於動物，也要算“暴殄天物”。我尤其怕看的是勝利者的得意之筆，“用斧劈死”呀，

……“亂鎗刺死”呀……，我其實並不是急進的改革論者，我沒有反對過死刑。但對於凌遲和滅族，我曾表示過十分的憎惡和悲痛，我以為二十世紀的人羣中是不應該有的。斧劈鎗刺，自然不說是凌遲，但我們不能用一粒子彈打在他後腦上麼？結果是一樣的，對方的死亡。但事實是事實，血的遊戲已經開頭，而角色又是青年，並且有得意之色。我現在已經看不見這齣戲的收場。

二，我發見了自己是一個……。是什麼呢？我一時定不出名目來。我曾經說過：中國歷來是排着喫人的筵宴，有喫的，有被喫的。被喫的也會喫人，正喫的也會被喫，但我現在發見了，我自己也幫助着排筵宴，先生按即寫信給魯迅的有恆先生，你是看我作品的，我現在發一個問題：看了之後，使你麻木，還是使你清楚；使你昏沈，還是使你活潑？倘所覺的是後者，那我的自己裁判，便證實大半了。中國的筵席上有一種“醉蝦”，蝦越鮮活，喫的人便越高興，越暢快。我就是做這醉蝦的幫手，弄清了老實而不幸的青年的腦子和弄敏了他的感覺，使他萬一遭災時來嘗加倍的苦痛，同時給憎惡他的人們賞玩這較靈的苦痛，得到格外的享樂。我有一種設想，以為無論討赤軍，討革軍，倘捕到敵黨的有智識的如學生之類，一定特別加刑，甚於對工人或其他無智識者。為什麼呢，因為他可以看見更銳敏微細的痛苦的表情，得到特別的愉快。倘

我的假設是不錯的，那麼，我的自己裁判，便完全證實了。

所以，我終於覺得無話可說。

倘若再和陳源教授之流開玩笑罷，那是容易的，我昨天就寫了一點。然而無聊，我覺得他們不成什麼問題。他們其實至多也不過喫半隻蝦或呷幾口醉蝦的醋。況且聽說他們已經別離了最佩服的“孤桐先生”，而到青天白日旗下來革命了。我想，只要青天白日旗插遠去，恐怕“孤桐先生”也會來革命的。不成問題了，都革命了，浩浩蕩蕩。

問題倒在我自己的落伍。還有一點小事情。就是，我先前的弄“刀筆”的罰，現在似乎降下來了。種牡丹者得花，種蒺藜者得刺，這是應該的，我毫無怨恨。但不平的是這罰彷彿太重一點，還有悲哀的是帶累了幾個同事和學生。

他們什麼罪孽呢，就因為常常和我往來，並不說我壞。凡如此的，現在就要被稱爲“魯迅黨”或“語絲派”，這是“研究系”和“現代派”宣傳的一個大成功。所以近一年來，魯迅已被“投諸四裔”爲原則了。不說不知道，我在廈門的時候，後來是被搬在一所四無鄰居的大洋樓上了，陪我的都是書，深夜還聽到樓下野獸“唔唔”地叫。但我不怕冷靜的，況且還有學生來談談。然而來了第二下的打擊：三個椅子要搬去兩個，說是什麼先生的少爺已到，要去用了。這時我實在很氣憤，便問他：倘若他的孫少爺也到，我就得坐樓板上麼？不行！沒有搬去，然而來了第三下

的打擊，一個教授微笑道：又發名士脾氣了。廈門的天條，似乎是名士纔能有多於一個的椅子的。“又”者，所以形容我常發名士脾氣也，春秋筆法，先生，你大概明白的罷。還有第四下的打擊，那是我臨走的時候了，有人說我之所以走，一因為沒有酒喝，二，因為看見別人的家眷來了，心裏不舒服。這還是根據那一次的“名士脾氣”的。

這不過隨便想到的一件小事。但，即此一端，你也可以原諒我嚇得不敢開口之情有可原了罷，我知道你是不希望我做醉蝦的。我再鬪下去，也許會“身心交病”。然而“身心交病”，又會被人嘲笑的。自然，這些都不要緊。但我何苦呢，做醉蝦？

不過我這回最微幸的是終於沒有被做成為共產黨。曾經有一位青年，想以獨秀辦新青年而我在那里做過文章這一件事，來證成我是共產黨。但即被別一位青年推翻了，他知道那時連獨秀也還未講共產。退一步，“親共派”罷，終於也沒有弄成功。倘我一出中山大學，即離廣州，我想，是要被排進去的；但我不走，所以報上“逃走了”“到漢口去了”的鬧了一通之後，倒也沒有事了。天下究竟還有光明，沒有人說我有“分身法”。現在是，似乎沒有什麼頭銜了，但據“現代派”說，我是“語絲派的首領”。這和生命大約並無什麼直接關係，或者倒不大要緊的，只要他們沒有第二下。倘如“主角”唐有壬似的又說什麼“墨斯科的

命令”，那可就又有些不妙了。

筆一滑，話說遠了，趕緊回到“落伍”問題去，我想，先生，你大約看見的，我曾經歎息中國沒有敢“撫哭叛徒的弔客”。而今何如？你也看見，在這半年中，我何嘗說過一句話？雖然我曾在講堂上公表過我的意思，雖然我的文章那時也無處發表，雖然我是早已不說話，但這都不足以作我的辯解。總而言之，現在倘再發那些四平八穩的“救救孩子”似的議論，連我自己聽去，也覺得空空洞洞了。

還有，我先前的攻擊社會，其實也是無聊的。社會沒有知道我在攻擊，倘一知道，我早已死無葬身之所了。試一攻擊社會的一分子的陳源之類，看如何？而況四萬萬也哉？我之得以偷生者，因為他們大多數不識字，不知道，並且我的話也無效力，如一箭之入大海。否則，幾條雜感，就可以送命的。民衆的罰惡之心，並不下於學者和軍閥。近來我悟到凡帶一點改革性的主張，倘於社會無涉，纔可以作為“廢話”而存留，萬一見效，提倡者即大概不免喫苦或殺身之禍。古今中外，其揆一也。即如目前的事，吳稚暉先生不也有一種主義的麼？而他不但不被普天同憤，且可以大呼“打倒……嚴辦”者，即因為赤黨要實行共產主義於二十年之後，而他的主義却須數百年之後或者纔行，由此觀之，近於廢話故也。人那有遙管十餘代以後的灰孫子時代的世界的閒情別致也哉！

我並不含有謙虛，我知道我自己，我解剖自己並不比解剖別人留情面，好幾個滿肚子惡意的所謂批評家，竭力搜索，都尋不出我的真症候。

其實呢 我自己省察，無論在小說中，在短評中，並無主張將青年來“殺，殺，殺”的痕迹，也沒有懷着這樣的心思，我一向是相信進化論的，總以為將來必勝於過去，青年必勝於老人，對於青年，我敬重之不暇，往往給我十刀，我只還他一箭。然而後來我明白，我倒是錯了。這並非唯物史觀的理論或革命文藝的作品蠱惑我的，我在廣東，就目覩了同是青年，而分成兩大陣營，或則投書告密，或則助官捕人的事實！我的思路因此轟毀，後來便時常用了懷疑的眼光去看青年，不再無條件的敬畏了。然而此後也還為初初上陣的青年們吶喊幾聲，不過也沒有什麼大幫助。

我有一件事要感謝創造社的，是他們“擠”我看了幾種科學底文藝論，明白了先前的文學史家們說了一大堆，還是糾纏不清的疑問，並且因此譯了一本蒲力汗諾夫的藝術論，以救正我——還因我而及於別人——的只信進化論的偏頗。

我的處世，自以為退讓得儘夠了，人家在報辦，我決

不自行去投稿；人家在開會，我決不自己去演說。硬要我去，自然也可以的，但須任憑我說一點我所要說的話，否則，我甯可一聲不響，算是死屍。但這裡却必須我開口說話，而話又須合於校長之意。我不是別人，那知道別人的意思呢？“先意承志”的妙法，又未曾學過。其被搖頭，實活該也。

但從[一九二六年]以來，我居然大大地變壞，或者是進步了。雖或受着各方面的研刺，似乎已經沒有創傷，或者不再覺得痛楚；即使加我罪案，也並不覺着一點沈重了。這是我經歷了許多舊的和新的世故之後，纔獲得的。我已經管不得許多，只好從退讓到無可退避之地，進而和他們衝突，蔑視他們，並且蔑視他們的蔑視了。

第十三章 創作和我

文藝是國民精神所發的火光，同時也是引導國民精神的前塗的燈火。這是互爲因果的，正如麻油從芝麻榨出，但以浸芝麻，就便牠更油。倘以油爲上，就不必說；否則，當參入別的東西，或水或鹼去。中國人向來因爲不敢正視人生，只好瞞和騙，由此也生出瞞和騙的文藝來，由這文藝，更令中國人更深地陷入瞞和騙的大澤中，甚而至於已經自己不覺得。世界日日改變，我們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誠地，深入地，大膽地看取人生並且寫出他的血和肉來的時候早到了；早就應該有一片嶄新的文場，早就應該有幾個兇猛的鬪將！

現在，氣象似乎一變，到處聽不見歌吟花月的聲音了，代之而起的是鐵和血的贊頌。然而倘以欺瞞的心，用欺瞞的嘴，則無論說A和O，或Y和Z，一樣是虛假的；只可以嚇啞了先前鄙薄花月的所謂批評家的嘴，滿足地以爲中國就要中興。可憐他在‘愛國’的大帽子底下又閉上了眼睛了；——或者本來就閉着。

沒有衝破一切傳統思想和手法的闖將，中國是不會有真的新文藝的。

我何嘗有什麼白刃在前，烈火在後，還是釘住書桌，非寫不可的“創作衝動”；雖然明知道這種衝動是純潔，高尚，可貴的，然而其如沒有何。前幾天早晨，被一個朋友怒視了兩眼，倒覺得臉有點熱，心有點酸，頗近乎有什麼衝動了，但後來被深秋的寒風一吹拂，臉上的溫度便復原，——沒有創作。至於已經印過的那些，那是被擠出來的。這“擠”字是擠牛乳之“擠”；這“擠牛乳”是專來說明“擠”字的，並非故意將我的作品比作牛乳，希冀裝在玻璃瓶裏，送進什麼“藝術之宮”。倘用現在突然流行起來了的論調，將青年的急於發表未熟的作品稱爲“流產”則我的便是“打胎”；或者簡直不是胎，是狸貓充太子。所以一寫完，便完事，管他媽的書賈怎麼偷，文士怎麼說，都不再來提心弔膽。但是，如果有我所相信的人願意看，稱讚好，我終於是歡喜的。後來也集印了，爲的是還想賣幾文錢，老實說。

那麼，我在寫的時候沒有虔敬的心麼？答曰：有罷，即使沒有這種冠冕堂皇的心，也決不故意耍些油腔滑調。被擠着，還能嬉皮笑臉，遊戲三昧麼？倘能，那簡直是神仙了。我並沒有在呂純陽祖師門下投誠過。

但寫出以後，却也不很愛惜羽毛，有所謂“敝帚自珍”的意思，因為，已經說過，其時已經是“便完事，管他媽的”了。

我雖然做過二十來篇短篇小說，但一向沒有“宿見”，正如我雖然會說中國話，卻不會寫中國語法入門一樣。不過高情難却，所以只得將自己所經驗的瑣事寫一點在下面——

一，留心各樣的事情，多看看，不看到一點就寫。

二，寫不出的時候不硬寫。

三，模特兒不用一個一定的人，看得多了，湊合起來的。

四，寫完後至少看兩遍，竭力將可有可無的字、句、段刪去，毫不可惜。寧可將作小說的材料縮成Sketch，決不將Sketch的材料拉成小說。

五，看外國的短篇小說，幾乎全是東歐及北歐作品。也看日本作品。

六，不生造除自己之外，誰也不懂的形容詞之類。

七，不相信小說作法之類的话。

八，不相信中國的所謂“批評家”之類的话，而看看可靠的外國批評家的評論。

現在所能說的，如此而已。

自然，做起小說來，總不免自己有些主見的。例如，說到“爲什麼”做小說罷。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啓蒙主義”，以爲必須是“爲人生”，而且要改良這人生。我深惡先前的稱小說爲“閒書”，而且將“爲藝術的藝術”，看作不過是“消閒”的新式的別號。所以我的取材，多採自病態社會的不幸的人們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所以我力避行文的嘮叨，只要覺得夠將意思傳給別人了，就寧可什麼陪襯拖帶也沒有。中國舊戲上，沒有背景，新年賣給孩子看的花紙上，只有主要的幾個人（但現在的花紙卻多有背景了），我深信對於我的目的，這方法是適宜的，所以我不去描寫風月，對話也決不說到一大篇。

我做完之後，總要看兩遍，自己覺得拗口的，就增刪幾個字，一定要牠讀得順口；沒有相宜的白話，寧可引古語，希望總有人會懂，只有自己懂得或連自己也不懂的生造出來的字句，是不大用的。這一節，許多批評家之中，只有一個人看出來了，但他稱我爲Stylist。

所寫的事迹，大抵有一點見過或聽到過的緣由，但決不全用這事實，只是採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發開去，到足以幾乎完全發表我的意思爲止。人物的模特兒也一樣，沒有專用過一個人，往往嘴在浙江，臉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個拼湊起來的脚色。有人說，我的那一篇是罵誰，

某一篇又是罵誰，那是完全胡說的。

不過這樣的寫法，有一種困難，就是令人難以放下筆。一氣寫下去，這人物就逐漸活動起來，盡了他的任務。但倘有什麼分心的事情來一打岔，放下許久之後再來寫，性格也許就變了樣，情景也會和先前所豫想的不同起來，例如我做的不周山，原意是在描寫性的發動和創造，以至衰亡的，而中途去看報章，見了一位道學的批評家攻擊情詩的文章，心裏很不以為然，於是小說裏就有一個小人物跑到女媧的兩腿之間來，不但不必有，且將結構的宏大毀壞了。但這些處所，除了自己，大概沒有人會覺到的，我們的批評家成仿吾先生，還說這一篇做得最出色。

我想，如果專用一個人做骨幹，就可以沒有這弊病的，但自己沒有試驗過。

忘記是誰說的了，總之是，要極省儉的畫出一個人的特點，最好是畫他的眼睛。我以為這話是極對的，倘若畫了全副的頭髮，即使細得逼真，也毫無意思。我常在學學這一種方法，可惜學不好。

可省的處所，我決不硬添，做不出的時候，我也決不硬做，但這是因為我那時別有收入，不靠賣文為活的緣故，不能作為通例的。

還有一層，是我每當寫作，一律抹殺各種的批評。因為那時中國的創作界固然幼稚，批評界更幼稚，不是舉之

上天，就是按之入地；倘將這些放在眼裏，就要自命不凡，或覺得非自殺不足以謝天下的。批評必須壞處說壞，好處說好，才於作者有益。

但我常看外國的批評文章，因為他於我沒有恩怨嫉恨，雖然所評的是別人的作品，卻很有可以借鏡之處。但自然，我也同時一定留心這批評家的派別。

作者寫出創作來，對於其中的事情，雖然不必親歷過，最好是經歷過。詰難者問：那麼，寫殺人最好是自己殺過人，寫妓女還得去賣淫麼？答曰：不然。我所謂經歷，是所遇，所見，所聞，並不一定是所作。但所作自然也可以包含在裏面。天才們無論怎樣說大話，歸根結蒂，還是不能憑空創造。描神畫鬼，毫無對證，本可以專靠了神思，所謂“天馬行空”似的揮寫了；然而他們寫出來的，也不過是三隻眼，長頸子，就是在常見的人體上，增加了眼睛一隻，增長了頸子二三尺而已。這算什麼本領，這算什麼創造？

文章的看法，也是因人不同的，我因為自己好作短文，好用反語，每遇辯論，輒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迎頭一擊，所以每見和我的辦法不同者便以為缺點。其實暢達也自有暢達的好處，正不必故意減縮（但繁冗則自應刪削），例如玄同之文，即頗汪洋，而少含蓄，使讀者覽之了然，無

所疑惑，故於表白意見，反爲相宜，效力亦復很大，我的東西卻招誤解，有時竟大出於意料之外，可見意在簡練，稍一不慎，即易流於晦澀，而其弊有不可究詰者焉。（“不可究詰”四字頗有語病，但一時想不出適當之字，姑仍之，意但云“其弊頗大”耳。）

那一首詩，意氣也未嘗不盛，但此種猛烈的攻擊，只宜用散文，如“雜感”之類，而造語還須曲折，否，即容易引起反感。詩歌較有永久性，所以不甚合於做這樣的題目。

滬案以後，週刊上常有極鋒利肅殺的詩，其實是沒有意思的，情隨事遷，即味如嚼蠟。我以為感情正烈的時候，不宜做詩，否則鋒鏘太露，能將“詩美”殺掉。

天才並不是自生自長在深林荒野裏的怪物，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長的民衆產生，長育出來的，所以沒有這種民衆，就沒有天才。有一回拿破侖過Alps山，說，“我比Alps山還要高！這何等英偉，然而不要忘記他後面跟着許多兵；倘沒有兵，那只有被山那面的敵人捉住或者趕回，他的舉動，言語，都離了英雄的界綫，要歸入瘋子一類了。所以我想，在要求天才的產生之前，應該先要求可以使天才生長的民衆。——譬如想有喬木，想看好花，一定要有好土；沒有土，便沒有花木了；所以土實在較花木還重要。花

木非有土不可，正同拿破侖非有好兵不可一樣。

然而現在社會上的論調和趨勢，一面固然要求天才，一面却要他滅亡，連預備的土也想掃盡。

大家的要求批評家的出現，也由來已久了，到目下就出了許多批評家。可惜他們之中很有不少是不平家，不像批評家，作品才到面前，便恨恨地磨墨，立刻寫出很高明的結論道，“唉，幼稚得很。中國要天才！”到後來，連並非批評家也這樣叫喊了，他是聽來的。其實即使天才，在生下來時候的第一聲啼哭，也和平常的兒童的一樣，決不會就是一首好詩。因為幼稚，當頭加以戕賊，也可以萎死的。我親見幾個作者，都被他們罵得寒噤了。那些作者大約自然不是天才，然而我的希望是便是常人也留着。

惡意的批評家在嫩苗的地上馳馬，那當然是十分快意的事；然而遭殃的是嫩苗——平常的苗和天才的苗。幼稚對於老成，有如孩子對於老人，決沒有什麼恥辱；作品也一樣，起初幼稚，不算恥辱的。因為倘不遭了戕賊，他就會生長，成熟，老成；獨有老衰和腐敗，倒是無藥可救的事。我以為幼稚的人，或者老大的人，如有幼稚的心，就說幼稚的話，只為自己要說而說，說出之後，至多到印出之後，自己的事就完了，對於無論打着什麼旗子的批評，都可以置之不理的！

我想，作家和批評家的關係，頗有些像廚司和食客。廚司做出一味食品來，食客就要說話，或是好或是歹。廚司如果覺得不公平，可以看看他是否神經病，是否厚舌苔，是否挾夙嫌，是否想賴賬。或者他是否廣東人，想喫蛇肉；是否四川人，還要辣椒。於是提出解說或抗議來——自然，一聲不響也可以。但是，倘若他對着客人大叫道：“那麼，你去做一碗來給我喫喫看！”那却未免有些可笑了。

文藝必須有批評；批評如果不對了，就得用批評來抗爭，這才能夠使文藝和批評一同前進，如果一律掩住嘴，算是文壇已經乾淨，那所得的結果倒是要相反的。

這回的讀書界的趨向社會科學，是一個好的，正當的轉機，不惟有益於別方面，即對於文藝，也可催促牠向正確，前進的路。但在出品的雜亂和旁觀者的冷笑中，是極易凋謝的，所以現在所首先需要的，也還是——

幾個堅實的，明白的，真懂得社會科學及其文藝理論的批評家。

第十四章 翻譯和我

“介紹波蘭詩人”，還在三十年前，始於我的摩羅詩力說。那時滿清幸華，漢民受制，中國境遇頗類波蘭，讀其詩歌，即易於心心相印，不但無事大之意，也不存獻媚之心。

首先就因為偶爾看見了幾篇將近二十年前所做的所謂文章。這是我做的麼？我想。看下去，似乎也確是我做的。那是寄給河南的稿子；因為那編輯先生有一種怪脾氣，文章要長，愈長，稿費便愈多。所以如摩羅詩力說那樣，簡直是生湊。倘在這幾年，大概不至於那麼做了。又喜歡做怪句子和寫古字，這是受了當時的民報的影響。這樣生澀的東西，倘是別人的，我恐怕不免要勸他“割愛”，但自己却總還想將這存留下來，而且也並不“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愈老就愈進步。其中所說的幾個詩人，至今沒有人再提起，也是使我不忍拋棄舊稿的一個小原因。他們的名，先前是怎樣地使我激昂呵，民國告成以後，我便將他們忘却了，而不料現在他們竟又時時在我的眼前出現。

有人說G. Byron 的詩多為青年所愛讀，我覺得這話很有幾分真，就自己而論，也還記得怎樣讀了他的詩而心神俱旺；尤其是看見他那花布裹頭，去助希臘獨立時候的肖像。

時當清的末年，在一部分中國青年的心中，革命思潮正盛，凡有叫喊復讐和反抗的，便容易惹起感應。那時我所記得的人，還有波蘭的復讐詩人Adam Mickiewicz；匈牙利的愛國詩人Petöfi Sandor；飛獵濱的文人而為西班牙政府所殺的釐沙路，他的祖父還是中國人，中國也曾譯過他的絕命詩，Hauptmann, Sudermann, Ibsen這些人雖然正負盛名，我們却不大注意。別有一部分人，則專意搜集明末遺民的著作，滿人殘暴的記錄，鑽在東京或其他的圖書館裏，抄寫出來，印了，輸入中國，希望使忘却的舊恨復活，助革命成功，於是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記略，朱舜水集，張蒼水集都翻印了，還有黃蕭養回頭及其他單篇的匯集，我現在已經舉不出那些名目來。別有一部分人，則改名“撲滿”“打清”之類，算是英雄。這些大號，自然和實際的革命不甚相關，但也可見那時對於光復的渴望之心，是怎樣的旺盛。

不獨英雄式的名號而已，便是悲壯淋漓的詩文，也不過是紙片上的東西，於後來的武昌起義怕沒有什麼大關

係。倘說影響，則別的千言萬語，大概都抵不過淺近直截的“革命軍馬前卒鄒容”所做的革命軍。

待到革命起來，就大體而言，復讎思想可是減退了。我想，這大半是因為大家已經抱着成功的希望，又服了“文明”的藥，想給漢人掙一點面子，所以不再有殘酷的報復。但那時的所謂文明，却確是洋文明，並不是國粹；所謂共和，也是美國法國式的共和，不是周召共和的共和。革命黨人也大概竭力想給本族增光，所以兵隊倒不大搶掠。南京的土匪兵小有劫掠，黃興先生便勃然大怒，槍斃了許多，後來因為知道土匪是不怕槍斃而怕梟首的，就從死屍上割下頭來，草繩絡住了掛在樹上。從此也不再有什麼變故了，雖然我所住的一個機關的衛兵，當我外出時舉鎗立正之後，就從窗門洞爬進去取了我的衣服，但究竟手段已經平和得多，也客氣得多了。

南京是革命政府所在地，當然格外文明。但我去一看先前的滿人的駐在處，却是一片瓦礫；只有方孝孺血迹石的亭子總算還在。這裏本是明的故宮，我做學生時騎馬經過，曾很被頑童罵詈和投石，——猶言你們不配這樣；聽說向來是如此的。現在却面目全非了，居民寥寥；即使偶有幾間破屋，也無門窗；若有門，則是爛洋鐵做的。總之，是毫無一點木料。

那麼，城破之時，漢人大大的發揮了復讎手段了麼？並不然。知道情形的人告訴我：戰爭時候自然有些損壞；革命軍一進城，旗人中間便有些人定要按古法殉難，在明的冷宮的遺址的屋子裏使火藥炸裂，以炸殺自己，恰巧一同炸死了幾個適從近旁經過的騎兵。革命軍以為埋藏地雷反抗了，便燒了一回，可是殘餘的房子還不少。此後是他們自己動手，拆屋材出賣，先拆自己的，次拆較多的別人的，待到屋無尺材寸椽，這纔大家流散，還給我們一片瓦礫場。——但這是我耳聞的，保不定可是真話。

看到這樣的情形，即使你將揚州十日記掛在眼前，也不至於怎樣憤怒了罷。據我感得，民國成立以後，漢滿的惡感彷彿很是消除了，各省的界限也比先前更其輕淡了。然而“罪孽深重不自殞滅”的中國人，不到一年，情形便又逆轉：有宗社黨的活動和遺老的謬舉，而兩族的舊史又令人憶起，有袁世凱的手段，而南北的交惡加甚，有陰謀家的狡計，而省界又被利用，並且此後還要增長起來！

當愛羅先珂君在日本未被驅逐之前，我並不知道他的姓名。直到已被放逐，這纔看起他的作品來；所以知道那迫辱放逐的情形的，是由於登在讀賣新聞上的一篇江口渙氏的文字。於是將這譯出，還譯他的童話，還譯他的劇本桃色的雲。其實，我當時的意思，不過要傳播被虐待

者的苦痛的呼聲和激發國人對於強權者的憎惡和憤怒而已，並不是從什麼“藝術之宮”裏伸出手來，拔了海外的奇花瑤草，來移植在華國的藝苑。

歐洲大混戰開始了，後來我們中國也參加戰爭，就是所謂“對德宣戰”；派了許多工人到歐洲去幫忙；以後就打勝了，就是所謂“公理戰勝”。中國自然也要分得戰利品，——有一種是在上海的德國商人的俱樂部裏的德文書，總數很不少，文學居多，都搬來放在午門的門樓上。教育部得到這些書，便要整理一下，分類一下，其實是他們本來分類好了的，然而有些人以為分得不好，所以要從新分一下。——當時派了許多人，我也是其中的一個。後來，總長要看看那些書是什麼書了。怎樣看法呢？叫我們用中文將書名譯出來，有義譯義，無義譯音，該撒呀，克來阿派忒拉呀，大馬色呀……。每人每月有十塊錢的車費，我也拿了百來塊錢，因為那時還有一點所謂行政費。這樣的幾里古魯了一年多，花了幾千塊錢，對德和約成立了，後來德國來取還，便仍由點收的我們全盤交付——也許少了幾本罷。至於“克來阿派忒拉”之類，總長看了沒有，我可不得而知了。

據我所知道的說，“對德宣戰”的結果，在中國有一座中國公園裏的“公理戰勝”的牌坊，在我就只有一篇這工

人綏惠略夫的譯本，因為那底本，就是從那時整理着的德文書裏挑出來的。

那一堆書裏文學書多得很，為什麼那時偏要挑中這一篇呢？那意思，我現在有點記不真切了。大概，覺得民國以前，以後，我們也有許多改革者，境遇和綏惠略夫很相像，所以借借他人的酒杯罷。然而昨晚上一看，豈但那時，譬如其中的改革者的被迫，代表的喫苦，便是現在，——便是將來，便是幾十年以後，我想，還要有許多改革者的境遇和他相像的。所以我打算將牠重印一下……。

我們的文化落後，無可諱言，創作力當然也不及洋鬼子，作品的比較的薄弱，是勢所必至的，而且又不能不時時取法於外國。所以翻譯和創作，應該一同提倡，決不可壓抑了一面，使創作成為一時的驕子，反因容縱而脆弱起來。

注重翻譯，以作借鏡，其實也就是催進和鼓勵着創作。

但我想，我們的譯書，還不能這樣簡單，首先要決定譯給大衆中的怎樣的讀者。將這些大衆，粗粗的分起來：甲，有很受了教育的；乙，有略能識字的；丙，有識字無幾的。而其中的丙，則在“讀者”的範圍之外，啓發他們是

圖畫，講演，戲劇，電影的任務，在這裏可以不論。但就是甲乙兩種，也不能用同樣的書籍，應該各有供給閱讀的相當的書。供給乙的，還不能用翻譯，至少是改作，最好還是創作，而這創作又必須並不只在配合讀者的胃口，討好了，讀的多就夠。至於供給甲類的讀者的譯本，無論什麼，我是至今主張“寧信而不順”的。自然，這所謂“不順”，決不是說“跪下”要譯作“跪在膝之上”，“天河”要譯作“牛奶路”的意思，乃是說，不妨不像喫茶淘飯一樣幾口可以嚙完，却必須費牙來嚼一嚼。這裏就來了一個問題：爲什麼不完全中國化，給讀者省些力氣呢？這樣費解，怎樣還可以稱爲翻譯呢？我的答案是：這也是譯本。這樣的譯本，不但在輸入新的內容，也在輸入新的表現法。中國的文或話，法子實在太不精密了，作文的祕訣，是在避去熟字，刪掉虛字，就是好文章，講話的時候，也時時要辭不達意，這就是話不夠用，所以教員講書，也必須借助於粉筆。這語法的不精密，就在證明思路的不精密，換一句話，就是腦筋有些糊塗。倘若永遠用着糊塗話，即使讀的時候，滔滔而下，但歸根結蒂，所得的還是一個糊塗的影子。要醫這病，我以爲只好陸續喫一點苦，裝進異樣的句法去，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國的，後來便可以據爲己有。這並不是空想的事情。遠的例子，如日本，他們的文章裏，歐化的語法是極平常的了，和梁啓超做和文漢讀法時代，大不相同；

近的例子，就如來信所說，一九二五年曾給羣衆造出過“罷工”這一個字眼，這字眼，雖然未曾有過，然而大衆已都懂得了。

我還以為即使爲乙類讀者而譯的書，也應該時常加些新的字眼；新的語法在裏面，但自然不宜太多，以偶爾遇見，而想想，或問一問就能懂得爲度。必須這樣，羣衆的言語才能夠豐富起來。

說到翻譯文藝，倘以甲類讀者爲對象，我是也主張直譯的，我自己的譯法，是譬如“山背後太陽落下去了”，雖然不順，也決不改作“日落山陰”，因爲原意以山爲主，改了就變成太陽爲主了。雖然創作，我以為作者也得加以這樣的區別。一面儘量的輸入，一面儘量的消化，吸收，可用的傳下去了，渣滓就聽他剩落在過去裏。所以在現在容忍“多少的不順”，倒並不能算“防守”，其實也還是一種的“進攻”。在現在民衆口頭上的話，那不錯，都是“順”的，但爲民衆口頭上的話搜集來的話胚，其實也還是要順的，因此我也是主張容忍“不順”的一個。

但這情形也當然不是永遠的，其中的一部份，將從“不順”而成爲“順”，有一部份，則因爲到底“不順”而被淘汰，被踢開。這最要緊的是我們自己的批判。

我想，還是請批評家用爛喫蘋果的方法，來救一救急罷。

我們先前的批評法，是說，這蘋果有爛疤了，要不得，一下子拋掉。然而買者的金錢有限，豈不是大冤枉，而況此後還要窮下去。所以，此後似乎最好還是添幾句，倘不是穿心爛，就說：這蘋果有着爛疤了，然而這幾處沒有爛，還可以喫得。這麼一辦，譯品的好壞是明白了，而讀者的損失也可以小一點。

我是主張青年也可以看看“帝國主義者”的作品的，這就是古語的所謂“知己知彼”。青年爲了要看虎狼，赤手空拳的跑到深山裏去固然是馱子，但因為虎狼可怕，連用鐵柵圍起來了的動物園裏也不敢去，却也不能不說是一位可笑的愚人。有害的文學的鐵柵是什麼呢？批評家就是。

自然，我們看書，倘看反對的東西，總不如看同派的東西的舒服，爽快，有益。但倘是一個戰鬥者，我以為，在了解革命和敵人上，倒是必須更多的去解剖當面的敵人的。要寫文學作品也一樣，不但應該知道革命的實際，也必須深知敵人的情形，現在的各方面的狀況，再去斷定革

命的前途 惟有明白舊的，看到新的，了解過去，推斷將來，我們的文學的發展才有希望。

第十五章 革命文學的前線

家裏一切也如舊；母親精神容貌仍如三年前，但關心的範圍好像減了不少，談的都是鄰近的瑣事，和我毫不相干的。以前似乎常常有客來往，久至三四個月，連我的日記本子也都翻過了，這很討厭，大約是姓車的男人所爲，莫非他以爲我一定死在外面，不再回家了麼？

不過這種情形，我倒並不氣惱，自然也不喜歡；久說必須回家一趟，現在是回來了，了却一件事，總是好的。

關於咱們的事〔指與景宋的戀愛事〕，聞南北統一後，此地忽然盛傳，研究者也頗多，但大抵知不確切。我想，這忽然盛傳的緣故，大約與小鹿之由滬入京有關的。前日到家，母親即問我害馬爲什麼不一同回來，我正在付車錢，匆忙中即答以有些不舒服，昨天纔告訴牠火車震動，不宜於孩子的事，牠很高興，說，我想也應該有了，因爲這屋子裏早應該有小孩子走來走去了。這種“應該”的理由，雖然和我們的意見很不同，但總之她非常高興。

母親的記憶力壞了些了，觀察力注意力也略減，有些

脾氣頗近於小孩子了。對於我們的感情是很好的。也希望老三〔即建人〕回來，但其實是毫無事情。

我到北平，已一星期，其間無非是喫飯，睡覺，訪人，陪客，此外什麼也不做。文章是沒有一句。昨天訪了幾個教育部舊同事，都窮透了，沒有事做，又不能回家。〔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二夜〕和張鳳舉談了兩點鐘天，傍晚往燕京大學講演了一點鐘，照例說些成仿吾徐志摩之類，聽的人頗不少——不過也不是都爲了來聽講演的。這天有一個人對我說：燕大是有錢而請不到好教員，你可以來此教書了。我即答以我奔波了幾年，已經心粗氣浮，不能教書了。D.H.〔即景宋〕，我想，這些好地方，還是請他們紳士們去佔有罷，咱們還是漂流幾時的好。

寄到一本紅玫瑰，陳西滢和凌叔華的照片都登上了。胡適之的詩載於禮拜六，他們的像見於紅玫瑰，時光老人的力量，真能逐漸的顯出“物以類聚”的真實。

將來又想往西山看看漱園，聽他朋友的口氣，恐怕總是醫不好的了。章叢蕪卻長大了一點，待廿九日往北大講演後，便當作回滬之準備。

我這次回來，正值暑假將近，所以很有幾處想送我飯碗，但我對於此種地位，總是毫無興趣。爲安閒計，住北平

是不壞的，但因為和南方太不同了，所以幾乎有“世外桃源”之感。我來此雖已十天，卻毫不感到什麼刺戟，略不小心，確有“落伍”之懼的。上海雖煩擾，但也別有生氣。

計我回北平以來，已兩星期，除應酬之外，讀書作文一點也不做，且也做不出來。那間灰棚，一切如舊，而略略增其蕭瑟，深夜獨坐，時覺過於森森然。幸而來此已兩星期，距回滬之期漸近了。新租的屋，已說明為堆什物及住客之用，客廳之書不動，也不住人。

我是[五月卅日]早晨八點點鐘上山的，用的是摩托車 霽野等四人同去。漱園還不准起坐，因日光浴，曬得很黑，也很瘦，但精神卻好，他很喜歡，談了許多閒天。病室壁上掛着一幅陀斯妥夫斯基的畫像，我有時瞥見這用筆墨使讀者受精神上的苦刑的名人的苦臉，便彷彿記得有人說過，漱園原有一個愛人，因為他沒有全愈的希望，已與別人結婚；接着又感到他將終於死去——這是中國的一個損失——便覺得心臟一縮，暫時說不出話，然而也只得立刻裝出歡笑，除了這幾剎那之外，我們這回的聚談是很愉快的。

他也問些關於我們的[戀愛的]事，我說了一個大略。他所聽到的似乎還有許多謠言，但不願談，我也不加追問，因為我推想得到，這一定是幾位教授所流布，實不過

怕我去搶飯碗而已。然而我流宕三年了，並沒有餓死，何至於忽而去搶飯碗呢，這些地方，我覺得他們實在比我小氣。

[五月卅一日]晚上來了兩個人，一個是忙於翻檢電碼之靜農，一個是幫我校過唐宋傳奇集之建功，同喫晚飯，談得很爲暢快，和上午之縱談於西山，都是近來快事。他們對於北平學界現狀，似俱不欲多言，我也竭力的避開這題目。其實，這是我到此不久，便已感覺了出來的：南北統一後，“正人君子”們樹倒猢猻散，離開北平。而他們的衣飯却沒有帶走，被先前和他們戰鬥的有些人拾去了。未改其原來面目者，據我所見，殆惟幼漁兼士而已。由是又悟到我以前之和“正人君子”們爲敵，也失之不通世故，過於認真，所以現在倒非常自在，於衰衰諸公之一切言動，全都漠然。即下午之訶斥春非，事後思之，也覺得大可不必。因歎在寂寞之世界裏，雖欲得一可以對壘之真敵人，亦不易也。

我自從到此以後，總計各種感受，知道瀰漫於這裏的，依然是“敬而遠之”和傾陷，甚至於比“正人君子”時代還要分明——但有些學生和朋友自然除外，再想上去，則我的創作和編著一發表，總有一羣攻擊或嘲笑的人們，那當然是應該的。如果我的作品真如所說的庸陋。然而一看

他們的作品，却比我的還要壞；例如小說史罷，好幾種出在我的那一本之後，而凌亂錯誤，更不行了。這種情形，即使我大膽闊步，小覷此輩，然而也使我不復專於一業，一事無成。而且又使你常常擔心，“眼淚往肚子裏流”。所以我也對於自己的壞脾氣，時時痛心，想竭力的改正一下。我想，應該一聲不響，來編中國字體變遷史或中國文學史了。然而那里去呢？在上海，創造社中人一面宣傳我怎樣有錢，喝酒，一面又用“東京通信”誣栽我有殺戮青年的主張，這簡直是要謀害我的生命，住不得了。北京本來還可住，圖書館裏的舊書也還多，但因歷史關係，有些人必有奉送飯碗之舉，而在別一些人即懷來搶飯碗之疑，在瓜田中，可以不納履，而要使人信為永不納履是難的，除非你趕緊走遠。D. H. [即景宋]，你看，我們到那里去呢？我們還是隱姓埋名，到什麼小村裏去，一聲也不響，大家玩玩罷。

但粗粗一想，恐怕這“雜感”兩個字，就使志趣高超的作者厭惡，避之惟恐不遠了。有些人們，每當意在奚落我的時候，就往往稱我為“雜感家”，以顯出在高等文人的眼中的鄙視，便是一個證據。還有，我想，有名的作家雖然未必不改換姓名，寫過這一類文字，但或者不過圖報私怨，再提怨或玷其令名，或者別有深心，揭穿反有妨於戰鬥，

因此就大抵任其消滅了。

“雜感”之於我，有些人固然看作“死症”，我自己確也因此很喫過一點苦，但編集是還想編集的。

我先編集一九二八至二九年的文字，篇數少得很，但除了五六回在北平上海的講演，原就沒有記錄外，別的也彷彿並無散失。我記得起來了，這兩年正是我極少寫稿，沒處投稿的時期，我是在二七年被血嚇得目瞪口呆，離開廣東的，那些吞吞吐吐，沒有膽子直說的話，都載在而已集裏。但我到了上海，却遇見文豪們的筆尖的圍剿了，創造社，太陽社，“正人君子”們的新月社中人，都說我不好，連並不標榜文派的現在多昇為作家或教授的先生們，那時的文字裏，也得時常暗暗地奚落我幾句，以表示他們的高明。我當初還不過是“有閒即是有錢”，“封建餘孽”或“沒落者”，後來竟被判為主張殺青年的棒喝主義者了。這時候，有一個從廣東自云避禍逃來，而寄住在我的寓裏的廖君，也終於忿忿的對我說道：“我的朋友都看不起我，不和我來往了，說我和這樣的人住在一處。”

那時候，我是成了“這樣的人”的。自己編着的語絲，實乃無權，不單是有所顧忌，至於別處，則我的文章一向是被“擠”纔有的，而目下正在“剿”，我投進去幹什麼呢？所以只寫了很少的一點東西。

當三〇年的時候，期刊已漸漸的少見，有些是不能按期出版了，大約是受了逐日加緊的壓迫。語絲和奔流，則常遭郵局的扣留，地方的禁止，到底也還是敷衍不下去。那時我能投稿的，就只剩了一個萌芽。而出到五期，也被禁止了，接着是出了一本新地。所以在這一年內，我只做了收在〔二心〕集內的不到十篇的短評。

此外還曾經在學校裏演講過兩三回，那時無人記錄，講了些什麼，此刻連自己也記不清楚了。只記得在有一個大學裏演講的題目，是象牙塔和蝸牛廬。大意是說，象牙塔裏的文藝，將來決不會出現於中國，因為環境並不相同，這裡是連擺這“象牙之塔”的處所也已經沒有了；不久可以出現的，恐怕至多只有幾個“蝸牛廬”。蝸牛廬者，是三國時所謂“隱逸”的焦先曾經居住的那樣的草窠，大約和現在江北窮人手搭的草棚相仿，不過還要小，光光的伏在那裏面，少出，少動，無衣，無食，無言。因為那時是軍閥混戰，任意殺掠的時候，心裏不以為然的人，只有這樣纔可以苟延他的殘喘。但蝸牛界裏那里會有文藝呢，所以這樣下去，中國的沒有文藝，是一定的。這樣的話，真可謂已經大有蝸牛氣味的了，不料不久就有一位勇敢的青年在政府機關的上海民國日報上給我批評，說我的那些話使他非常看不起，因為我沒有敢講共產黨的話的勇氣。謹案在“清黨”以後的黨國裏 講共產主義是算犯大罪的，

捕殺的網羅，張遍了全中國，而不講，却又爲黨國的忠勇青年所鄙視。這實在只好變了真的蝸牛，纔有“庶幾得免於罪戾”的幸福了。

而這時左翼作家拿着蘇聯的盧布之說，在所謂“大報”和小報上，一面又紛紛的宣傳起來，新月社的批評家也從旁很賣了些力氣。有些報紙，還拾了先前的創造社派的幾個人的投稿於小報上的話，譏笑我爲“投降”，有一種報則載起文壇貳臣傳來，第一個就是我，——但後來好像並不再做下去了。

一階級裏，臨末也常常會自己互相鬧起來的，就是詩經裏說過的那“兄弟鬩於牆”，——但後來却未必“外禦其侮”。倒如同是軍閥，就總在整年的大家相打，難道有一面是無產階級麼？而且我時時說些自己的事情，怎樣地在“碰壁”，怎樣地在做蝸牛，好像全世界的苦惱，萃於一身，在替大眾受罪似的：也正是中產的智識階級分子的壞脾氣。只是原先是憎惡這熟識的本階級，毫不可惜牠的潰滅，後來又由於事實的教訓，以爲惟新興的無產者纔有將來，却是的確的。

自從一九三一年二月起，我寫了較上年更多的文章，但因為揭載的刊物有些不同，文字必得和牠們相稱，就很少做熱風那樣簡短的東西了；而且看看對於我的批評

文字，得了一種經驗，好像評論做得太簡括，是極容易招得無意的誤解，或有意的曲解似的。

到了[一九二九年]，“革命文學”這名目這纔旺盛起來了，主張的是從“革命策源地”回來的幾個創造社元老和若干新份子。革命文學之所以旺盛起來，自然是因為由於社會的背景，一般羣衆，青年有了這樣的要求。當從廣東開始北伐的時候，一般積極的青年都跑到實際工作去了，那時還沒有什麼顯著的革命文學運動，到了政治環境突然改變，革命遭了挫折，階級的分化非常顯明，國民黨以“清黨”之名，大戮共產黨及革命羣衆，而死剩的青年們再入於被迫壓的境遇，於是革命文學在上海這才有了強烈的活動。所以這革命文學的旺盛起來，在表面上和別國不同，並非由於革命的高揚，而是因為革命的挫折；雖然其中也有些是舊文人解下指揮刀來重理筆墨的舊業，有些是幾個青年被從實際工作排出，只好藉此謀生，但因為實在具有社會的基礎，所以在新份子裏，是很有極堅實正確的人存在的。但那時的革命文學運動，據我的意見，是未經好好的計畫，很有些錯誤之處的。

[一九三〇年]三月二日左翼作家聯盟在上海的成立是一件重要的事實。

現在，我說一說我們今後應注意的幾點。

第一，對於舊社會和舊勢力的鬭爭，必須堅決，持久不斷，而且注重實力。舊社會的根柢原是非常堅固的，新運動非有更大的力不能動搖牠什麼。並且舊社會還有牠使新勢力妥協的好辦法，但牠自己是決不妥協的，在中國也有過許多新的運動了，却每次都是新的敵不過舊的，那原因大抵是在新的一面沒有堅決的廣大的目的，要求很小，容易滿足。譬如白話文運動，當初舊社會是死力抵抗的，但不久便容許白話文底存在，給牠一點可憐地位，在報紙的角頭等地方可以看見用白話寫的文章了，這是因為在舊社會看來，新的東西並沒有什麼，並不可怕，所以就讓牠存在，而新的一面也就滿足，以為白話文已得到存在權了。又如一二年來的無產文學運動，也差不多一樣，舊社會也容許無產文學，因為無產文學並不厲害，反而他們也來弄無產文學，拿去做裝飾，彷彿在客廳裏放着許多古董磁器以外，放一個工人用的粗碗，也很別緻；而無產文學者呢，他已經在文壇上有個小地位，稿子已經賣得出去了，不必再鬭爭，批評家也唱着凱旋歌：“無產文學勝利！”但除了個人的勝利，即以無產文學而論，究竟勝利了多少？況且無產文學，是無產階級解放鬭爭底一翼，牠跟着無產階級的社會的勢力的成長而成長，在無產階級的社會地位很低的時候，無產文學的文壇地位反而很高，這只是證明無產文學者離開了無產階級，回到舊社會去罷

了。

第二，我以為戰線應該擴大。在前年和去年，文學上的戰爭是有的，但那範圍實在太小，一切舊文學舊思想都不為新派的人所注意，反而弄成了在一角裏新文學者和新文學者的鬭爭，舊派的人倒能夠閑舒地在旁邊觀戰。

第三，我們應當造出大羣的新的戰士，因為現在人手實在太少了，譬如我們有好幾種雜誌，單行本的書也出版得不少，但做文章的總同是這幾個人，所以內容就不能不單薄。一個人做事不專，這樣弄一點，那樣弄一點，既要翻譯，又要做小說，還要做批評，並且也要做詩，這怎麼弄得好呢？這都因為人太少的緣故。如果人多了，則翻譯的可以專翻譯，創作的可以專創作，批評的專批評；對敵人應戰，也軍勢雄厚，容易克服。關於這點，我可帶便地說一件事。前年創造社和太陽社向我進攻的時候，那力量實在單薄，到後來連我都覺得有點無聊，沒有意思反攻了，因為我後來看出了敵軍在演“空城計”。那時候我的敵軍是專事於吹播，不務於招兵練將的；攻擊我的文章當然很多，然而一看就知道都是化名，罵來罵去都是同樣的幾句話。我那時就等待有一個能操馬克思主義批評的槍法的人來狙擊我的，然而他終於沒有出現。在我倒是一向就注意新的青年戰士底養成的，曾經弄過好幾個文學團體，不過效果也很小。但我們今後却必須注意這點。

我們急於要造出大羣的新的戰士，但同時，在文學戰線上的人還要“韜”。所謂韜，就是不要像前清做八股文的“敲門磚”似的辦法。前清的八股文，原是“進學”做官的工具，只要能做“起承轉合”，藉以進了“秀才舉人”，便可丟掉八股文，一生中再也用不到牠了，所以叫做“敲門磚”，猶之用一塊磚敲門，門一敲進，磚就可拋棄了，不必再將牠帶在身邊。這種辦法，直到現在，也還有許多人在使用，我們常常看見有些人出了一二本詩集或小說集以後，他們便永遠不見了，到那里去了呢？是因爲出了一本或二本書，有了一點小名或大名，得到了教授或別的什麼位置，功成名遂，不必再寫詩寫小說了，所以永遠不見了，這樣，所以在中國無論文學或科學都沒有東西，然而在我們是要有東西的，因爲這於我們有用。（盧那卡爾斯基是甚至主張保存俄國的農民美術，因爲可以造出來賣給外國人，在經濟上有幫助。我以為如果我們文學或科學上有東西拿得出去給別人，則甚至於脫離帝國主義的壓迫的政治運動上也有幫助）。但要在文化上有成績，則非韜不可。

最後，我以為聯合戰線是以有共同目的爲必要條件的。我記得好像曾聽到過這樣一句話：“反動派且已經有聯合戰線了，而我們還沒有團結起來！”其實他們也並未有有意的聯合戰線，只因爲他們的目的相同，所以行動就一致，在我們看來就好像聯合戰線。而我們戰線不能統

一，就證明我們的目的不能一致，或者只爲了小團體，或者還其實只爲了個人，如果目的都在工農大眾，那當然戰線也就統一了。

國民黨清黨的時候，我在廣州，常聽到因爲捕甲，從甲這里看見乙的信，於是捕乙，又從乙家搜得丙的信，於是連丙也捕去了，都不知道下落。古時候有牽牽連連的“瓜蔓抄”。我是知道的，但總以爲這是古時候的事，直到事實給了我教訓，我纔分明省悟了做今人和做古人也一樣難。然而我還是漫不經心，隨隨便便。

待到一九三〇年我簽名於自由大同盟，浙江省黨部呈請中央通緝“墮落文人魯迅等”的時候，我在棄家出走之前，忽然心血來潮，將朋友給我的信，都毀掉了。這並非爲了消滅“謀爲不軌”的痕迹，不過以爲是因通信而累及別人，是很無謂的，況且中國的衙門是誰都知道只要一碰着，就有多麼的可怕。後來逃過了這一關，搬了窩，而信札又積起來，我又隨隨便便了。不料一九三一年一月，柔石被捕，在他衣袋裏搜出有我名字的東西來，因此聽說就在找我。自然囉，我只得又棄家出走，但這回是心血來潮得更加明白，當然先將所有信札完全燒掉了。

第十六章 朋友們的死

有人批評過我說，只要看魯迅至今還活着，就足見不是一個什麼好人。這是真的，自民元革命以至現在，好人真不知道被害死了多少了，不過誰也沒有記一篇准眼。這事實又教壞了我，因為我知道即使死掉，也不過給他們大賣消息，大造謠言，說我的被殺，其實是爲了金錢或女人關係。所以，名列於該殺之林則可，懸梁服毒，是不來的。

我最初看見守常先生的時候，是在獨秀先生邀去商量怎樣進行新青年的集會上，這樣就算認識了。不知道他其時是否已是共產主義者，總之，給我的印象是很好的：誠實，謙和；不多說話。新青年的同人中，雖然也很有喜歡明爭暗鬪，扶植自己勢力的人，但他一直到後來，絕對的不是。

他的模樣是頗難形容的，有些儒雅，有些樸質，也有些凡俗。所以既像文士，也像官吏，又有些像商人。這樣的商人，我在南邊沒有看見過，北京卻有的，是舊書店或箋紙店的掌櫃。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段祺瑞們鎗擊徒手

請願的學生的那一次，他也在羣衆中，給一個兵抓住了，問他是何等樣人。答說是“做賣買的”。兵道：“那麼，到這里來幹什麼？滾你的罷！”一推，他總算逃得了性命。

倘說教員，那時是可以死掉的。

然而到第二年，他終於被張作霖們害死了。

一九三一年的二月七日夜或八日晨，是我們的五個青年作家同時遇害的時候。當時上海的報章都不敢載這件事，或者也許是不願，或不屑載這件事，只在文藝新聞上有一點隱約其辭的文章。

我和柔石最初的相見，不知道是何時，在那里。他彷彿說過，曾在北京聽過我的講義，那麼，當在八九年之前了。我也忘記了在上海怎麼來往起來，總之，他那時住在景雲里，離我的寓所不過四五家門面，不知怎麼一來，就來往起來了。

他躲在寓裏弄文學，也創作，也翻譯，我們往來了許多日，說得投合起來了，於是另外約定了幾個同意的青年，設立“朝華社”。目的是在介紹東歐和北歐的文學，輸入外國的版畫，因為我們都以為應該來扶植一點剛健質樸的文藝。接着就印朝花旬刊，印近代世界短篇小說集，印藝苑朝華，算都在循着這條線，只有其中的一本蔭谷虹兒畫選，是爲了掃蕩上海灘上的“藝術家”，即戳穿葉靈鳳

這紙老虎而印的。

明日書店要出一種期刊，請柔石去做編輯，他答應了；書店還想印我的譯著，託他來問版稅的辦法，我便將我和北新書局所訂的合同，抄了一份交給他，他向衣袋裏一塞，忽忽的走了。其時是一九三一年一月十六日的夜間，而不料這一去，竟就是我和他相見的末一回，竟就是我們的永訣。

第二天，他就在一個會場上被捕了，衣袋裏還藏着我那印書的合同，聽說官廳因此正在找尋我。印書的合同，是明明白白的，但我不願意到那些不明不白的地方去辯解。記得說岳全傳裏講過一個高僧，當追捕的差役剛到寺門之前，他就“坐化”了，還留下什麼“何立從東來，我向西方走”的偈子。這是奴隸所幻想的脫離苦海的惟一的好方法，“劍俠”盼不到，最自在的惟此而已。我不是高僧，沒有涅槃的自由，却還有生之留戀，我於是就逃走。

這一夜，我燒掉了朋友們的舊信札，就和女人抱着孩子走在一個客棧裏。不幾天，即聽外面紛紛傳我被捕 或是被殺了，柔石的消息却很少。有的說，他曾經被巡捕帶到明日書店裏，問是否是編輯；有的說，他曾經被巡捕帶往北新書局去，問是否是柔石，手上上了鐐，可見案情是重的。但怎樣的案情，却誰也不明白。

天氣愈冷了，我不知道柔石在那里有被褥不？我們是

有的洋鐵碗可曾收到了沒有？……但忽然得到一個可靠的消息，說柔石和其他二十三人，已於二月七日夜或八日晨，在龍華警備司令部被鎗斃了，他的身上中了十彈。

原來如此！……

在一個深夜裏，我站在客棧的院子中，周圍是堆着的破爛的什物；人們都睡覺了，連我的女人和孩子。我沈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國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憤中沈靜下去了，然而積習却從沈靜中抬起頭來，湊成了這樣的幾句：

“慣於長夜過春時，挈婦將雛鬢有絲。夢裏依稀慈母淚，城頭變幻大王旗。忍看朋輩成新鬼，怒向刀叢覓小詩。吟罷低眉無寫處，月光如水照緇衣。”

當北斗創刊時，我就想寫一點關於柔石的文章，然而不能夠，只得選了一幅珂勒惠支(Käthe Kollwitz 夫人的木刻，名曰犧牲，是一個母親悲哀地獻出她的兒子去的，算是只有我一個人心裏知道的柔石的記念。

同時被難的四個青年文學家之中，李偉森我沒有會見過，胡也頻在上海也只見過一次面，談了幾句天。較熟的要算白莽，即殷夫了，他曾經和我通過信，投過稿，但現在尋起來，一無所得，想必是十七那夜統統燒掉了，那時我還沒有知道被捕的也有白莽。然而那本彼得斐詩集却

在的。

不是年青的爲年老的寫記念，而在這三十年中，却使我目覩許多青年的血，層層淤積起來，將我埋得不能呼吸，我只能用這樣的筆墨，寫幾句文章，算是從泥土中挖一個小孔，自己延口殘喘，這是怎樣的世界呢？夜正長，路也正長，我不如忘却，不說的好罷。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將來總會有記起他們，再說他們的時候的……。

第十七章 九一八以後

——日本佔領東三省的意義。

這在一面，是日本帝國主義在“膺懲”他的僕役——中國軍閥，也就是“膺懲”中國民衆，因為中國民衆又是軍閥的奴隸；在另一面，是進攻蘇聯的開頭，是要使世界的勞苦羣衆，永受奴隸的苦楚的方針的第一步。

總之，[一九三一年]總算將這一部紀念碑的小說，送在這里的讀者們的面前了。譯的時候和印的時候，頗經過了不少艱難，現在倒也退出了記憶的圈外去，但我真如[J. K. 君]來信所說那樣，就像親生的兒子一般愛他，並且由他想到兒子的兒子。還有鐵流我也很喜歡。這兩部小說，雖然粗製，却並非濫造，鐵的人物和血的戰鬪，實在夠使描寫多愁善病的才子和千嬌百媚的佳人的所謂“美文”，在這面前淡到毫無蹤影。不過我也和 J. K. 君的意思一樣，以為這只是一點小小的勝利，所以也很希望多人合力的更來紹介，至少在後三年內，有關於內戰時代和

建設時代的紀念碑的的文學書八種至十種，此外更譯幾種雖然往往被稱為無產者文學，然而還不免含有小資產階級的偏見（如巴比塞）和基督教社會主義的偏見（如辛克萊）的代表作，加上了分析和嚴正的批評，好在那里，壞在那里，以備對比參考之用，那麼，不但讀者的見解，可以一天一天的分明起來，就是新的創作家，也得了正確的師範了。

我到上海以後，日報是看的，却從來沒有投過稿，也沒有想到過，並且也沒有注意過日報的文藝欄，所以也不知道申報在什麼時候開始有了自由談，自由談裏是怎樣的文字。大約是「一九三二年」的年底罷，偶然遇見郁達夫先生，他告訴我說，“自由談”的編輯新換了黎烈文先生了，但他才從法國回來，人地生疏，怕一時集不起稿子，要我去投幾回稿。我就漫應之曰：那是可以的。

對於達夫先生的囑咐，我是常常“漫應之曰：那是可以的”的。直白的說罷，我一向很迴避創造社裏的人物。這也不只因為歷來特別的攻擊我，甚而至于施行人身攻擊的緣故，大半倒在他們的一副“創造”臉，雖然他們之中，後來有的化爲隱士，有的化爲富翁，有的化爲實踐的革命者，有的也化爲奸細。而在“創造”這一面大纛之下的時候，却總是神氣十足，好像連出汗打嚏，也全是“創造”似

的。我和達夫先生見面得最早，臉上也看不出那麼一種創造氣，所以相遇之際，就便談談；對於文學的意見，我們恐怕是不能一致的罷，然而所談的大抵是空話。但這樣的就熟識了，我有時要求他寫一篇文章，他一定如約寄來，則他希望我做一點東西，我當然應該漫應曰可以。但應而至于“漫”，我已經懶散得多了。

但從此我就看看自由談，不過仍然沒有投稿。不久，聽到了一個傳聞，說自由談的編輯者爲了忙於事務，連他夫人的臨蓐也不暇照管，送在醫院裏，她獨自死掉了，幾天之後，我偶然在“自由談”裏看見一篇文章，其中說的是每日使嬰兒看看遺照，給他知道曾有這樣一個孕育了他的母親。我立刻省悟了這就是黎烈文先生的作品，拿起筆，想做一篇反對的文章，因爲我向來的意見，是以爲倘有慈母，或是幸福，然若生而失母，却也並非完全的不幸，他也許倒成爲更加勇猛，更無掛礙的男兒的。但是也沒有竟做，改爲給自由談的投稿了。

這些短評，有的由于個人的感觸，有的則出于時事的刺戟，但意思都極平常，說話也往往很晦澀。我知道自由談並非同人雜誌，“自由”更當然不過是一句反話，我決不想在這上面去馳騁的。我之所以投稿，一是爲了朋友的交情，一則在給寂寞者以吶喊，也還是由于自己的老脾氣。然而我的壞處，是在論時事不留面子，硬鋼弊常取類

型，而後者尤與時宜不合。蓋寫類型者，于壞處，恰如病理學上的圖，假如是瘡疽，則這圖便是一切某瘡某疽的標本，或和某甲的瘡有些相像，或和某乙的疽有點相同。而見者不察，以為所畫的只是他某甲的瘡，無端侮辱，于是就必欲制你畫者的死命了。例如我先前的論叭兒狗，原也泛無實指，都是自覺其有叭兒性的人們自來承認的。這要制死命的方法，是不論文章的是非，而先問作者是哪一個；也就是別的不管，只要向作者施行人身攻擊了。自然，其中也並不全是含憤的病人，有的倒是代打不平的俠客。總之這種戰術，是陳源教授的“魯迅即教育部僉事周樹人”開其端，事隔十年，大家早經忘却了，這回是王平陵先生告發于前，周木齋先生揭露于後，都是做着關於作者本身的文章，或則牽連而至于左翼文學者。

我的投稿，平均每月八九篇，但到五月初，竟接連的不能發表了，我想，這是因為其時諱言時事而我的文字却常不免涉及時事的緣故。這禁止的是官方檢查員，還是報館總編輯呢，我不知道，也無須知道。

真的，我不會說綿軟的蘇白，不會打響亮的京腔，不入調，不入流，實在是南腔北調。而且近幾年來。這缺點還有開拓到文學上去的趨勢。語絲早經停刊，沒有了任意說話的地方，打雜的筆墨，是也得給各個編輯者設身處地

地想一想的，於是文章也就不能劃一不二，可說之處說一點，不能說之處便罷休。即使在電影上，不也有時看得見黑奴怒形於色的時候，一有同是黑奴而手裏拿着皮鞭的走過來，便趕緊低下頭去麼？我也毫不強橫。

一俯一仰，居然又到年底，鄰近有幾家放鞭爆，原來一過夜，就要“天增歲月人增壽”了。靜着沒事，有意無意的翻出這兩年所作的雜文稿子來，排了一下，看看已經足夠印成一本，同時記得了那上面所說的“素描”裏的話，便名之曰南腔北調集，準備和還未成書的將來的五講三噓集配對。我在私塾裏讀書時對過對，這積習至今沒有洗乾淨，題目上有時就玩些什麼偶成，漫興，作文秘訣，搗鬼心傳，這回卻鬧到書名上來了。這是不足爲訓的。

自從中華民國建國二十有二年五月二十五日自由談的編者刊出了“籲請海內文豪，從茲多談風月”的啓事以來，很老老牌風月文豪搖頭幌腦的高興了一大陣，講冷話的也有，說俏皮話的也有，連只會做“文探”的叭兒們也翹起了牠尊貴的尾巴。但有趣的是談風雲的人，風月也談得，談風月就談風月罷，雖然仍舊不能正如尊意。

想從一個題目限制了作家，其實是不能夠的。假如出一個學而時習之的試題，叫遺少和車夫來做八股，那做

法就定不一樣。自然，車夫做的文章可以說是不通，是胡說，但這不通或胡說，就打破了遺少們的一統天下。古語裏也有過：柳下惠看見糖水，說“可以養老”，盜跖見了，卻道可以粘門門。他們是弟兄，所見的又是同一的東西，想到的用法却有這麼天差地遠。“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好的，風雅之至，舉手贊成。但同是涉及風月的“月黑殺人夜，風高放火天”呢，這不明明是一聯古詩麼？

我的談風月也終於談出了亂子來，不過也並非爲了主張“殺人放火”。其實，以爲“多談風月”，就是“莫談國事”的意思，是誤解的。“漫談國事”倒並不要緊，只是要“漫”，發出去的箭石，不要正中了一些人物的鼻梁，因爲這是他的武器，也是他的幌子。

從六月起的投稿，我就用種種的筆名了，一面固然爲了省事，一面也省得有人罵讀者們不管文字，只看作者署名。然而這麼一來，却又使一些看文字不用視覺，專靠嗅覺的“文學家”疑神疑鬼，而他們的嗅覺又沒有和全體一同進化，至於看見一個新的作家的名字，就疑心是我的化名，對我嗚嗚不已，有時簡直連讀者都被他們鬧得莫名其妙了。

日本的刊物，也有禁忌，但被刪之處，是留着空白，或加虛線，使讀者能夠知道的。中國的檢查官却不許留空白，必須接起來，於是讀者就看不見檢查刪削的痕迹，一

切含糊和恍惚之點，都歸在作者身上了。這一種辦法，是比日本大有進步的，我現在提出來，以存中國文網史上極有價值的故實。

從[一九三三年]六月起，另用各種的筆名，障住了編輯先生和檢查老爺的眼睛，陸續在自由談上發表的。不久就又蒙一些很有“靈感”的“文學家”吹噓，有無法隱瞞之勢，雖然他們的根據嗅覺的判斷，有時也並不和事實相符。但不善於改悔的人，究竟也躲閃不到那里去，於是及半年，就得着更厲害的壓迫了，敷衍到十一月初，只好停筆，證明了我的筆墨，實在敵不過那些帶着假面，從指揮刀下挺身而出的英雄。

不做文章，就整理舊稿，在年底裏，粘成了一本書，將那時被人剝削或不能發表的，也都添進去了，看起分量來，倒比這以前的偽自由書要多一點。[一九三四年]三月間，才想付印，做了一篇序，慢慢的排，校，不覺又過了半年，回想離停筆的時候，已是一年有餘了，時光真是飛快，但我所怕的，倒是我的雜文還好像說着現在或甚至至於明年。

我的雜文，所寫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但合起來，已幾乎是或一形象的全體，不加什麼原也過得去的了。但畫上一條尾巴，却見得更加完全。所以我的要寫“後記”，

除了我是弄筆的人，總要動筆之外，只在要這一本書裏所畫的形象，更成爲完全的一個具象，却不是“完全爲了一條尾巴”。

內容也還和先前一樣，批評些社會的現象，尤其是文壇的情形。因爲筆名改得勤，開初倒還平安無事。然而“江山好改，秉性難移”，我知道自己終於不能安分守己。

時光，是一天天的過去了，大大小小的事情，也跟着過去，不久就在我們的記憶上消亡；而且都是分散的，就我自己而論，沒有感到和沒有知道的事情真不知有多少。但卽此寫了下來幾十篇，加以排比，又用“後記”來補敘些因此而生的糾紛，同時也照見了時事，格局雖小，不也描出了或一形象了麼？——而現在又很少有肯低下他仰視莎士比亞，託爾斯泰的尊臉來，看看暗中，寫牠幾句的作者。因此更使我要保存我的雜感，而且牠也因此更能夠生存，雖然又因此更招人憎惡，但又在圍剿中更加生長起來了。嗚呼，“世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這是爲我自己和中國的文壇，都應該悲憤的。

文壇上的事件還多得很。獻檢查之祕計，施離析之奇策，起謠諑兮中權，藏真實兮心曲，立降旂于往年，溫故交于今日，……然而都不是做這准風談月時期以內的事，在

這裡也且不提及，或永不提及了。還是真的帶住罷，寫到我的背脊已經覺得有些痛楚的時候了！

我的常常寫些短評，確是從投稿於申報的自由談上開頭的；集一九三三年之所作，就有了偽自由書和淮風月談兩本。後來編輯者黎烈文先生真被擠軋得苦，到第二年，終於被擠出了，我本也可以就此擱筆，但爲了賭氣，却還是改些作法，換些筆名，託人抄寫了去投稿，新任者不能細辨，依然常常登了出來。一面又擴大了範圍，給中華日報的副刊動向，小品文半月刊太白之類，也間或寫幾篇同樣的文字。聚起一九三四年所寫的這些東西來，就是這一本花邊文學。

花邊文學可也真不行。一九三四年不同一九三五年，今年是爲了閒話皇帝事件，官家的書報檢查處忽然不知所往，還革掉七位檢查官，日報上被刪之處，也好像可以留着空白（術語謂之“開天窗”）了。但那時可真厲害，這麼說不可以，那麼說又不成功，而且刪掉的地方，還不許留下空隙，要接起來，使作者自己來負吞吞吐吐，不知所云的責任。在這種明誅暗殺之下，能夠苟延殘喘，和讀者相見的，那麼，非奴隸文章是什麼呢？

我曾經和幾個朋友閒談。一個朋友說：現在的文章，是不會有骨氣的了，譬如向一種日報上的副刊去投稿罷，

副刊編輯先抽去幾根骨頭，總編輯又抽去幾根骨頭，檢查官又抽去幾根骨頭，剩下來還有什麼呢？我說：我是自己先抽去了幾根骨頭的，否則，連“剩下來”的也不剩。所以，那時發表出來的文字，有被抽四次的可能，——現在有些人不在拼命表彰文天祥方孝孺麼，幸而他們是宋明人，如果活在現在，他們的言行是誰也無從知道的。

因此除了官准的有骨氣的文章之外，讀者也只能看看沒有骨氣的文章。我生於清朝，原是奴隸出身，不同二十五歲以內的青年，一生下來就是中華民國的主子，然而他們不經世故，偶爾“忘其所以”也就大碰其釘子，我的投稿，目的是在發表的，當然不給牠見得有骨氣，所以被“花邊”所裝飾者，大約也確比青年作家的作品多，而且奇怪，被刪掉的地方倒很少。

[一九三四年]一年中，我所投稿的自由談和動向，都停刊了；太白也不出了。我曾經想過：凡是我寄文稿的，只寄開初的一兩期還不妨，假使接連不斷，牠就總歸活不久。於是從今年起，我就不大做這樣的短文，因為對於同人，是迴避他背後的閹棍，對於自己，是不願做開路的馱子，對於刊物，是希望牠儘可能的長生。所以有人要我投稿，我特別敷衍推宕，非“擺架子”也，是帶些好意——然而有時也是惡意——的“世故”：這是要請索稿者原諒的。

一直到了[一九二五年]下半年，這才看見了新聞記者的“保護正當輿論”的請願和智識階級的言論自由的要求。要過年了，我不知道結果怎麼樣。然而，即使從此文章都成了民衆的喉舌，那代價也可謂大極了：是北五省的自治。這恰如先前的不敢懇請“保護正當輿論”和要求言論自由的代價之大一樣：是東三省的淪亡。不過這一次，換來的東西是光明的。然而，倘使萬一不幸，後來又復換回了我做花邊文學一樣的時代，大家試來猜一猜那代價該是什麼罷……

先來引幾句古書，——也許記的不真確，——莊子曰：“酒轍之鮒，相濡以沫，相煦以溼，——不若相忘于江湖。”

譯文就在一九三四年九月中，在這樣的狀態之下出世的。那時候，鴻篇鉅製如世界文學和世界文庫之類，還沒有誕生，所以在這青黃不接之際，大約可以說是彷彿戈壁中的綠洲，幾個人偷點餘暇，譯些短文，彼此看看，倘有讀者，也大家看看，自尋一點樂趣，也希望讀者或有一點益處，——但自然，這決不是江湖之太。

不過這與世無爭的小小的期刊，終於不能不在去年九月，以“終刊號”和大家告別了。雖然不過野花小草，但曾經費過不少移栽灌溉之力，不免私心以為可惜的。然而

竟也得了勇氣和慰安：這是許多讀者用了筆和舌，對於譯文的憑弔。

我們知道感謝，我們知道自勉。

我們也不斷的希望復刊。但那時風傳的關於終刊的原因：是折本。出版家雖然大抵是“傳播文化”的，而“折本”却是“傳播文化”的致命傷，所以荏苒半年，簡直死得無藥可救。直到今年，折本說這才起了動搖，得到再造的運會，再和大家相見了。

第十八章 在語文改革的浪潮中

記得初提倡白話的時候，是得到各方面劇烈的攻擊的。後來白話漸漸通行，勢不可遏，有些人便一轉而引爲自己之功，美其名曰“新文化運動”。又有些人便主張白話不妨作通俗之用；又有些人却道白話要做得好，仍須看古書。前一類早已二次轉舵，又反過來嘲罵“新文化”了；後二類是不得已的調和派，只希圖多留幾天僵屍，到現在還不少。我曾在雜感上揶揄過的。

新近看見一種上海出版的期刊，也說起要做好白話須讀好古文，而舉例爲證的人名中，其一却是我。這實在使我打了一個寒噤。別人我不論，若是自己，則曾經看過許多舊書，是的確的，爲了教書，至今也還在看。因此耳濡目染，影響到所做的白話上，常不免流露出牠的字句，體格來。但自己却正苦於背了這些古老的鬼魂，擺脫不開，時常感到一種使人氣悶的沈重。就是思想上，也何嘗不中些莊周韓非的毒，時而很隨便，時而很峻急。孔孟的書我讀得最早，最熟，然而倒似乎和我不相干。大半也因為懶

惰罷，往往自己寬解，以為一切事物，在轉變中，是總有多少中間物的。動植之間，無脊椎和脊椎動物之間，都有中間物。或者簡直可以說，在進化的鏈子上，一切都是中間物。當開首改革文章的時候，有幾個不三不四的作者，是當然的，只能這樣，也需要這樣。他的任務，是在有些警覺之後，喊出一種新聲；又因為從舊壘中來，情形看得較為分明，反戈一擊，易制強敵的死命。但仍應該和光陰偕逝，逐漸消亡，至多不過是橋梁中的一木一石，並非什麼前塗的目標，範本。跟着起來便該不同了，倘非天縱之聖，積習當然也不能頓然蕩除，但總得更有新氣象。以文字論，就不必更在舊書裏討生活，却將活人的脣舌作為源泉，使文章更加接近語言，更加有生氣。至於對於現在人民的語言的窮乏欠缺，如何救濟，使他豐富起來，那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或者也須在舊文中取得若干資料，以供使役，但這並不在我現在所要說的範圍以內，姑且不論。

我以為我倘十分努力，大概也還能夠博採口語，來改革我的文章。但因為懶而且忙，至今沒有做。我常疑心這和讀了古書很有些關係，因為我覺得古人寫在書上的可惡思想，我的心裏也常有，能否忽而奮勉，是毫無把握的。我常常詛咒我的這思想，也希望不再見於後來的青年。[一九二五年]我主張青年少讀，或者簡直不讀中國書，

乃是用許多苦痛換來的真話，決不是聊且快意，或什麼玩笑，憤激之辭。古人說：不讀書便成愚人，那自然也不錯的。然而世界却正由愚人造成，聰明人決不能支持世界，尤其是中國的聰明人。現在呢，思想上且不說，便是文辭，許多青年作者又在古文，詩詞中摘些好看而難懂的字面，作為變戲法的手巾，來裝演自己的作品了。我不知這和勸讀古文說可有相關，但正在復古，也就是新文藝的試行自殺，是顯而易見的。

文言比起白話來，有時的確字數少，然而那意義也比較的含糊。我們看文言文，往往不但不能增益我們的智識，並且須仗我們已有的智識，給牠注解，補足。待到翻成精密的白話之後，這才算是懂得了。如果一徑就用白話；即使多寫了幾個字，但對於讀者，“其省力為何如”？

現在寫一點我的簡單的意見在這裏：

一，漢字和大眾，是勢不兩立的。

二，所以，要推行大眾語文，必須用羅馬字拼音（即拉丁化，現在有人分為兩件事，我不懂是怎麼一回事），而且要分為多少區，每區又分為小區（譬如紹興一個地方，至少也得分為四小區），寫作之初，純用其地的方言，但是，人們是要前進的，那時原有方言一定不夠，就只好採用白話，獸字，甚而至於語法。但，在交通繁盛，言語混雜的地

方，又有一種語文，是比較普通的東西，牠已經採用着新字彙，我想，這就是“大衆語”的雛形，牠的字彙和語法，即可以輸進窮鄉僻壤去。中國人是無論如何，在將來必有非通幾種中國語不可的運命的，這事情，由教育與交通，可以辦得到。

三，普及拉丁化，要在大衆自學教育的時候。現在我們所辦得到的是：

(甲)研究拉丁化法，(乙)試用廣東話之類，讀者較多的言語，做出東西來看；(丙)竭力將白話做得淺俗，使能懂的人增多，但精密的所謂“歐化”語文，仍應支持，因為講究倘要精密，中國原有的語法是不夠的，而中國大衆語文，也決不會永久含糊下去。譬如罷，反對歐化者所說的歐化，就不是中國固有字，有些新字眼，新語法，是會有非用不可的時候的。

四，在鄉僻處啓蒙的大衆語，因然應該純用方言，但一面仍然要改進。譬如“媽的”一句話罷，鄉下是有許多意義的，有時罵罵，有時佩服，有時讚歎，因為他說不出別樣的話來。先驅者的任務，是在給他們許多話，可以發表更明確的意思，同時也可以明白更精確的意義。如果也照樣的寫着“這媽的天氣真是媽的。媽的再這樣，什麼都要媽的了”。那麼於大衆有什麼益處呢？

五，至於已有大衆語雛形的地方，我以為大可以依此

爲根據而加以改進，太僻的土語，是不必用的。例如上海叫“打”爲“吃生活”，可以用於上海人的對話，却不必特用於作者的敘事中，因爲說“打”，工人也一樣能夠懂。有些人以爲如“像煞有介事”之類，已經通行，也是不確的話，北方人對於這句話的理解，和江蘇人不一樣的，那感覺並不比“儼乎其然”切實。

文章和口語不能完全相同；講話的時候，可以夾許多“這個這個”“那個那個”之類，其實並無意義，到寫作時，爲了時間，紙張的經濟，意思的分明，就要分別刪去的，所以文章一定應該比口語簡潔，然而明了，有些不同，並非文章的壞處。

所以現在能夠實行的，我以爲是（一）製定羅馬字拼音（趙元任的太繁，用不來的）；（二）做更淺顯的白話文，採用較普通的方言，姑且算是向大衆語去的作品，至於思想，那不消說，該是“進步”的；（三）仍要支持歐化文法，當作一種後備。

中國人要在這世界上生存，那些識得“十三經”的名目的學者，“燈紅”會對“酒綠”的文人，並無用處，卻全靠大家的切實的智力，是明明白白的。那麼倘要生存，首先就必須除去阻礙傳佈智力的結核：非語文和方塊字。如果不想大家來給舊文字做犧牲，就得犧牲掉舊文字。

第十九章 非常時期的談話

從學生自發的救亡運動，在全國各處掀起澎湃的浪潮這一個現實中，的確可以看出，隨着帝國主義者加緊的進攻，漢奸政權加速的出賣民族，出賣國土，民族危機的深重，中華民族中大多數不願做奴隸的人們，已經醒覺的奮起，揮舞着萬衆的鐵拳，來摧毀敵人所給予我們這半殖民地的枷鎖了！學生特別是半殖民地民族解放鬥爭中感覺最敏銳的箭哨戰士，因此他們所自發的救亡運動，不難影響到全國，甚至影響到目前正徘徊於黑暗和光明交叉點的全世界。再從這次各處學生運動所表顯的各種事實來看，他們已經能夠很清楚的認識橫梗在民族解放鬥爭前程一切明明暗暗的敵人，他們也知道深入下層，體驗他們所需要體驗的生活，組織農民，工人，加緊推動這些民族解放鬥爭的主力軍。在行動方面，譬如組織的嚴密，遵守集團的紀律，優越戰術的運動，也能夠在冰天雪地中，自己動手鋪設起被漢奸拆掉的鐵軌，自動駕駛火車前進，

這一切，都證明這次學生運動，比較以前進步得多，這是一個可喜的現象！但缺憾和錯誤，自然還是有的。希望他們在今後血的鬥爭過程中，艱苦的克服下去。同時要保障過去的勝利，也祇有再進一步的鬥爭下去；在鬥爭的過程中，才可以充實自己的力量，學習一切有效的戰術。

民族危難到了現在這樣的地步，聯合戰綫這口號的提出，當然也是必要的，但我始終認為在民族解放鬥爭這條聯合戰綫上，對於那些狹義的不正確的國民主義者，尤其是翻來覆去的投機主義者，却望他們能夠改正他們的心思。因為所謂民族解放鬥爭，在戰略的運用上講，有岳飛文天祥式的，也有最正確的，最現代的。我們現在所應當採取的，究竟是前者，還是後者呢？這種地方，我們不能不特別重視；在戰鬥過程中，決不能在戰略上或任何方面有一點忽略，因為就是小小的忽略，毫厘的錯誤，都是整個戰鬥失敗的泉源啊！

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是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一發展，是無產革命文學在現在時候的真實的更廣大的內容。這種文學，現有已經存在着，並且即將在這基礎之上，再受着實際戰鬥生活的培養，開起爛縵的花來罷。因此，新的口號的提出，不能看作革命文學運動的停止；或

者說“此路不通”了。所以，決非停止了歷來的反對法西斯主義，反對一切反動者的血的鬥爭，而是將這鬥爭更深入，更擴大，更實際，更細微曲折，將鬥爭具體化到抗×反漢奸的鬥爭，將一切鬥爭匯合到抗×反漢奸鬥爭這總流裏去。決非革命文學要放棄牠的階級的領導的責任，而是將牠的責任更加重，更放大，重到和大到要使全民族，不分階級和黨派，一致去對外。這個民族的立場，才真是階級的立場。

但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正如無產革命文學的口號一樣，大概是一個總的口號罷。在總口號之下，再提些隨時應變的具體的口號，例如“國防文學”“救亡文學”“抗×文藝”……等等，我以為是無礙的，不但沒有礙，並且是有益的，需要的。自然，太多了也使人頭昏，渾亂。

不過，提口號，發空論，都十分容易辦。但在批評上應用，在創作上實現，就有問題了。批評與創作都是實際工作。以過去的經驗，我們的批評常流於標準太狹窄，看法太膚淺；我們的創作也常現出近於出題目做八股的弱點。所以我想現在應當特別注意這點。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決不是只局限於寫義勇軍打仗，學生請願示威……等等的作品。這些當然是好的，但不應這樣狹窄。牠廣泛得多，廣泛到包括描寫現在中國各種生活和鬥爭的意識的一切文學。因為現在中國最大的問題，人人所共的問

題，是民族生存的問題。所有一切生活（包含吃飯睡覺）都與這問題相關；例如吃飯可以和戀愛不相干，但目前中國人的吃飯和戀愛却都和××侵略者多少有些關係，這是看一看滿洲和華北的情形就可以明白的。而中國的唯一的出路，是全國一致對×的民族革命戰爭。懂得這一點，則作家觀察生活，處理材料，就如理絲有緒；作者可以自由地去寫工人，農民，學生，強盜，娼妓，窮人，閻佬，什麼材料都可以，寫出來都可以成為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也無需作品的後面有意地插一條民族革命戰爭的尾巴，翹起來當作旗子；因為我們需要的，不是作品後面添上去的口號和矯作的尾巴，而是那全部作品中的真實的生活，生龍活虎的戰鬪，跳動着的脈搏，思想和熱情，等等。

中國目前的革命的政黨向全國人民所提出的抗×統一戰線的政策，我是看見的，我是擁護的，我無條件地加入這戰線，那理由就因為我不但是一個作家，而且是一個中國人，所以這政策在我是認為非常正確的。

我贊成一切文學家，任何派別的文學家在抗×的口號之下統一起來的主張。

我以為文藝家在抗×問題上的聯合是無條件的，只要他不是漢奸，願意或贊成抗×，則不論叫哥哥妹妹之

者說“此路不通”了。所以，決非停止了歷來的反對法西主義，反對一切反動者的血的鬥爭，而是將這鬥爭更深入，更擴大，更實際，更細微曲折，將鬥爭具體化到抗×反漢奸的鬥爭，將一切鬥爭匯合到抗×反漢奸鬥爭這總流裏去。決非革命文學要放棄牠的階級的領導的責任，而是將牠的責任更加重，更放大，重到和大到要使全民族，不分階級和黨派，一致去對外。這個民族的立場，才真是階級的立場。

但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正如無產革命文學的口號一樣，大概是一個總的口號罷。在總口號之下，再提些隨時應變的具體的口號，例如“國防文學”“救亡文學”“抗×文藝”……等等，我以為是無礙的，不但沒有礙，並且是有益的，需要的。自然，太多了也使人頭昏，渾亂。

不過，提口號，發空論，都十分容易辦。但在批評上應用，在創作上實現，就有問題了。批評與創作都是實際工作。以過去的經驗，我們的批評常流於標準太狹窄，看法太膚淺；我們的創作也常現出近於出題目做八股的弱點。所以我想現在應當特別注意這點。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決不是只局限於寫義勇軍打仗，學生請願示威……等等的作品。這些當然是好的，但不應這樣狹窄。牠廣泛得多，廣泛到包括描寫現在中國各種生活和鬥爭的意識的一切文學。因為現在中國最大的問題，人人所共的問

題，是民族生存的問題。所有一切生活（包含吃飯睡覺）都與這問題相關；例如吃飯可以和戀愛不相干，但目前中國人的吃飯和戀愛却都和××侵略者多少有些關係，這是看一看滿洲和華北的情形就可以明白的。而中國的唯一的出路，是全國一致對×的民族革命戰爭。懂得這一點，則作家觀察生活，處理材料，就如理絲有緒；作者可以自由地去寫工人，農民，學生，強盜，娼妓，窮人，閹佬，什麼材料都可以，寫出來都可以成為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也無需作品的後面有意地插一條民族革命戰爭的尾巴，翹起來當作旗子；因為我們需要的，不是作品後面添上去的口號和矯作的尾巴，而是那全部作品中的真實的生活，生龍活虎的戰鬥，跳動着的脈搏，思想和熱情，等等。

中國目前的革命的政黨向全國人民所提出的抗×統一戰線的政策，我是看見的，我是擁護的，我無條件地加入這戰線，那理由就因為我不但是一個作家，而且是一個中國人，所以這政策在我是認為非常正確的。

我贊成一切文學家，任何派別的文學家在抗×的口號之下統一起來的主張。

我以為文藝家在抗×問題上的聯合是無條件的，只要他不是漢奸，願意或贊成抗×，則不論叫哥哥妹妹之

乎者也，或鴛鴦蝴蝶都無妨。但在文學問題上我們仍可以互相批判。

我們抗×人民統一戰線是比法國的人民陣線還要廣泛得多的。

我以為應當說：作家在“抗×”的旗幟，或者在“國防”的旗幟之下聯合起來；不能說：作家在“國防文學”的口號之下聯合起來，因為有些作者不寫“以國防為主題”的作用，仍可從各方面來參加抗×的聯合戰線；即使他像我一樣沒有加入“文藝家協會”，也未必就是“漢奸”。“國防文學”不能包括一切文學，因為在“國防文學”與“漢奸文學”之外，確有既非前者也非後者的文學，除非他們有本領也證明了紅樓夢，子夜，阿Q正傳是“國防文學”或“漢奸文學”，這種文學存在着，但牠不是杜衡，韓侍桁，楊邨人之流的什麼“第三種文學”。因此，我很同意郭沫若先生的“國防文藝是廣義的愛國主義的文學”和“國防文藝是作家關係間的標幟，不是作品原則上的標幟”的意見。

我以為在抗×戰線上 是任何抗×力量都應當歡迎的，同時在文學上也應當容許各人提出新的意見來討論，“標新立異”也並不可怕。

如果牠〔按即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這口號〕是爲了推動一向囿於普洛革命文學的左翼作家們跑到抗×的民族革命戰爭的前線上去，牠是爲了補救“國防文學”這

名詞本身的在文學思想的意義上的不明瞭性，以及糾正一些注進“國防文學”這名詞裏去的不正確的意見，爲了這些理由而被提出，那麼這是正當的，正確的。如果人不用腳底皮去思想，而是用過一點腦子，那就不能隨便說句標新立異”就完事。“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這名詞“在本身上，比“國防文學”這名詞，意義更明確，更深刻，更有內容。“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主要是對前進的一向稱爲左翼的作家們提倡的，希望這些作家們努力向前進。

我說“國防文學”是我們目前文學運動的具體口號之一，爲的是“國防文學”這口號，頗通俗，已經有很多人聽慣，牠能擴大我們政治的和文學的影響，加之牠可以解釋爲作家在國防旗幟下聯合，爲廣義的愛國主義的文學的緣故。因此，它即使曾被不正確地解釋，它本身含義上有缺陷，它仍應當存在因爲存在，對於抗×運動有利益。

我主張以文學來幫助革命，不主張徒唱空調高論，拿“革命”這兩個輝煌的名詞，來抬高自己的文學作品。現在我們中國最需要反映民族危機，鼓勵爭鬥的文學作品，像八月的鄉村，生死場等作品；我總嫌太少。在目前，全中國到處可聞到大衆不平的吼聲，社會上任何角落裏，可以看

到大衆爲爭取民族解放而匯流的鬪爭的鮮血，這一切都是大好題材。可是前進的我們所需要的文學作品的產量還是那麼貧乏。究其原因，固然很多，如中國青年對文學修養太缺少，也是一端；但最大的因素，還是在漢字太艱深，一般大衆雖親歷許多鬪爭的體驗，但結果還是寫不出來。

漢字不滅，中國必亡。因爲漢字的艱深，使全中國大多數的人民，永遠和前進的文化隔離，中國的人民，決不會聰明起來，理解自身所遭受的壓榨，整個民族的危機。我是自身受漢字苦痛很深的一個人，因此我堅決主張以新文字來替代這種障礙大衆進步的漢字。譬如說一個小孩子要寫一個生薑的“薑”字，或一個“鸞”字，到方格子裏面去，能夠不偏不歪，不寫出格子外面去，也得要化一年功夫，你想漢字麻煩不麻煩？目前，新文字運動的推行，在我國已很有成績。雖然我們的政治當局，已經也在嚴厲禁止新文字的推行，他們恐怕中國人民會聰明起來，會獲得這個有勁的求知的新武器，但這顯然是不中用的！我想，新文字運動應當和當前的民族解放運動，配合起來同時進行，而推行新文字，也該是每一個前進文化人應當肩負起來的任務。

第十九章 病和死

有一些事，健康者或病人是不覺得的，也許遇不到，也太許微細，到得大病初愈，就會經驗到；在我，則疲勞之可怕和休息之舒適，就是兩個好例子。我先前往往自負，從來不知道所謂疲勞。書桌面前有一把圓椅，坐着寫字或用心的看書，是工作；旁邊有一把藤躺椅，靠着談天或隨意的看報，便是休息，覺得兩者並無很大的不同，而且往往以此自負；現在才知道是不對的，所以並無大不同者，乃是因為並未疲勞，也就是並未出力工作的緣故。

我的確什麼慾望也沒有，似乎一切都和我不相干，所有舉動都是多事，我沒有想到死，但也沒有覺得生：這就是所謂“無慾望狀態”；是死亡的第一步。曾有愛我者因此暗中下淚；然而我有轉機了，我要喝一點湯水，我有時也看看四近的東西；如牆壁，蒼蠅之類。此後纔能覺得疲勞，纔需要休息。

像心縱意的躺倒，四肢一伸，大聲打一個呵欠，又將

全體放在適宜的位置上，然後弛懈了一切用力之點，這真是一種大享樂。在我是從來未曾享受過的。我想，強壯的，或者有福的人，恐怕也未曾享受過。

街燈的光穿窗而入，屋子裏顯出微明，我大略一看，熟識的牆壁，壁端的稜線；熟識的書堆，堆邊的未訂的畫集，外面的進行着的夜，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和我有關。我存在着，我在生活，我將生活下去，我開始覺得自己更切實了，我有動作的慾望——但不久我又墜入了睡眠。

第二天早晨在日光中一看，果然，熟識的牆壁，熟識的書堆……這些，在平時，我也時常看他們的，其實是算作一種休息。但我們一向輕視這等事，縱使也是生活中的一片，却排在喝茶搔癢之下，或者簡直不算一回事。我們所注意的是特別的精華，毫不在枝葉。給名人作傳的人，也大抵一味鋪張其特點，李白怎樣做詩，怎樣耍顛，拿破崙怎樣打仗，怎樣不睡覺，却不說他們怎樣不要顛，要睡覺。其實，一生中專門耍顛或不睡覺，是一定活不下去的，人之有時能耍顛和不睡覺，就因為倒是有時不要顛和也睡覺的緣故。然而人們以為這些平凡的都是生活的渣子，一看也不看。

其實，戰士的日常生活，是並不全部可歌可泣的，然

而又無不和可歌可泣之部相關聯，這才是實際上的戰士。

我今年[按卽一九三六年]的這“想了一想”當然和年紀有關，但回憶十餘年前，對於死却還沒有感到這麼深切。大約我們的生死久已被人們隨意處置，認為無足重輕，所以自己也看得隨隨便便，不像歐洲人那樣的認真了。有些外國人說，中國人最怕死。這其實是不確的——但自然，每不免模模胡胡的死掉則有之。

有一批人是隨隨便便，就是臨終也恐怕不大想到的，我向來正是這隨便黨裏的一個。三十年前學醫的時候，曾經研究過靈魂的有無，結果是不知道；又研究過死亡是否苦痛，結果是不一律，後來也不再深究，忘記了。近十年中，有時也爲了朋友的死，寫點文章，不過好像並不想到自己。這兩年來病特別多，一病也比較的長久，這才往往記起了年齡，自然，一面也爲了有些作者們筆下的好意的或是惡意的不斷的提示。

從去年起，每當病後休養，躺在藤躺椅上，每不免想到體力恢復後應該動手的事情：做什麼文章，翻譯或印行什麼書籍。想定之後，就結束道：就是這樣罷——但要趕快做。這“要趕快做”的想頭，是爲先前所沒有的，就因爲在不知不覺中，記得了自己的年齡。却從來沒有直接的想到“死”。

直到今年的大病，這才分明的引起關於死的豫想來，原先是仍如每次的生病一樣，一任着日本的S醫師的診治的。他雖不是肺病專家，然而年紀大，經驗多，從習醫的時期說，是我的前輩，又極熟識，肯說話，自然，醫師對於病人，縱使怎樣熟識，說話是還是有限度的，但是他至少已經給了我兩三回警告，不過我仍然不以爲意，也沒有轉告別人。大約實在是日子太久，病象太險了的緣故罷，幾個朋友暗自協商定局，請了美國的D醫師來診察了。他是在上海的唯一的歐洲的肺病專家，經過打診，聽診之後，雖然譽我爲最能抵抗疾病的典型的中國人，然而也宣告了我的就要滅亡；並且說，倘是歐洲人，則在五年前已經死掉。這判決使善感的朋友們下淚。我也沒有請他開方，因爲我想，他的醫學從歐洲學來，一定沒有學過給死了五年的病人開方的法子。然而D醫師的診斷却實在是極準確的，後來我照了一張用X光透視的胸像，所見的景象，竟大抵和他的診斷相同。

我並不怎麼介意於他的宣告，但也受了些影響，日夜躺着，無力談話，無力看書，連報紙也拿不動，又未曾鍊到“心如古井”，就只好想，而從此竟有時要想到“死”了。不過所想的也並非“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或者怎樣久住在楠木棺材裏之類，而是臨終之前的瑣事，在這時候，我才確信，我是到底相信人死無鬼的。我只想到過寫這

囑，以爲我倘會貴爲官保，富有千萬，兒子和女婿及其他一定早已逼我寫好遺囑了，現在却誰也不提。但是我也留下一張罷。當時好像很想定了一些，都是寫給親屬的，其中有的是：

一，不得因爲喪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錢。——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

二，趕快收斂，埋掉，拉倒。

三，不要做任何關於紀念的事情。

四，忘記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塗蟲。

五，孩子長大，倘無才能，可尋點小事情過活，萬不可去做空頭文學家或美術家。

六，別人應許給你的事物，不可當真。

七，損着別人的牙眼，却反對報復，主張寬容的人，萬勿和他接近。

此外自然還有，現在忘記了。只還記得在發熱時，又曾想到歐洲人臨死時，往往有一種儀式，是請別人寬恕，自己也寬恕了別人。我的怨敵可謂多矣，倘有新式的人問起我來，怎麼回答呢？我想了一想，決定的是：讓他們怨恨去，我也一個都不寬恕。

但這儀式並未舉行，遺囑也沒有寫，不過默默的躺着，有時還發生更切迫的思想：原來這樣就算是在死下

去，倒也並不苦痛；但是，臨終的一剎那，也許並不這樣的罷；然而，一世只有一次，無論怎樣，總是受得了的。……後來，却有了轉機，好起來了。到現在，我想，這些大約並不是真的要死之前的情形，真的要死，是連這些想頭未必有的，但究竟如何，我也不知道。

我即使老，即使死，卻決不會將地球帶進棺材裏去，牠還年青，牠還存在，希望正在將來。

據盧南(E. Renan)說，年紀一大，性情就會苛刻起來。我願意竭力防止這弱點，因為我又明明白白地知道：世界決不和我同死，希望是在於將來的。



在死床上的魯迅



瞻仰遺容和參加殯儀的羣衆

生命的路（代跋）

想到人類的滅亡是一件大寂寞大悲哀的事：然而若干人類的滅亡，却並非寂寞悲哀的事。

生命的路是進步的，總是沿着無限的精神三角形的斜面向上走，什麼都阻止他不得。

自然賦與人們的不調和還很多，人們自己萎縮墮落退步的也還很多，然而生命決不因此回頭。無論什麼黑暗來防範思潮，什麼悲慘來襲擊社會，什麼罪惡來褻瀆人道，人類的渴仰完全的潛力，總是踏了這些鐵蒺藜向前進。

生命不怕死，在死的面前笑着跳着，跨過了滅亡的人們向前進。

什麼是路？就是從沒路的地方踐踏出來的，從只有荊棘的地方開闢出來的。

以前早有路了，以後也該永遠有路。

人類總不會寂寞，因為生命是進步的，是樂天的。

昨天，我對我的朋友L說，“一個人死了”，在死者自

身和他的眷屬是悲慘的事，但在一村一鎮的人看起來不算什麼；就是一省一國一種……”

L 很不高興，說，“這是 Natur（自然）的話，不是人們的話，你應該小心些。”

我想，他的話也不錯。

附 錄 三 種

- 魯迅譯著書目……………魯迅手撰；左羣續補
魯 迅 傳……………佐藤春夫原作
關於魯迅……………周作人近作

魯迅譯著書目

一九二一年

工人綏惠略夫（俄國M.阿爾志跋綏夫作中篇小說·商務印書館印行“文學研究會叢書”之一，後歸北新書局，爲“未名叢刊”之一，今絕版。）

一九二二年

一個青年的夢（日本武者小路實篤作戲曲·商務印書館印行“文學研究會叢書”之一，後歸北新書局，爲“未名叢刊”之一，今絕版。）

愛羅先珂童話集（商務印書館印行“文學研究會叢書”之一。）

一九二三年

桃色的雲（俄國V.愛羅先珂作童話劇·北新書局印行“未名叢刊”之一。）

吶喊（短篇小說集·一九一八至二二年作，共十四篇·印行所同上。）

中國小說史略上册（改訂之北京大學文科講義·印行所

同上。)

一九二四年

苦悶的象徵 (日本廚川白村作論文。北新書局印行“未名叢刊”之一。)

中國小說史略下冊 (印行所同上。後合上冊爲一本。)

一九二五年

熱風 (一九一八至二四年的短評。印行所同上。)

一九二六年

彷徨 (短篇小說集之二。一九二四至二五年作。共十一篇。印行所同上。)

華蓋集 (短評集之二。皆一九二五年作。印行所同上。)

華蓋集續編 (短評集之三。皆一九二六年作。印行所同上。)

小說舊聞鈔 (輯錄舊文。間有考正。印行所同上。)

出了象牙之塔 (日本廚川白村作隨筆。選譯。未名社印行“未名叢刊”之一。今歸北新書局。)

一九二七年

墳 (一九〇七至二五年的論文及隨筆。未名社印行。今版被抵押。不能印。)

朝華夕拾 (回憶文十篇。未名社印行“未名新集”之一。今版被抵押。由北新書局另排印行。)

唐宋傳奇集十卷 (輯錄并考正。北新書局印行。)

一九二八年

小約翰（丹麥E.望·藹覃作長篇童話·未名社印行“未名叢書”之一·今版被抵押，不能印。）

野草（散文小詩·北新書局印行。）

而已集（短評集之四·皆一九二七年作·印行所同上。）

思想山水人物（日本鶴見祐輔作隨筆，選譯·印行所同上，今絕版。）

一九二九年

壁下譯叢（譯俄國及日本作家與批評家之論文集·印行所同上。）

近代美術史潮論（日本板垣應種作·印行所同上。）

踏谷虹兒畫選（并譯題詞·朝華社印行“藝苑朝華”之一，今絕版。）

無產階級文學的理論與實際（日本片上伸作·大江書店印行“文藝理論小叢書”之一。）

藝術論（蘇聯A.盧那卡爾斯基作·印行所同上。）

一九三〇年

藝術論（俄國G.蒲力汗諾夫作·光華書局印行“科學的藝術論叢書”之一。）

文藝與批評（蘇聯盧那卡爾斯基作論文及演說·水沫書店印行同叢書之一。）

文藝政策（蘇聯關於文藝的會議錄及議決·並同上。）

十月（蘇聯A雅各武萊夫作長篇小說·神州國光社收稿爲“現代文藝叢書”之一，今尙未印·）〔——現已刊出——羣註〕

一九三一年

藥用植物（日本刈米達夫作·商務印書館收稿，分載自然界中·）

毀滅（蘇聯A法捷耶夫作長篇小說·三閒書屋印行·）

譯著之外，又有

所校勘者，爲：

唐劉恂嶺表錄異三卷（以唐宋類書所引校永樂大典本，并補遺·未印·）

魏中散大夫嵇康集十卷（校明叢書堂鈔本，并補遺·未印·）

所纂輯者，爲：

古小說拘洗三十六卷（輯周至隋散逸小說·未印·）

謝承後漢書輯本五卷（多於汪文臺輯本，未印·）

所編輯者，爲：

莽原（週刊·北京京報附送，後停刊·）

語絲（週刊·所編爲在北平被禁，移至上海出版後之第四卷至第五卷之半·北新書局印行，後廢刊·）

奔流（自一卷一冊起，至二卷五冊停刊·北新書局印行·）

文藝研究 季刊·只出第一冊·大江書店印行·）

所選定，校字者，爲：

故鄉（許欽文作短篇小說集·北新書局印行“烏合叢書”之一。）

心的探險（長虹作雜文集·同上。）

飄渺的夢（向培良作短篇小說集·同上。）

忘川之水（真吾詩選·北新書局印行。）

所校訂，校字者，爲·

蘇俄文藝論戰（蘇聯褚沙克等論文，附蒲力汗諾夫與藝術問題，任國楨譯·北新書局印行“未名叢書”之一。）

十二個（蘇聯A.勃洛克作長詩，胡毅譯·同上。）

爭自由的波浪（俄國波.但彙珂等作短篇小說集，董秋芳譯·同上。）

勇敢的約翰（匈牙利裴多菲山·大作民間故事詩，孫用譯。

湖風書局印行。

夏娃日記（美國馬克·士溫作小說·李蘭譯·湖風書局印行“世界文學名著譯叢”之一。）

所校訂者，爲：

二月（柔石作中篇小說·朝華社印行，今絕版。）

小小十年（葉永蓀作長篇小說·春潮書局印行。）

窮人（俄國F.陀思妥夫斯基本作小說·章叢燕譯·未名社印行·“未名叢書”之一。）

黑假面人 (俄國L.安特來夫作戲曲·李霽野譯·同上·)
紅笑 (前人作小說·梅川譯·商務印書館印行·)
小彼得 (匈牙利H.至爾·妙倫作童話·許霞譯·朝華社印
 行·今絕版·)

進化與退化 (周建人所譯生物學的論文選集·光華書局印
 行·)

浮士德與城 (蘇聯A.盧那卡爾斯基作戲曲·柔石譯·神州
國光社印行“現代文藝叢書”之一·)

靜靜的頓河 (蘇聯M.峻羅訶夫作長篇小說·第一卷·賀非
 譯·同上·)

鐵甲列車第一四——六九 (蘇聯V.伊凡諾夫作小說·侍桁
 譯·同上·未出·[今已刊出·——羣註]

所印行，爲：

士敏土之圖 (德國C.梅斐爾德木刻十幅·珂羅版印·)

鐵流 (蘇聯A.綏拉菲摩維支作長篇小說·曹靖華譯·)

鐵流之圖 (蘇聯I.畢斯凱萊夫木刻四幅·印刷中·被炸
 燬·)[今已印出·——羣註]

我所譯著的書，景宋曾經給我開過一個目錄，載在關於魯迅及其著作裏，但是並不完全的。這回因爲開手編集雜感，打開了裝着和我有關的書籍的書箱，就順便另抄了一張書目，如上。

魯迅

〔魯迅手編書目，到此爲止；以下由左羣續補，翼成全璧。〕

一九三一年

三閒集（短評集之五，一九一七至二九年作，北新書局印行。）

果樹園（蘇聯短篇小說選集，現代書局印行，今絕版。）

一九三二年

二心集（短評集之六，一九三〇至三一年作，合衆書店印行。）

一九三三年

蕭伯納在上海（感想文，野草書屋印行，今歸聯華書局印行。）

魯迅自選集（小說，感想文，歷史速寫集，天馬書店印行。）

豎琴（蘇聯短篇小說選集，良友圖書公司印行“良友文學叢書”之一。）

一天的工作（蘇聯短篇小說選集，印行所同上。）

南腔北調集（短評集之七，一九三二至三三年所作，同文書店印行，今歸聯華書局印行。）

兩地書（書簡集，一九二五年三月至七月，二六年九月至二七年七月，二九年五月至六月與景宋的通信，青光書局印行。）

僞自由書一名：不三不四集（短評集之八，一九三三年上半年所作，青光書局印行，今歸聯華書局印行。）

淮風月談（短評集之九，一九三三年下半年作，興中書局印行，今歸聯華書局印行。）

一九三五年

集外集（一九〇三至三三年未結集的短評，小詩及論文，楊霽雲編，羣衆圖書公司印行。）

門外文談（論文，皆一九三三年作，天馬書店印行。）

錢（蘇聯L.班台萊夫作童話，生活書店印行。）

一九三六年

花邊文學（短評集之十，皆一九三三年作，聯華書局印行。）

壞孩子及其他（俄契訶夫作小說集，一九三三年以後所譯，聯華書局印行。）

故事新編（歷史速寫集，一九二二至三五年作，文化生活出版社印行“文學叢刊”之一。）

死魂靈第一部（俄果戈理作長篇小說，文化生活出版社印行“譯文叢書”之一。）

近六年間所校訂者，爲：

一個人的受難（F.麥綏萊勒連環圖畫故事，良友圖書公司印行。）

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語絲，沉鐘，新潮，莽原，未名，諸團體小說家卅三人選集，良友圖書公司印行。）

豐收（葉紫作短篇小說集，“奴隸社叢書”之一，內山書店經售。）

八月的鄉村（田軍作長篇小說，同上。）

生死場（蕭紅作長篇小說，同上。）

死魂靈百圖（蘇聯A.阿庚繪，文化生活出版社印行。）

凱綏·珂勒惠支版畫選（文化生活出版社印行。）

近六年間所印行者，爲：

不走正路的安得倫（曹靖華譯羅維洛夫中篇小說，三閒書屋印行，今歸聯華書局印行。）

引玉集（世界木刻選集，內山書店經售。）

海上述林上卷（瞿秋白所譯論文集，內山書店經售。）

所有未刊遺稿，不久將加以整理出版，該項目錄，當再補刊，特白。——羣註。

魯迅傳

魯迅是在一八八一年生於浙江省紹興府的。他底父親是讀書人，雖然他底母親是鄉下人，但她是很努力自修自讀的。在他幼小的時候，家中置有四五十畝良田，因而生活亦很可過去。他底祖父在清朝是已獲得翰林底學位；可是當他在十三歲的時候，祖父已因某一事件被捕入獄了。於是親戚和隣舍對於他底家族都加以凌辱，家裏底財產也都被擄取精光；接着父親就生起大病來。他在發表於語絲半月刊上的自傳裏說：

“……但到我十三歲時，我家忽而遭了一場很大的變故，幾乎什麼也沒有了；我寄住在一個親戚家，有時還被稱為乞食者。我於是決心回家，而我的父親又生了重病，約有三年多，死去了。……”

還有在那處女作小說吶喊底自序裏說：

“我有四年多，曾經時常——幾乎是每天，出入於當鋪和藥店裏，年紀可是忘却了，總之是藥店的櫃台正和我一樣高，當鋪的是比我高一倍，我從一倍高的櫃台外送上

衣服或首飾去，在侮蔑裏接了錢，再到一樣高的櫃台上給我久病的父親去買藥。回家之後，又須忙別的事了，因為開方的醫生是最有名的；以此所用的藥引也奇特：冬天的蘆根，經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對的，結子的平地木，……都不是容易辦到的東西，然而我的父親終於日重一日的亡故了。……”

因為祖父是做官的，所以家裏便有着相當的產業；但這些都為父親長期生病而用光了。因為被親戚所欺凌，以致沒有飯吃，他就這樣地說道：

“有誰從小康人家而墮入困頓的麼，我以為在這塗路中大概可以看見世人的真面目……”

在家裏既無飯吃了，便非向外發展不可。但因為他是個讀書人的子弟，不用說是要受教育的了，即使讀書，那便只能進免費的學校；於是他底母親就籌劃了八元旅費，他也就拿了這筆旅費到南京去。在南京他既非常貧窮，且又很用功；終於考入了礦路學堂，這學校是由新黨（當時的洋學派）所主持的。他對於洋學很感興趣，既醉心於進化論，又愛讀新科學書，尤其對於生理、解剖、衛生等醫學底知識加緊努力自修着。

“我還記得先前的醫生的議論和方藥，和現在所知道的比較起來，便漸漸的悟得中醫不過是一種有意的或無意的騙子，同時又很起了對於被騙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

同情；而且從譯出的歷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維新是大半發端於西方醫學的事實。”（吶喊序）

所以他後來就都寫了出來。的確，他年輕時感情上所受的父親底病的刺戟，無時不都深印在腦海裏。他爲了父親底藥價，爲了搜集藥方的藥材，曾整整化費了三年多工夫奔走四方。因此就研究出了父親底病是爲庸醫所殺害了的。所以他想做醫生，要來救不幸的國人。而且當時已覺悟的青年，無論誰都好像是有這樣的思想似地，燃燒着爲拯救快要滅亡的中國而振作起來的革命精神。自從鴉片戰爭發生以來，接着什麼中日戰爭呀，什麼義和團事件呀，都爲外國所擊敗，正因爲是倒了霉，所以所有一切都受外國底壓迫和威脅，於是中國就漸漸地被蠶蝕了。因此滿洲人所建立的清朝，就是漢人底仇敵。所以什麼推翻滿洲人底政府，同時非馬上建立中國底政權的風潮，就橫溢着在知識青年之間。那時，日本已仗老練之力興隆了起來的，所以說日本就是他們底模範。但日本之興隆，完全是由於明治維新底變革之所致；因此中國也便非起來革命不可了。魯迅是已看清了，日本維新和西洋醫學底關係。所以他便以爲已被悠久的腐敗的傳統所束縛着的中國國民底精神，應該是依於科學底知識，以及醫學和醫術來啓發的，這就是喚醒中國國民底覺悟的第一步。

“因爲這些幼稚的知識，後來便使我的學籍列在日本

一個鄉間的醫學專門學校裏了。我的夢很美滿，預備卒業，救治像我父親似的被誤的疾苦，戰爭時候便去當軍醫；一面又促進國人對於維新的信仰。”（吶喊序）

那時，他是沉醉於像少年似的浪漫的人道主義，興奮地在努力着。在礦路學堂畢業第一名，過後就領得省費到日本去留學，在東京的弘文學院有二年間是研究日本語和普通科，終於，希望做醫生的他，就考入仙台醫學專門學校了。第一年的考試，就在日本人的學生中，他底成績是中等的。有一部分學生以為“中國因為是弱國，所以中國人無論如何總是低能兒”（根據朝花夕拾），對於他底成績都起懷疑，有的說要派出級代表來檢查他底課卷，有的說有部分的教師把題目洩漏給他的。自從給他知道了這些學生對於自己底誤解之後，他對於學校便大失其所望了。於是到了第二年，他便非離開仙台不可了。（參攷藤野先生）

“我已不知道教授微生物學的方法，現在又有了怎樣的進步了，總之那時是用了電影，來顯示生物的形狀的，因此有時講義的一段落已完，而時間還沒有到，教師便映些風景或時事的畫片給學生看，以用去這多餘的光陰。其時正當日俄戰爭的時候，關於戰事的畫片自然也就比較的多了，我在這一個講室中，便須常常隨喜我那些同學們的拍手和喝采。有一回我先在畫片上忽然會見我久遠的

中國人了，一個綁在中間，許多站在左右；一樣是強壯的體格，而顯出麻木的神情。據解說，則綁着的是替俄國做了軍事上的偵探，正要被日軍砍下頭顱來示衆，而圍着的便是來賞鑑這示衆的盛舉的人們。”（吶喊序）

那時，他底美夢完全粉碎了。同時他底一生就以此爲契機而轉變了方向了。

“這一學年沒有完畢，我已經到了東京了；因爲從那一回以後，我便覺得醫學並非一件緊要事，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強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衆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爲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於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爲當然要推文藝，於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吶喊序）

在東京的留學生們，想研究法政、理化、警察、工業的很多，可是研究文學和美術的却沒有。於是在那些人當中集攏了幾個同志，此外加入幾個經濟援助等的，討論之後，第一步自然是出版雜誌了。那時，魯迅已經是推翻滿清的革命黨員了；但他既在德國協會學校裏讀德文；同時又參加各種實際運動，出入於宮崎和滔天的什麼地方等。因爲其雜誌也是滅滿與漢的，所以可說是當時革命運動之一了，因此其雜誌就定名爲新生。“新生”的出版之期接近了，但最先就隱去了若干擔當文字的人，接着又逃

走了資本，結果只剩下不名一錢的三個人。……這三個人也都爲各自的運命所驅策，不能在一處縱談將來的好夢了。這就是我們的並非生產的新生的結局”。(吶喊序)

終於雜誌出版底計劃是失敗了，學校也被拋棄了，意氣沮喪的他，想到德國去的理想也失望了。還有，那時，和他底弟弟周作人（周作人也是現代著名的文學家，是永遠在北京大學當教授，其文壇的聲名是與其兄魯迅並駕齊驅的）共同翻譯的域外小說集出版了，但祇出版到了第二集，這也終於失敗了。他從仙台回到東京的第三年，那時已有二十九歲了；但在國內的母親以及其他的人都非要他援助經濟不可，所以他祇得回國了。回國後，他是在杭州師範學校裏當化學和生理學的教員；可是祇一年就辭職了；接着就當紹興中學校底教務主任；但他又不到半年跑掉了；這是因爲他和無論那一個上自校長下至所有古董的道學先生的同事吵架，思想上不對的緣故。他自離開了學校之後，爲了生活，就想在某一書店裏當編輯員，結果又被拒絕了。但這時間，他已是革命黨員而拚命地爲革命在奔走着。

一九一一年(辛亥年)十月，革命軍在武昌起義，清廷便很脆弱地潰滅了，忽然各地就接二連三地歸於革命黨底手裏。魯迅底故鄉——紹興——也早已是革命黨底地方了；但其內部仍然是照舊未動絲毫；這是什麼緣故呢？

因爲由這幾個腐敗的鄉紳所組織的軍政府，像什麼鐵路的大股東做行政局長，錢莊的老闆做軍事局長之類，當然這一軍政府是無容年輕的知識青年加入之餘地了。學生們就先騷動起來了，那時就有一個革命軍隊中蠻有勢力的帶了軍隊，爲了鎮壓騷動分子，從杭州開到了那裏，本來那軍隊底首領是承奉大多數的破落戶以及真正的革命黨員們而舉爲都督的。可是做了都督之後，馬上就神氣活現起來，壓迫民衆，已變成了專橫放恣的軍閥了。那時已如同革命黨的同志的魯迅，是有着了師範學校校長的飯碗：

“無論怎麼樣，總是毫無趣味，他們底計劃是沒有的。”

有一個魯迅底學生某次訪問他說道：

“我們不得不辦一報紙監督他們，所以該報發起人得要借一借先生底名字。”

魯迅底學生們出版報紙，是罵軍政府以及其內部的人們，不但如此，而且罵都督，和都督底親戚，以及同鄉人。終於說都督要殺害魯迅的消息帶到他那裏，魯迅就拔脚逃到了南京去。那時，剛巧革命政府在南京統一了，孫文做大總統，蔡元培做教育部部長。蔡元培是魯迅底同鄉，是老先輩。魯迅由他底關係一躍而爲南京政府底教育部的人了。南京政府，不久遷移到北京去，魯迅也跟政府一起遷移到北京去在教育部裏做事。他共在教育部裏十

五年當中，除做過教育部僉事和做過京師圖書館長外，曾執教鞭於北京大學、師範大學、女子師範大學等；關於他學術的方面，則有名著中國小說史略，這是將在北京大學裏的講義原稿整理而成的。

他從在東京和同志想出版的新生失敗了之後，研究文學底意志也便好像消滅了似地。但他在東京的時候，常常寫文章投寄於革命黨底機關報浙江潮和河南等的刊物上；不過那主要的大多是關於解說科學史或進化論等的論文。尤其把文學家介紹了進來。當時，在一般青年底心裏，因為是都已充滿着了革命思潮，所以凡是反抗和復仇的東西，便很容易得到了反應。比方拜倫之援助希臘獨立運動的熱烈，是最為青年所崇拜者，尤其是對於拜倫的讚揚；但除拜倫之外，青年魯迅曾力說介紹荷蘭底復仇詩人阿達姆·彌凱維支；匈牙利底愛國詩人彼多菲·沙特，菲律賓底文人為西班牙政府槍殺的蓋沙路（其祖父係中國人）等過的。另有一部分人，從東京及其他的圖書館中搜集明末遺民底著作，將滿洲人底暴虐的事跡抄印出來，拿回中國來，企圖使已被忘記的舊恨復活，藉以幫助革命的成功。那時，像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記略、宋舜水集、張蒼水集等等都已被翻印了出來。魯迅在東京的時候，據說是個革命黨員努力從事於文學運動的；但一旦革命成功而清朝被推翻了之後，那樣的文學也就不必要

了。

由於一九一一年底辛亥革命而推翻了清朝底專制政府，中國則一變而爲中華民國，名目上却便已是共和政體了；但清朝推翻後的政治的統治者，仍然是所謂“軍閥”。中央政府不過是任命各地方具有軍隊和行政權的督軍的形式而已；但事實上，剛巧相反，在各地方具有勢力的軍閥之間的勢力均衡上，仍然是操縱在北京政府底手中。總之，北京政府不過是這些軍閥獲得政權後競爭的巢穴而已，但這些軍閥，不但是常常爲各列強所支配着，而且列強將這些軍閥當作走狗，使其互相間對立抗爭起來，藉以爭奪在中國的經濟利益。辛亥革命雖是已把清朝推翻了，但自清朝崩潰之後，這却可以說是比以前更容易促進列強侵略中國；事實上，列強是用了種種的方法來援助推翻清朝的。可是從把清朝推翻之後，列強就利用各個軍閥，在中國拚命地擴張自國底勢力範圍，供給軍閥、軍火、彈藥於軍閥，同時把軍事顧問推薦給他們，總之，是已把軍閥視同手足似地在活動着；但作爲財政的，軍事的援助底代價的，就是逍遙自在地可獲得鐵路、礦山、以及其他各種經濟的特權。因此，龐大的外國資本，每年就好像潮水一般湧現進來。中國由於外國資本首先就是促成近代工業勃興了起來，同時跟着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出現了；然而那時恰巧歐洲大戰已開始，列強對於中國却便非暫時停止

經濟的活動不可。那時雖然給與自國民族資產階級可由於土着資本急激地發展的機會，但等到歐洲大戰一停止，同時，列強又捲土重來再向中國開始了猛烈的侵略以獲得市場。因此在歐洲大戰中已急激地發達起來，做着美夢的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所受到列強底經濟的壓迫，以及列強所操縱着的封建軍閥，列強相互間利益底對立便都急加尖銳化，同時，那些爲列強所操縱着的軍閥繼續不斷地發生國內戰爭，而那些軍閥殘酷的苛捐雜稅就阻害着了民族資產階級底發展。那末，這時有兩個敵人擺在那些民族資產階級底面前，就是外國帝國主義和國內軍閥。於是那些民族資產階級首先對於容易戰勝的自國軍閥，卽列強底走狗，同樣對於代表地主、土豪、劣紳等底封建勢力的軍閥，不得不應該爲打開他們底血路而鬥爭。的確，民族資產階級底代辦者，無論什麼時代，都是知識的急進的小資產階級。因此，急進的小資產階級受了軍閥外交底失敗而起來活動，站在最前線上組織學生，推動各地的總商會，展開了從反軍閥到排外底大運動。這就是打開中國近代民族革命運動底萌芽，卽所謂“五四”運動。（五四運動在中國近代革命史上，確是有着重要的意味；但運動勃發底直接動機，就是二十一條件。大一點說中國底近代社會運動，卽發端於排外運動，或立刻結束於排外運動，這就是半殖民地中國底宿命。）

所以，五四運動就是從北京大學生底燒打事件，立刻展開到全國底實際鬥爭，因此在政治上就是反帝國主義，反軍閥底運動；但思想上却是對封建的舊文化底革命。可是關於這次五四運動開頭作其前哨戰，却不得不溯到所謂“文藝革命”運動了。在這裏就據中國批評家丙申說：“五四”是已有了一貫的目的的，即中國新興資產階級底意識形態，是以鬥爭底形式接受了民衆底要求的；換句話說，已經企圖想要組織民衆底意識了的。這次運動最初是以意識形態爲組織想選擇最有力的武器——文學來作爲第一線底突擊隊。反對文言文和舊戲，就是他們底口號。其次，這次運動已擴展到了在全文化戰場上，反對舊禮教，攻擊儒家底人生哲學；最後主張德謨拉克西 (Democracy) 底政治。這時“新青年社”底某一次宣言，已成了形式上“五四”底中心的大本營。(丙申五四運動的檢討)

魯迅是在這“新青年社”即“新青年”刊物上，才開始發表了他底作品。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記忽然在讀者中掀起了異常的高潮，過後就絡繹不斷地發表了傑作；但是當時的中國底文學到底是怎樣的呢？

科舉制度(官吏考試)，因爲是由古文來決定其功試的，所以古文——文言文就是文學底正宗了，使用白話的小說，是很流行着的；但那是當作通俗的文學，不，是不認爲是文學的；因爲文壇是被古文家所佔領着，比方：唐宋

八家和八股底混合體的“桐城派”，繼承思綺堂和袁隨園底四六駢體文、以黃山谷爲偶像的“江西派”等，都是當時的所謂文學。因此，在國民之間所使用的文章，像碑銘墓誌似地寫出來，確是不能獲得讀者的歡心，因爲是盡量模倣古例而專門讚美死人的。縱令是普通一般的信札，自始至終都滿載着誇張式的諛詞。碰到了喪事，即使華居美食，但在死亡通知書上，大吹其牛地寫着“蓆草枕土而昏迷”。假使拿扁項贈送給醫生，則寫着“藝高岐伯”、“術高黃帝”、“着手回春”等的，雖是窮鄉僻壤的小豆腐店，在正月所掛的對聯，老是寫着“生意興隆通四海，財源茂盛達三江”這樣的法螺。總之，無論什麼，都是阿諛、虛僞、誇張，開天闢地是模倣貴族底古典文學的，還有一種叫做山林文學，就是獨創一格寫深晦艱澀的文章，自以爲高尚雅緻的，甚至於自己以爲今世的俗人都不是他底對手而會寫文章的，把自己所寫的文章藏入名山裏，讓百年後的賢人看出其價值來的所謂“名山著述”，這種逃避現實的空想文學，像一部分人所說似地，確是已經沒有文學思想底根幹了。這些古典文學、貴族文學、山林文學，對於一般大衆什麼裨益都沒有，其形式是陳腐的，祇有肉而沒有骨，不過是裝飾品罷了；內容是並沒有考慮到入生或社會，其眼界總是囚於帝王、權威、神仙、鬼怪及個人底窮通利達。這種文學，是由於阿諛、誇張、虛僞、迂闊的國民性互

相而成的原因和結果。假使不首先革新這種醜陋的文學，則不能革新社會（以上是根據陳獨秀底文學革命論），因此所謂“文學革命”就起來了。

文學革命運動，實際上是在一九一七年一月的新青年上所發表的一篇從美國寄來的胡適底文學改革芻議，是其導火線。新青年底主筆陳獨秀馬上對於他表示同意，在第二個月的新青年月刊上就發表了一篇文學革命論，這是以政治運動作為前提的開始。新青年在一九一五年誕生的，最初是不為世人所瞧得起的，後因其主筆陳獨秀是北京大學文學系主任，加之他是北京大學底進步的教授，所以等到他出來提倡文學革命，立刻就引起了世人；尤其是知識分子青年學生們底動聽。當然，一向古文學家是反對它的，就用了種種的方法，甚至於用了政治底方法，想來防止壓迫這種運動。可是時代底大勢使然，所以無論怎麼樣是不可能的，很快地舊文學不打而倒了，數千年來的中國文學就為之一新，這就可說是中國文學史上的“文藝復興時代”。文學革命底旗幟，因為是反對古文提倡白話文，所以這就叫做“白話文運動”。因此，一向在民間非常流行而當作通俗文學瞧不起的白話小說，加以新的批評，就授與相當的價值。但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非創造出新的白話小說的作品不可了：

文學革命底理論基礎，是由於胡適和陳獨秀，以及其

他如錢玄同，劉半農等創立出來的。不像陳獨秀似地，傲然地說：“爲要改革中國底文學，必須以白話爲文學底正宗，這是很明白的；反對的人更無討論的餘地。”所以白話文學底主張便照樣得到了一般人底歡迎；但實際上能代表白話文之所以能夠得到勝利的作品，同時這一運動能夠在社會上得到絕對的勝利，這却可以說是魯迅底功勞了。一九一八年四月，他底狂人日記發表於新青年上，就已足以使青年們興奮了的。某一青年後來在歡迎魯迅到廣東去的文章中這樣地寫着：“狂人日記中最初在新青年上發表之時，本來不知文學爲何物的我，讀了異常的興奮，一到朋友的地方去，總向他們說——中國文學創一新時代了，你們都應該讀狂人日記呀！甚至於在路上走的時候，也想向路人發表我的意見。……（魯迅在廣東）”

狂人日記是描寫被害妄想狂的人的日記體的小說，這個患精神病的人，的確，是大膽地明確地痛罵着中國封建的舊社會底惡弊。對於他底鄉人更甚，尤其對於他底家庭放了加緊攻擊的矢箭。所謂家庭——家族制度也者，在中國封建社會裏，當作社會的單位，無論怎麼樣，在一般總是覺得煩瑣的事情。封建的家族制度，在已完全形式化了的儒教之流的宗法社會觀念之下，在無可無不可的時候，那確是近代社會成長的最根本的障礙橫在已覺悟了的人們底眼前。在一個家庭中，包含有同姓的許多家

族與其說是大家族主義，毋甯說是氏族主義底組織來得恰當些，他們互相依附其他的東西，互相利用其他的東西，假使犧牲得不恰當，那末，就無立足的餘地了。同族間勞動的人，常常非負擔不勞動的人底生活不可。由於龐大的國際資本，以及與其打成一片的自國底軍閥官僚資本而勃興起來的近代工業資本主義，當然，是要把以土地爲主要的生產手段，以土地爲中心而成立的封建的大家族主義導入於不得不崩潰的命運中；加之，中國特殊的情形，國際資本主義，已如上述造成了軍閥不斷的內戰，和苛捐雜稅結果，中國必然激成遍地皆兵匪，橫行掠奪，這都就使他們更貧窮化，更使土著的百姓困難化，但像這樣的政治上或經濟上瀕於崩潰的家族制度，無論是在道德上或習慣上即已形式化了，仍然存在着儒教主義底宗法觀念。魯迅底狂人日記雖在那時出版，但已剔抉了已腐敗不堪的封建社會底舊習慣。因爲這已給與知識的青年學生大眾以異常的興奮，所以就很受歡迎了。

魯迅平生是慨嘆中國社會已斷送在祖宗已歪曲了的孔子哲學中；但在狂人日記中，確是比攻擊家族制度更進一層，尤其是使封建社會本身能道德化的儒教之流底仁義道德，已經不過是失掉社會意義的固定化了的觀念而已，而不僅如此，在中國底歷史上雖是充滿着仁義道德，但實際上誰都在欺負着他人——以他人爲餌食而肥

自己的。不僅祇現在的社會，即在從前，也已這樣地在痛罵着中國了的。

“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頁上都寫着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着，仔細看了半夜，纔從字縫裏看出字來，滿本都寫着兩個字，是‘吃人’。”（狂人日記中之一節）

因此，是已暗示着可咒咀的醜惡的社會，都是不得不由次一時代的青年人來改革了，而狂人日記這一篇小說最後是用了“救救孩子”這一句來結束了的。

“救救孩子”——這是已極端地表白出了他底理想，新的中國應該是說由純潔的青年來建設的，當然，這一句話是能使當時的一般青年覺悟到了重大的任務；自此以後，這句話就成了當作能使青年從數千年來的封建社會裏解放出來為口號，而廣佈在世間常用的格言。事實上，自此以後的中國青年學生，就站在一切大眾底社會運動的第一線上，成了最活潑最勇敢最戰鬥的指導者和組織者。無論是五四運動，五卅運動，還有國民革命，站在最前線上指導着大眾的，都可算是學生組織的了。

繼狂人日記之後而陸續發表在新青年月刊上的，有：孔乙己、藥、明日、一件小事、頭髮的故事、風波、故鄉等。最後，一九二一年阿Q正傳連載於北京晨報副刊上後，他便一躍而為文壇的第一個人物，這些作品大

概是描寫辛亥革命前後的社會生活的：既描寫出了如何舊社會必然非崩潰不可的特殊性，且又暗示着如何產生新的社會。所以說他是用最忠實的手法描寫出了革命及革命底風潮，是怎樣浮現在人們底心裏和生活的局部上的。的確，他可以說是善於描寫農民生活的農民作家。在他底小說裏，是主張不顯露出非常生硬的概念，所以，他之作家底手腕是超羣拔萃的。他能把無智的農民拉來作爲小說的主人翁，但具有稀奇古怪氣味的那些主人翁，既可笑又可憐，像演戲一般，而且發揮着最真實的各種行動，當然，作爲個人底行動的背景，無論什麼時候，社會本身是被當作最重大的眼目而描寫和批判着的了，這是不用說的。這種古怪的主入翁，就是孔乙己底孔乙己和阿Q正傳底阿Q，都是非常明顯地表現了出來的。孔乙己是舊時代底讀書人，是時代底殘渣，雖然沒有差使，志氣是昂揚的，但因沒有生活能力而行乞，欠着酒店裏十九文錢；一直寫在粉板上，已經好久不看見他，大概是死了吧。阿Q是失業農民——幫短工，是輕浮的人，非常喜歡造反，愛鬧革命，隨便怎麼樣總是勝利的，等到祭祀時吃醉了酒就要加入暴動的黨人，結果連性命都犧牲了，就誤會爲乘機而起的暴徒底掠奪事件之黨人（從其平素的輕舉妄動的言動和行爲）而殺被底。阿Q底性格，在那時候的中國的人，誰都有全部分或一部分相似的地方。阿Q底思想和行

動是左往右往的，獨自的而沒有一個確定的精神。因為他愚弱的習性是驕傲的，所以和人家小衝突則無反抗心，由於憐憫對方底判暴而是特別自以為自己底氣量大方的結果，總把自己底弱點瞞着以為是了不起的人，對手確是弱者無理取鬧的。所以這點，魯迅已把阿 Q是曝露出文藝底真實來了。 阿 Q 正傳一發表，接着和魯迅不睦的人們，到處說壞話，好像青蛙似地騷擾起來。像阿 Q這樣的人，是封建底遺物，不僅祇在農村裏，所以阿 Q之存在，可算是當時社會的普遍現象 當時的時代，確是阿 Q時代；所以魯迅底阿 Q 正傳一發表，批評家就以“阿 Q 相” “阿 Q 時代”的句子當作成語在使用了。

五四運動之前鋒隊新青年文學運動底時代的任務，如在前面引用丙申之指摘似地是組織民衆底意志的。魯迅自佔有了新青年之後便不可以做越出這一範圍的工作了。據說他現在是主持着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可不能把他底五四後的作品（在從他指導作家活動之後那時起，以後他便沒有小說了）看做是無產階級底小說，即在他自己也是這樣說的；但他是優勝的農民作家，這倒是可以這樣說的吧；可是還不能說他是無產階級作家，這是僅就其所發表的作品來說的。

二三年前革命文學論鬧得熱烈的時候，錢杏邨等年輕的標準的共產黨的批評家 出來大大地攻擊魯迅，其立

論是說魯迅作品不是革命，所以阿Q是無革命性的；但在魯迅底作品裏都並沒有共產黨的無產階級革命性的。然而魯迅參加作家的活動的時候，中國底無產階級在那裏是怎麼樣呢？中國共產黨不是已隨時隨地在發現了嗎？那時可不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底政治思想並沒出現的時候嗎？資產階級革命的所謂國民革命，可不是以五四爲前哨戰而已勃發起來了嗎？

魯迅在做了教授成了作家之後，安定的生活已經完結了，同時他已經進入於“腳之逃跑比手之寫字更來得忙碌”（魯迅答覆某人質問他近來爲什麼不發表作品的話）的生活了。所以近來之沒有作品，是因爲腳之逃跑比手之寫字更忙碌的緣故。他底小說，全部都照發表底年代收集在吶喊彷徨二本書裏，但吶喊卷頭底狂人日記是一九一八年作的，彷徨卷末底離婚是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作的。他也就是從寫了最後的離婚的翌年三月起開始了腳之逃跑比手之寫字更來得忙碌的生活了。

一九二六年三月，在北京軍閥段祺瑞政府通飭逮捕五十名急進的左派教授和知識分子；魯迅是五十名中的一個。在此以前，一九二三年國民黨底首領孫文，是不滿於由這些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等的政客所構成的國民黨，因爲他已經知道對於封建軍閥是完全沒有力量的，所以就宣言和蘇聯提攜，同時允許了中國共產黨參加國民

黨。在同年秋天，已從蘇聯派來鮑羅廷及其他顧問到了國民黨底中心地——廣東。一九二四年，國民黨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就已決定了黨底改組和新政綱。由此宣佈了聯合反帝國主義資產階級、都市小資產階級、農民及勞働者站在一條戰線上反對封建軍閥的所謂國民革命底火勢，就以廣東中心而燒遍了全國各地。國民黨企圖借着和中國共產黨之提攜去獲得蘇聯底軍費、軍火及革命技術底幫助，而共產黨想利用國民黨想利用國民黨在民衆中有歷史的勢力，來打倒在國際帝國主義箝制之下的那些封建軍閥，而作為無產階級革命底前提，想首先完成民族革命。

“在革命，不，全國民的共同戰線的革命——革命的第一階段的時期（廣東時期），無產階級底同盟者，就是農民、都市的貧民、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民族資產階級等。中國革命運動團體特性之一，就是存在在這些資產階級代表者構成而為國民黨的一個資產階級革命團體之中國共產黨作共同活動的了。”（約瑟夫：關於中國革命）

一九二五年三月，孫文是與世長逝了；接着到了七月，在廣東成立政府。一九二六年七月，蔣介石就任總司令，組織北伐軍出發廣東。所到地方的都市資產階級、農民、工廠工人，都一致聯合起來援助革命軍。因此，那時雖在北京的知識分子，誰都加入國民黨，極力抵抗軍閥毀

祺瑞政府。青年學生就和段祺瑞政府走狗的教育部長，還有教育部長底走狗校長及反動教授作英勇的鬥爭。左派的急進教授和學生一致聯合起來，指導學生，攻擊反動教授及校長，教育部長及軍閥政府。軍閥政府眼看到全國國民革命底勢力一日千里地增大起來，便狼狽不堪，恐怖得脚手發抖，於是對於煽動革命的知識分子——急進教授和學生們加以壓迫。在學生羣衆中爲軍閥政府底衛兵槍殺的亦復不少。急進教授就被通飭。那時，魯迅轉輾逃向北京使館區域和外人經營的醫院及工廠，每天祇以求充饑過着日子。他一面在逃避，一面寫文章投刊於報紙雜誌上，不斷地痛罵政府，與其作頑強的戰鬥。

“中華民國十六年三月十八日，段祺瑞政府使衛兵用步鎗大刀，在國務院門前包圍虐殺徒手請願，意在援助外交之青年男女，至數百人之多，還要下令，誣之曰‘暴徒’。如此殘虐兇狠的行爲，不但在禽獸所未曾見，便是在人類中也極少有的，除却俄皇尼古拉二世使哥薩克兵擊殺民衆的事，僅有一點相像。

中國只任虐狼侵食，誰也不管。管的只有幾個年青的學生，他們本應該安心讀書的，而時局漂搖得使他們安心不下。假如當局者稍有良心，應如何反省自躬，激發一點天良？然而竟將他們虐殺了！……這不是一件事的結束，是一件事的開頭。墨寫的謊說，決掩不住血寫的事實。血

債必須用同物償還。拖欠得愈久，就要刊更大的利息！

以上都是空話。筆寫的有什麼相干？實彈打出來的都是青年的血。血不但不掩於墨寫的囁語，不醉於墨寫的輓歌；威力也壓牠不住，因為牠已經騙不過，打不死了。”（三月十八日，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寫。）

那時，受傷的男女學生約數百人，被遺棄的屍體也有五十個之多。魯迅既被驅逐，又眼看流血，便更鼓勵青年作進一層的奮鬥。他底家庭，因為魯迅已被官廳驅逐，所以家庭也討厭他。他既被官廳驅逐又被家庭見棄，在此情形之下住在北京祇有五十日；終於因為不能久住下來而離開了北京。當時在北京的國民黨系的知識分子，覺得在北京有點危險，同時，南方的革命底氣焰漸漸地熾烈起來，他們於是便都向武漢方面或廣東方面走去。那時，他因為接到了福建廈門大學聘請的密電，就和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底學生許女士，（他教過書的學生，因為她是學生運動的戰士，所以也已經不能留在北京了）同時南下了。途中，幾乎被在南京的江浙地方的軍閥孫傳芳的軍隊鎗殺的危險，終於是給他逃到了上海，可是在上海的報紙上，早已登載着魯迅經此到廈門大學去改革廈門大學的消息。學生們果然都已集中到廈門去。終於學生們就以他為中心開始潑刺地活動了起來；或者寫些白話文章，或者發表非難孔教的言論，或者發表關於社會及政治上的

批評 因此他便很博得學生們底歡心，聘請他的校長和反動教授們，猜疑魯迅好像是一個陰謀家的樣子，所以對於他便加以壓迫和讒謗。廈門是國民黨實力所不及的地方，對於革命底好意不過是當作一種時代底潮流而信奉着罷了。實際上，是反動的，封建的。據說魯迅在平靜的這個地方，發生了一件不幸的風潮，那就是他已被人壓迫着。在報紙上宣傳魯迅是思想界底權威者，是思想界底先驅者，其目的無非是借着他來改革廈門大學罷了，所以這一定是學校當局所幹的勾當了。那不過是為號召學生的廣告而已，終於這一件事是已被暴露出來了：

“今天也遇到了一件要打寒噤的事。廈門大學的職務，我已經都稱病辭去了，百無可為，溜之大吉。然而很有幾個學生向我訴苦，說他們是看了廈門大學革新的消息而來的。現在不到半年，今天這個去，明天那個走，叫他們怎麼辦？這實在使我夾脊梁發冷，啞口無言。不料“思想界權威者”或“思想界先驅者”這一頂“紙糊的假冠”，竟是如此誤人子弟。幾回廣告（却並不是我登的），將他們從別的學校裏騙來，而結果自己倒跑掉了。真是萬分抱歉。”（華蓋集續編）

廣東中山大學底校長知道了魯迅在廈門被排斥的事之後，便接二連三地打電報給魯迅，說是聘請他來當教務主任兼文學系主任。他便想帶着因他去後而感傷的廈

門的學生們一同去，所以就以把這些學生不要考試進中山大學為條件而到廣東去教書。終於三十幾個學生，便和他一同到了廣東。那時，廣東是國民革命底策源地，加之，北伐軍得到全國民衆底援助到處勝利，所以那時在廣東的革命空氣是像沸水一樣地在奔騰着。被北京底軍閥政府驅逐出來，逃到廈門，接着又被廈門底反動教授驅逐出來，來到了廣東的魯迅，是熱狂地被人們歡迎着了。廣東底報紙是把他當作革命底戰士而登載着的，那時，有一個青年是這樣地寫道：

“魯迅到廣東來了，廣東的青年對他的來表示着渴慕和歡迎。開會啦，拍照啦，甚至於研究他鬚髯的人也有了。總之，是這樣熱鬧過的。我們也歡迎着魯迅，但是並不是因他是戴着‘思想界的權威者’或‘時代的先驅者’等等的大帽子；我們却因為魯迅是我們青年所值得歡迎的，知道他是很努力於思想革命的工作的”。魯迅在廣東)

魯迅曾在歡迎會上鄭重地聲明過了：他是不敢當諸君所讚揚的‘戰士’或‘革命家’。假使是這樣的話，那末就該留在北京或廈門奮鬥的了。可是他逃到‘革命的後方’的廣東來。所以這就可以證明他並不是戰士。但革命政府的某一委員兼主席教授繼魯迅之後站起來演說，他說可以拿出證據來證明魯迅是個謙遜家，他底人格是很高尚的，假使就他到現在的事實看來，的確，他是個可尊敬的戰鬥

者，革命家。於是坐滿在會場裏的來賓，一齊地發出了鼓掌聲。魯迅關了這是這樣地寫着：

“我被稱為戰士就這樣決定了，拍手之後，會就散了，我再向誰去辯說呢！我沒有方法，只好背了一塊戰士的招牌回到宿舍中去。”（而已集）

而且他接着還這樣地寫着：

“我的同鄉秋瑾女士，（秋瑾女士是辛亥革命的時候，世間最盛傳的一個女革命家，遂為軍政府所殺。實在是為世間過高的評論所殺，被殺後就在世間留下了偉大的名聲。同樣的在一陣掌聲中被殺了，我這樣想了之後，覺得我自己也在討死吧！”

這樣的文字看起來，也許以為他是在擺着自嘲的虛偽的架子。可是他並不會說自負的話，不過是因為激烈的憤激發出來的悲壯的諷刺罷了。這段文字是他發表在九月初的語絲上的通信之一節；那時他已幽默了的。正月到中山大學赴任，四月初已辭職了。他就在嚴重監視之下忍耐地等待着可脫走的機會。忽然國民革命起了“清黨運動”，他便不再住在學校了。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二日，在上海發生所謂“四一二”事件，由於蔣介石底果斷政策，就完全肅清了共產黨。接着，在上海之後的四月十五日廣東也忽然起來響應蔣介石進行了極端的白色恐怖。凡在廣東一省的工人和農民及急進的知識分子被殺戮者已達三千。

人之多，已被掛上“革命的戰士”招牌的魯迅，雖然他自己並不是共產黨員，但他周圍的青年學生却都是激烈的分子，不是爲共產黨員，即爲接近共產黨而被逮捕了。但他自己當然也更要受政府底壓迫了。各報紙上對於魯迅最初來的時候，就起來反對，製造種種惡辣的謠言。他在反動政府底白色恐怖的警戒之下祇是沉默地過着隱居的日子，急進的青年就起來責問他爲什麼沉默呢？他就這樣回答：開口不是被殺嗎？但當偵探的青年爲了探聽魯迅的思想去訪問，對魯迅露骨地滔滔不絕地講述蘇聯文學，反而慌張起來，恐怕自己也連累着和那樣的人談話的罪名，所以就不敢去報告上司。然而那時頂不幸的，就是他從廈門帶來的幾個學生。雖然從廈門費了九牛二虎之力來到了上海，但魯迅忽然被排斥了，他們便流離顛沛了。這教魯迅是覺得頂難過的，他自己所受到社會上的變動什麼都不敢想像，說道：

“國民黨使有爲的青年陷入於陷阱中去。共產黨是車頭，國民黨是車身。共產黨引着國民黨而使革命成功，所以說是革命的恩人。在鮑羅廷前是受學生一同致敬禮的，由此可見青年是都很感激共產黨的了。現在突然給共產黨以片面的屠殺，這一點也有人會說舊式軍閥的方法是好的。他們最初是不容共產黨的，但到了最後仍然容留這一主義。他們底主義是討厭的，假使不容留牠或反抗

牠，那倒是可以的。但國民黨所採取的方法完全是卑鄙的，其殺人的方法亦很殘酷。例如同樣的殺，向腦殼放一鎗，那就可算是已經達到目的了，可是他們則不然，或切成一塊一塊或活埋，甚至於親兄弟也要殺的。我從這樣以來，就痛恨着國民黨，我的學生已有許多被殺了。”

魯迅那時是這樣對我說的。他還把當時的情形這樣地寫着：“……我的一種妄想是已破滅了。直到現在，我時刻有着一種樂觀。以為壓迫或殺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因此這種老人假使一個個都死亡了的話，那末，中國也許比較是有生氣一點。但在現在我已知道連這一點是辦不到的。殺戮青年的，為什麼所殺的大概是青年，而且對於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更無憐惜。”（而已集）

這段文章，是他在因當時的壓迫而沉默着的時候，對於這加以揶揄的嘲罵答覆某君的通信之一節。他之沉默着的原因，據他自己說是因為“恐怖”，他還把這種“恐怖”，說是“診察”這樣地寫着。在白色恐怖之下是不可以自由地發表有相當程度的思想。雖然這段文字的開頭他是聲明了自己底思想已轉變了，然而把他詳細地研究起來，這是不可能的，不過是暫時告退在那裏“診察”罷了。這段文字是已表示出了他之成長的新的階段。即從這以前是個進化論者，但他已揚棄了自己底思想的立場。不久他找到了機會逃出了廣東，來到了上海了。

在上海，那時，由於國民黨底果斷政策而脫離了革命軍的共產黨的文學家們，都集攏在一起，於是“革命文學”的討論就鬧得滿城風雨。已不在前線做實際政治行動的工作的他們，就拋棄了鎗桿而拿着筆桿了。而且非常地起勁。以從廣東逃回來的成仿吾為領袖的馮乃超、李初梨等所佔據的第二個創造社，還有從武昌逃出來的蔣光赤和錢杏邨等所領導的太陽社等，就是其主要的勢力。他們就依這革命底實際工作經驗，創立比以前的革命文學論更堅實的革命文學論；然而自負的英雄主義終於是宣告失敗了，他們以為參加革命受了挫折的憤懣也可以幫助的，這就可以說是完全極左的機會主義者。他們就用這樣的調子來攻擊了魯迅的。魯迅因為是已經知道了無產階級文學是怎麼樣的東西，應該是怎麼樣的東西的，所以他專門翻譯紹普力哈諾夫、盧那卡爾斯基等底文學論及蘇聯底文藝政策，專門從事於無產階級文學理論之建設，而和英雄們戰鬥着。但因為革命文學論鬧得太凶了，所以政府就來彈壓左翼文學家，出版新書的書店被封，蘇聯作家，甚而至於契訶夫、安特列夫，總之，什麼都被禁止了。創造社太陽社也前後被解散了，其領袖們或逃亡國外，或反動化，或已死亡了。“他們想要打倒我，所以就鬧着假使不把魯迅打倒，則在中國，無產階級文學不能產生，結果，暴露出來所謂攻擊我的兒子的醜態，他們就先

打倒了自己。他們對於歷史的認識是不夠的，並且沒有把握住客觀的現實形勢。英雄主義的公式主義者，在政治上是和中國共產黨的李立三路線同樣陷入於左傾的機會主義的錯誤。李立三是失敗了，他們也失敗了。現在的青年大都是幼稚的，攻擊我是反動，但他們什麼也不懂得，却都好像吃了辣椒似地，因為辣椒一時是會使人興奮的。”

因此他就說是很驕心他所領導的左翼作家聯盟一部分的青年。左翼作家聯盟是創造社太陽社的原班人馬及其他青年作家，推戴魯迅而組織成的（一九三〇年三月二日），但到了翌年（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強有力的左翼作家聯盟員五人被捕而祕密鎗斃了。聯盟對於這，曾將對各國的革命文學和文化團體及一切為人類進步而活動的著作家思想家的宣言分送全世界，其口號為：反對中國的×色恐怖，反對各帝國主義底幫兇和直接鎮壓中國革命者，反對××黨和租界巡捕逮捕屠殺中國的著作家和思想家，反對××黨法西斯蒂壓迫文化，擁護中國××階級革命的文學戰線，擁護中國革命。那立刻響應到了美國、德國、法國及日本的左翼刊物上。魯迅曾在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底機關報前哨“紀念戰死者”專號上發表一篇題為中國無產階級文學和先驅的血，這樣地寫着：中國無產階級文學是發生在今日和明天之交，成長於侮蔑和壓迫之中，終於在最黑暗之中用我們同志的鮮

血寫了第一頁文章。我們的勞苦大眾一向是受盡最劇烈的壓迫和榨取，不僅不施與識字教育，且祇默默地委身於宰割和滅亡。繁瑣的象形文字還教他們不能得到自修的機會。知識的青年們應該想到自己所負的先驅的使命，和首先奏着戰號。這種戰號和勞苦大眾自身的反叛的吶喊是一樣地會使統治者恐怖，會使走狗文人羣起進攻，有的製造謠言，有的親自做偵探。而且這些都是祕密的匿名的，這就可以證明他們自身是黑暗的動物了。

統治者知道這種走狗文人不能對抗無產階級革命文學，於是一面就禁止書報，封閉書店，頒布苛刻的出版法，通緝著作家！另一面就用最後的手段逮捕拘禁左翼作家，祕密地處以死刑，直至現在什麼都不聲明。……”

拿給我的紙張已經寫完了。雖然關於魯迅以及其周圍活動着的，還有關於生動的中國成長史，應該詳細地寫出來，但為種種的關係，我祇得這樣結束了。我曾對魯迅說過想寫魯迅論，我把那腹稿告訴他了之後，他立刻就寫了“搔癢不著讚何益，入木三分罵亦精”的鄭板橋底對聯給我。因此教我比被批評而覺悟更要留心批評。總之，希望好像入木三分似地能自負，不管它有無益處。

一九三一年八月草稿於上海

一九三二年二月改稿於東京

同年發表於日本改造四月號

補記：魯迅最近沒有發表過小說，祇寫點社會小論文似的感想式的短文章，發表於報紙雜誌上的很多。這些現已印成單行本，如偽自由書，南腔北調集，准風月談等都是。

佐藤春夫

一九三六年五月

關於魯迅

阿Q 正傳發表以後，我寫過一篇小文章，略加以說明，登在那時的晨報副鐫上。後來阿Q 正傳與狂人日記等一併編成一冊，即是吶喊，出在“新潮社叢書”裏，其時傅孟真羅志希諸君均已出國留學去了，新潮交給我編輯，這叢書的編輯也就用了我的名義。出版以後大被成仿吾所挖苦，說這本小說集既然是他兄弟編的，一定好的了不得。——原文不及查考，大意總是如此。於是恍然大悟，原來關於此書的編輯或評論我是應當迴避的。這是我所得的第一個教訓，不久在中國文壇上又起了阿Q 正傳是否反動的問題。恕我記性不好，不大能記得誰是怎麼說的了。但是當初決定正傳是落伍的反動的文學的，隨後又改口說這是中國普羅文學的正宗者往往有之，這一筆“阿Q 的奮張”至今我還是看不懂，本來不懂也沒有什麼要緊，不過這切實的給我一個教訓，就是使我明白這件事的複雜性，最好還是不必過問。於是我不再過問：就是那一篇小文章也不收到文集裏去，以免爲無倫那邊的批評

家所援引，多生些小是非。現在魯迅死了，一方面固然也可以如傳聞鄉試封門時所祝，正是“有恩報恩有怨報怨”的時候，一方面也可以說，要罵的捧的或利用的都已失了對象，或者沒有什麼爭論了亦未可知。這時候我想來說幾句話，似乎可以不成問題，而且未必是無意義的事，因為魯迅的學問與藝術的來源有些部非外人所能知，今本人已死，舍弟那時年幼亦未聞知；我所知道已為海內孤本，深信值得錄存，事雖細微而不虛誕，世之識者當有取焉。這裡所說限於有個人獨到之見獨創之才的少數事業，若其他言行已有人云亦云的毀或譽者概置不論，不但仍以避免論爭，蓋亦本非上述越意中所攝者也。

魯迅本名周樟壽，生於清光緒辛巳八月初三日。祖父介孚公在北京做京官，得家書報告生孫，其時適有張——之洵還是之萬呢？來訪，因為命名曰張，或以為與灶君同生日，故借灶君之姓為名，蓋非也。書名定為樟壽，雖然清道房同派下羣從譜名為壽某，祖父或忘記或置不理均不可知，乃以壽字屬下，又定字曰豫山，後以讀音與雨傘相近，請於祖父改為豫才。戊戌春間往南京考學堂，始改名樹人，字如故，義亦可相通也。留學東京時，劉申叔為河南同鄉辦雜誌曰河南，孫竹丹來為拉稿，豫才為寫幾篇論文，署名一曰迅行，一曰令飛，至民七在新青年上發表狂人記，於迅上冠魯姓，遂成今名。寫隨感錄署名唐侯，唐

者“不唐捐”之唐，意云空等候也，阿Q正傳特署巴人，已忘其意義。

魯迅在學問藝術上的工作可以分爲兩部，甲爲蒐集輯錄校勘研究，乙爲創作。今略舉於下：

甲部

一，會稽郡故書雜集。二，謝承後漢書（未刊）。三，古小說鉤沈（未刊）。四，小說舊聞鈔。五，唐宋傳奇集。六，中國小說史。七，嵇康集（未刊）。八，嶺表錄異（未刊）。九，漢畫石刻（未完成）。

乙部

一，小說：吶喊，彷徨。二，散文：朝華夕拾，等。

這些工作的成就有大小，但無不有其獨得之處，而其起因亦往往很是久遠，其治學與創作的態度與別人頗多不同，我以爲這是最可注意的事。豫才從小就喜歡書畫，——這並不是書家畫師的墨寶，乃是普通的一冊一冊的線裝書與畫譜。最初買不起書，只好借了綉像小說來看。光緒癸巳祖父因事下獄，一家分散，我和豫才被寄存在大舅父家裏，住在皇甫莊，是范嘯風的隔壁，後來搬往小臬步，即秦秋漁的娛園的廂房。這大約還是在皇甫莊的時候，豫才向表兄借來一冊蕩寇志的綉像，買了些叫作吳公紙的一種毛太紙來，一張張的影描，訂成一大本，隨後彷彿記得以一二百文錢的代價賣給書房裏的同窗了。回家

以後，影寫了好些畫譜，還記得有一次在堂前廊下影描馬鏡江的詩中畫。或是王冶梅的三十六賞心樂事，描了一半暫時他往，祖母看了好玩，就去畫了幾筆，却畫壞了，豫才扯去另畫，祖母有點悵然。後來厘歲錢等等略有積蓄，於是開始買書，不再借抄了。頂早買到的大約是兩冊石印本岡元鳳所著的毛詩品物圖考，這書最初也是在皇甫莊見到，非常敬羨，在大街的書店買來一部，偶然有點紙破或墨污，總不能滿意，便拿去掉換，至再至三，直到夥計煩厭了，戲弄說，這比姊姊的面孔還白呢，何必掉換，乃憤然出來，不再去買書。這書店大約不是墨潤堂，却是鄰近的奎照樓吧。這回換來的書好像又有什麼毛病，記得還減價以一角小洋賣給同窗，再貼補一角去另買了一部。畫譜方面那時的石印本大抵陸續都買了，芥子園畫傳自不必說，可是却也不會自己學了畫。此外陳洪子的花鏡恐怕是買來的第一部書；是用了二百文錢從一個同窗的本家那里得來的。家中原有幾箱藏書，却多是經史及舉業的正經書，也有些小說如聊齋志異，夜談隨錄，以至三國演義，綠野仙踪等，其餘想看的須得自己來買添，我記得這裏邊有酉陽雜俎，容齋隨筆，輟耕錄，池北偶談，六朝事蹟類編，二酉堂叢書，金石存，徐霞客游記等。新年出城拜歲，來回總要一整天，船中枯坐無聊，只好看書消遣，那時放在“帽盒”中帶了去的大抵是游記或金石存，——後者自然是

石印本，前者乃是圖書集成局的扁體字的。唐代叢書買不起，託人去轉借來看過一遍，我很佩服那里的一篇黑心符，鈔了平泉草木記，豫才則抄了三卷茶經和五木經，好容易湊了塊把錢，買來一部小叢書，共二十四冊，現在頭本已缺無可查考，但據每冊上特請一位族叔題的字，或者名為藝苑朝華的，當時很是珍重耽讀，說來也很可憐，這原來乃是書估從龍威秘書中隨意抽取，雜湊而成的一碗“拚攏坳羹”而已。這些事情都很瑣屑，可是影響却頗不小，牠就“奠定”了半生學問事業的傾向，在趣味上到了晚年也還留下好些明了的痕跡。

戊戌往南京，由水師改入陸師附設的路鑛學堂，至辛丑畢業派往日本留學，此三年中專習科學，對於舊籍不甚注意，但所作隨筆及詩文蓋亦不少，在我的舊日記中略有錄存。如戊戌年作夏劍生雜記四則云：

“行人於斜日將墮之時，曠色逼人，四顧滿目非故鄉之人，細聆滿耳皆異鄉之語，一念及家鄉萬里，老親弱弟必時時相語，謂今當至某處矣。此時真覺柔腸欲斷，涕不可仰。故予有句云，日暮客愁集，煙深入語喧，皆所身歷，非託諸空言也。”

“生鱸魚與新粳米炊熟，魚須斫小方塊，去骨，加秋油，謂之鱸魚飯。味甚鮮美，名極雅飭，可入林洪山家清供。”

“夷人呼茶爲梯，閩語也。閩人始販茶至夷，故夷人效其語也。”

“試燒酒法，以缸一隻猛注酒於中，視其上面浮花，頃刻迹散淨盡者爲活酒，味佳，花浮水面不動者爲死酒，味減。”又蒔花雜誌二則云：

“晚香玉本名土秘螺斯，出塞外，葉闊似吉祥草，花生穗間，每穗四五球，每球四五朵，色白，至夜尤香，形如喇叭，長寸餘，瓣五六七不等，都中最盛。昔聖祖仁皇帝因其名俗，改賜今名。”

“里低母斯，苔類也，取其汁爲水，可染藍色紙，遇酸水則變爲紅，遇鹼水又復爲藍。其色變換不定，西人每以之試驗化學。”詩則有庚子年作蓮蓬入七律，庚子送灶即事五絕，各一首，又庚子除夕所作祭書神文一首，今不具錄。辛丑東游後曾寄數詩，均分別錄入舊日記中，大約可有十首，此刻也不及查閱了。

在東京的這幾年是魯迅翻譯及寫作小說之修養時期，詳細須得另說，這里爲免得文章線索凌亂，姑且從略。魯迅於庚戌（一九一〇年）歸國，在杭州兩級師範紹興第五中學及師範等校教課或辦事，民元以後任教育部僉事，至十四年去職，這是他的工作中心時期，其間又可分爲兩段落，以新青年爲界。上期重在輯錄研究，下期重在創作，可是精神還是一貫，用舊話來說可云不求聞達。魯迅向來勤

苦作事，爲他人所不能及；在南京的時候手抄漢譯賴耶爾 (Clavel) 的地學淺說 (案卽是 Principles of Geography) 兩大冊，圖解精密，其他教本稱是，但因為我不感到興趣，所以都忘記是什麼書了。歸國後他就開始抄書，在這幾年中不知共有若干種，只是記得的就有穆天子傳，南方草木狀，北戶錄，桂海虞衡志，程瑤田的釋蟲小記，郝懿行的燕子春秋，蜂衙小記與記海錯，還有從說郛抄出的多種。其次是輯書。清代輯錄古逸書的很不少，魯迅所受影響的還是張介侯的二酉堂吧，如涼州記，段穎陰鏗等集，都是鄉邦文獻的輯集也。(老實說，我很喜歡張君所著書，不但是因為輯古逸書收存鄉邦文獻，刻書字體也很可喜，近求得其所刻蜀典，書並不珍貴，却是我所深愛。)他一面翻古書抄唐以前小說逸文，一面又抄唐以前的越中史地書。這方面的成績第一是一部會稽郡故書雜集，其中有謝承會稽先賢傳，虞預會稽典錄，鍾離岫會稽後賢傳記，賀氏會稽先賢像讚，朱育會稽土地記，賀循會稽記，孔靈符會稽記，夏侯會先會稽地志，凡八種，各有小引，卷首有敘，題曰太歲在關逢攝提格 (民國三年甲寅) 九月旣望記，乙卯二月刊成，木刻一冊。敘中有云：

“幼時嘗見武威張澍所輯書，於涼土文獻撰集甚衆，篤恭鄉里，尚此之謂，而會稽成籍零落，至今未聞後賢爲之網紀，乃創就所見書傳刺取遺篇，累爲一帙。”又云：

“書中賢俊之名，言行之跡，風士之美，多有方志所遺，舍此更不可見，用遺邦人，庶幾供其景行，不忘於故。”這裏輯書的緣起與意思都說的很清楚，但是另外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敝文署名“會稽周作人記”，向來算是我的撰述。這是什麼緣故呢？查書的時候我也曾幫過一點忙，不過這原是豫才的發意，其一切編排考訂，寫小引敝文，都是他所做的，起草以至謄清大約有三四遍，也全是自己抄寫，到了付刊時却不願出名，說寫你的名字吧，這樣便照辦了，一直拖了二十年餘。現在覺得應該說明了，因為這一件小事我以為很有點意義。這就是證明他做事全不為名譽，只是由於自己的愛好。這是求學問弄藝術的最高的態度，認得魯迅的人平常所不大能夠知道的。其所輯錄的古小說逸文也已完成，定名為古小說鈎沈；當初也想用我的名字刊行；可是沒有刻板的資財，託書店出板也不成功，至今還是擱着。此外又有一部謝承後漢書，因為謝偉平是山陰人的緣故，特為輯集，可惜分量太多，所以未能與故書雜集同時刊板，這從篤恭鄉里的見地說來也是一件遺憾的事。豫才因為古小說逸文的蒐集，後來能夠有小說史的著作，說起緣由來很有意思。豫才對於古小說雖然已有十幾年的用力，（其動機當然還在小時候所讀的書裏，）但因為不喜誇示，平常很少有人知道。那時我在北京大學中國文學系做“票友”，馬幼漁君正當主任，有一年

叫我講兩小時的小說史，我冒失的答應了回來，同豫才說起，或者由他去教更爲方便，他說去試試也好，於是我去找幼漁換了別的什麼功課，請豫才教小說史，後來把講義印了出來，即是那一部書。其後研究小說史的漸多，如胡適之、馬隅卿、鄭西諦、孫子書、諸君，各有收獲，有後來居上之概，但那些似只在後半部，即宋以來的章回小說部分，若是唐以前古逸小說的稽考恐怕還沒有更詳盡的著作，這與古小說鈎沈的工作正是極有關係的。對於畫的愛好使他後來喜歡翻印外國的板畫，編選北平的詩箋，爲世人所稱，但是他半生精力所聚的漢石刻畫像終於未能編印出來，或者也還沒有編好吧。

末了，我們略談魯迅創作方面的情形。他寫小說其實並不始於狂人日記，辛亥冬天在家裏的時候曾經寫過一篇，以東鄰的富翁爲“模特兒”寫革命的前夜的事，情質不明的革命軍將要進城，富翁與清客開漢商議迎降，頗富於諷刺的色彩。這篇文章未有題名，過了兩三年由我加了一題目與署名，寄給小說月報，那時還是小冊，係譚鐵樵編輯，承其覆信大加稱賞，登在卷首，可是這年月與題名都完全忘記了，要查民初的幾冊舊日記才可知道。第二次寫小說是衆所共知的新青年時代，所用筆名是魯迅，在晨報副鐫爲孫伏園每星期日寫阿Q，正傳則又署名巴人，所寫隨感錄大紙署名唐俟，我也有一兩篇是用這個署名的，都

登在新青年上，近來看見有人爲魯迅編一本集子，裏邊所收就有一篇是我寫的，後來又有人選入什麼讀本內，覺得有點可笑。當時世間頗疑巴人是蒲伯英，魯迅則終於無從推測，教育部中有時紛紛議論，毀譽不一，魯迅就在旁邊，茫然相對，是很有“幽默”趣味的事。他爲什麼這樣做的呢？並不如別人所說，因爲言論激烈所以匿名，實在只如上文所說不求聞達，但求自由的想或寫，不要學者文人的名，自然也並不爲利，新青年是無報酬的晨報副刊多不過一字一二厘罷了。以這種態度治學問或做創作，這纔能夠有獨到之見，獨創之才，有自己的成就，不問工作大小都有價值，與制藝異也。魯迅寫小說散文又有一特點，爲別人所不能及者，即對於中國民族的深刻的觀察。大約現代文人中對於中國民族抱着那樣一片黑暗的悲觀的難得有第二個人吧。豫才從小喜歡“雜覽”，讀野史最多，受影響亦最大，——譬如讀過曲洧舊聞裏的因子巷一則，誰會再忘記，會不與一個小人物的懺悔所記的事情同樣的留下很深的印象呢？在書本裏得來的知識上面，又加上親自從社會裏得來的經驗，結果便造成一種只有苦痛與黑暗的人生觀，讓他無條件（除藝術的感覺外）的發現出來，就是那些作品。從這一點說來，阿Q正傳正是他的代表作，但其被普羅批評家所（曾）痛罵也正是應該的。這是寄悲憤絕望於幽默，在從前那篇小文裏我曾說用的。

是顯克微支夏目漱石的手法，著者當時看了我的草稿也加以承認的，正如炭畫一般裏邊沒有 一點光與空氣，到處是愚與惡，而愚與惡又復厲害到可笑的程度，有些牧歌式的小話都非佳作，藥裏稍露出一點的情熱，這是對於死者的，而死者又已是做了“藥”了，此外就再也沒有東西可以寄託希望與感情。被舊禮教吃了肉去就難免不做成“藥渣”，這是魯迅對於世間的恐怖，在作品上常表現出來，事實上也是如此。講到這裏我的話似乎可以停止了，因為我只想略講魯迅的學問藝術上的工作的始基，這有些事情是人家所不能知道的，至於其他問題能談的人很多，還不如等他們來談罷。

周作人

二十五年十月二十四日北平

魯迅自述 左羣集錄

特價每冊國幣五角

不准翻印

總發行所 東壁書屋

上海四馬路二九三弄

經售處

東方圖書雜誌公司 生活書店
中國圖書雜誌公司 光明書局

